

目 录

一、总篇

中国梦	002
“四个自信”	004
“两个一百年”	006
新的伟大斗争	007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009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011
五大发展理念	012
中国道路	014
中国故事	016
顶层设计、顶层推动	017
深改小组	018
改革促进派	019
共建共享	020
理论自觉	022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023

二、分篇

(一) 政治建设篇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026
-----------	-----



依宪治国·····	027
海洋强国·····	029
简政放权·····	031
司法体制改革·····	032
司法责任制·····	034
权力清单·····	035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38
政治生态·····	039
公车改革·····	041
户籍改革·····	042
协商民主·····	044
“刀把子”·····	046
“习马会”·····	047
容错纠错机制·····	048
“放管服”·····	049
(二) 经济建设篇	
“两个翻一番”·····	052
全口径预决算·····	053
新型城镇化·····	054
改革红利·····	056
自由贸易区·····	058
中国经济升级版·····	059
京津冀一体化·····	061
负面清单·····	062
精准扶贫·····	064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066
经济新常态·····	067
城乡一体化·····	069

“一元公司”	070
土地流转	072
新经济	074
“两手论”	076
文旅经济	078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079
互联网+	082
全要素生产率	084
老工业“二人转”	086
滚石上山、爬坡过坎	087
众筹	089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09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93
五大支柱性政策	095
“三去一降一补”	096
工业 4.0	098
重农固本	100
营改增	101
分享经济	103
“人地钱”挂钩	105
工匠精神	106
光网城市	108
海外仓	109
相机调控	109

(三) 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篇

1. 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12
文化强国	114

新型文化业态	116
网上主旋律	118
媒体融合	120
2. 社会建设	
“三个公平”	122
和谐共生	123
记得住乡愁	124
乡土味道	125
“全面二胎”	126
获得感	128
厕所革命	130
全民医保	131
幸福感	132
互联网治理	134
3. 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	137
美丽中国	138
“两山论”	139
命运共同体	141
APEC 蓝	142
人努力天帮忙	143
铁腕治污	144
(四) 党的建设篇	
服务型政党	146
“八项规定”	147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149
政治纪律	151
“老虎”“苍蝇”一起打	153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154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155
“四风”	156
“主体责任”	158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159
“三严三实”	161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62
“稻草人”	164
“猎狐行动”	165
“天网”行动	166
政治规矩	167
“高压线”	168
“猛药去疴、刮骨疗毒”	169
治裸官	170
“四有”干部	172
从严治党	174
“七个有之”	176
百人红色通缉令	177
忠诚、干净、担当	178
不定指标、上不封顶	179
塌方式腐败	180
团团伙伙	181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183
“五个必须”	184
“铁帽子王”	185
“关键少数”	186
“最后一公里”	188
把纪律挺在前面	189
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	191

“四种人”	192
巡视制度	193
专项巡视	195
巡视全覆盖	198
派驻纪检组	200
“四铁”干部	202
“四个意识”	204
“两学一做”	205
“四讲四有”	208
问责条例	210

（五）军事、外交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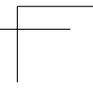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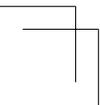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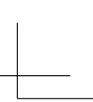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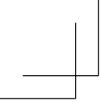
1. 军事

强军目标	21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216
军事思想观念新变革	218
世界新军事革命	218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20
五大战区	221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22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225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226

2. 外交

命运共同体	229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31
“一带一路”	233
全球治理	234
亚投行	237
修昔底德陷阱	239

丝路基金	241
澜湄合作	242
中国核安全观	244
中国文明观	246
亚洲安全观	247
亚太梦	248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49
正确义利观	251
“习式外交”	254
白宫秋叙	257
胜利日外交	258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261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262
“把脉、开方”	263
不信邪也不怕邪	264
拼音索引	267
后记	275



一、总篇

SHIBADA YILAI SHIZHENG RECI

中国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带领全体新任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说：“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中国梦，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国家富强，是指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经济更加发达，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驱动力更加强劲，政治更加民主，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态更加美好。

民族振兴，就是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强大，继承并创造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以及先进的文明成果，并将其传递给全世界，从而影响世界、改变世界，进而使中华民族再次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再次以高昂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人民幸福，就是人民权利保障更加充分、人人得享共同发展，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

习近平主席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

链接

新华网伦敦 2014 年 3 月 22 日电 英国最大的广告和公关集团 WWP 集团在英国议会下议院发布《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中国人的个人梦与国家梦紧密交织，“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

该报告对中、美、英三国国民进行一手调查后认为，中国梦与美国梦、英国梦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不同。

报告指出，“中国梦”提出的时间虽短，但在中国已经妇孺皆知，中国民众对“中国梦”的认知程度远超美国人对美国梦、英国人对英国梦的认知程度。

调查显示，有 92% 的受访中国民众知道“中国梦”，其中八成是从网上获悉。相比之下，只有 81% 的受访美国人听说过“美国梦”，而听说过“英国梦”的英国人只占 10%。

报告认为，从个人层面来看，中国梦、美国梦、英国梦是相似的，三国的民众都最希望在个人层面获得健康、幸福和良好的家庭生活条件。中国梦与美国梦、英国梦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梦是“个人梦”和“家国梦”的交织体，个人梦想的实现离不开家国梦的支撑。

报告认为，中国民众对“中国梦”的吸引力更加自信。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三分之一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 42% 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 10 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

同时，80% 受访中国民众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一比例比持有相同观点的美国人都要高。但有 44% 的中国民众认为，10 年后中国可以获得与美国比肩的影响力。

相比之下，受访的美国人 and 英国人大都将中国视为当今和未来 10 年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同时承认中国的实力将会上升。

对于梦想的实现途径，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都将个人努力排在第一位。个人努力之外，中国人最重视“人际关系”，美国人强调“冒险”，而英国人则偏重“运气”。

此外，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中国人认为，将中国自主品牌推广到海外是中国全球影响力的体现。为实现这个中国梦，中国年轻一代正努力设法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以提升中国品牌的国际影响力。

“四个自信”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四个自信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体现了对我国国情的深刻把握、对民族命运的理性思考、对人民福祉的责任担当。

道路自信源自于道路开辟、道路创新和道路自觉，需要我们党进一步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自信源自于理论形成、理论创新和理论自觉，需要我们党进一步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制度自信源自于制度确立、制度创新和制度自觉，需要我们党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自信源自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以及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过程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种在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夯实了我们文化建设的根基，奠定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

链接

周丽云：“四个自信”铸就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

在庆祝建党 95 周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权威阐释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强调了文化自信的基础性地位。既让人耳目一新，又觉得意味深长。面对实现全面小康和民族复兴伟业，强调坚持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就是强调在经济不断发展、物质不断丰富的时候，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中华文化也要不断成长和发展。坚持“四个自信”，就是铸就推进民族复兴的蓬勃精神力量。

坚持“四个自信”，有极其现实的引领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与政治相联系，认为离自己的日常生活很远；而在文化方面，却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所知甚少，甚至是一知半解。近年来出现的日本漫画热，美剧、韩剧热，“恶搞”革命英雄的行径及其追捧现象，以及视物质利益为唯一“价值”、精神追求被彻底放逐的错位等，都说明伴随着中国的现代转型，必须同步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精神的转型和成长。坚持“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便有着十分现实的意义。

坚持“四个自信”，有值得坚持的底气 and 理由。中国共产党 95 年的探索实践，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使



自己成为拥有 8800 多万名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其创造的“中国奇迹”、提供的“中国方案”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和理论研究者探究的目光，让有着 5000 多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因此，“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坚持“四个自信”，必须把握好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强调：“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如果说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体现的是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制度认同，那么文化自信则更具有广泛性意义，更容易直抵人的心灵。坚持和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必然会增强文化认同和自信意识。而文化自信，又能使理论自信更有理性、道路自信更有行动、制度自信更有保障，四者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 年 7 月 4 日）

“两个一百年”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979 年，邓小平同志设想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 1981 年到 19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第二步，从 1991 年到 20 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 21 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

础上继续前进。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他指出:展望下世纪,我们的目标是,第一个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10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下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新的伟大斗争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这一点。2013年6月28日,他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2015年3月5日,他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

之所以提出“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主要是基于对我们党现阶段面临的一系列挑战、考验和危险的科学判断。

“新的伟大斗争”的对象和形式呈现全面多样化态势。既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党外的,也有党内的;既有经济、政治的,也有文化、社会的;既有有形的敌对势力,也有无形的挑战、考验、危险。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都有斗争,资源、货币、市场、意识形态、网络等都是斗争的载体。

全党需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使命意识,进一步培育

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准确把握机遇、有效应对挑战、科学破解难题，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发展、不断推进。

链接

韩庆祥：中国共产党面临八个“新的伟大斗争”

争夺资源。资源竞争是当今世界各国竞争的重要形式之一。地球上储存的资源相对有限。缺乏资源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及竞争力，因而当前许多国家都在围绕资源展开激烈竞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资源争夺大战。目前，这种战争仍然以不同形式在世界的局部地区进行。

货币战争。美国等西方强国注重金融立国，极力维护本国、本地区货币的世界霸主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一些西方国家打压人民币是不争的事实。研究表明，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在我国周边不断挑起事端，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刺激货币流向霸权主义国家。

争夺市场。即为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而展开争夺。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发展经济必须拥有广阔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围绕我国市场展开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

意识形态斗争。强权政治和霸权国家试图对我国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们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为招牌，大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目的就是动摇我们的思想根基，摧毁中国人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复杂而尖锐，一些错误思潮暗流涌动，此起彼伏，竞相发声，大肆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领土争端。少数周边国家与我争夺我国固有的领土，一些西方大国趁机介入，挑拨离间甚至公然为其不合理主张撑腰打气。对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到这种围绕国家领土主权斗争的长期性，依法、合情、合理地予以回应。

反腐败斗争。当前，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易发多发，我们党在不断加大反腐败的力度。本届中央领导集体组织开展的反腐败斗争，力度大，手段和方式多，效果显著。与此同时，腐败分子暗中抵触，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将更为激烈。

网络斗争。在网络空间，我们既能看见传播正能量的“天使”，也能看到发泄不满、谩骂他人、传播色情、招摇撞骗、混淆是非、聚众挑事、制造虚假信息、进行网络策反等释放负能量的“魔鬼”。网络世界中的“天使”与“魔鬼”为争夺网民和阵地而展开的斗争日益凸显，现实世界的斗争也会体现到网络世界。

反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经常在我国挑起各种事端，制造民族裂痕，搞民族分裂主义。因此，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人民日报》2014年7月23日)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位一体”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增强发展后劲，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约束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在文化建设方面，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在社会建设方面，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努力实现绿色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五位一体”总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证，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只有坚持五位一体建设全面推进、协调发展，才能形成经济富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公平、生态良好的发展格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链接

党关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形成过程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此后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延续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后，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是党的十八大以后逐步提出的。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2014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将“四个全面”并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全面深化改革：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

链接

“四个全面”的提出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三个全面”。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三个全面”上升到了“四个全面”，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新增了“全面从严治党”。尽管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就这“四个全面”作出过一系列的重要论述，但在公开报道中将“四个全面”并提还是第一次。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将“全面从严治党”加入到“四个全面”中时，特别采用了“大气候和小气候”的比喻，“从严治党是全党的共同任务，需要大气候，也需要小气候。各级党组织要主动思考、主动作为，通过营造良好小气候促进大气候进一步形成”。

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

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链接

“十二五”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辉煌成就

2015年10月15日下午，中央宣传部、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北京市委在京举办“辉煌十二五”

系列报告会第十场报告，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围绕“十二五”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成就作报告。

万钢部长在报告中指出，“十二五”以来，我国科技进步与创新事业加快发展，科技创新在党和国家全局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国家科技进步和创新能力明显增强，整体水平加速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阶段迈进，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在基础研究领域，涌现出量子调控、中微子震荡、90 α 热休克蛋白、ciPS 干细胞等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我国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

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潜器、超级计算、北斗导航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为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利器。

在科技支撑产业发展方面，高铁、4G 移动通讯、核电、电动汽车、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等重大创新成果加速应用，科技创新为经济转型升级、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提供重要支撑。

在科技体制管理改革方面，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取得重要突破，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国家自主示范区和高新区成为区域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

（新华网，2015 年 10 月 16 日）

中国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0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明确界定，2012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充实和完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将其简称为“中国道路”。2013

年3月16日，他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讲话时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链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中国故事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4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链接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人民日报·海外版》创刊30周年作出重要批示,指出,希望海外版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努力成为增信释疑、凝心聚力的桥梁纽带。这也是总书记对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再次提出的明确要求和殷切期望。

“讲好中国故事”,习近平是倡导者,也是践行者。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十几次出访公开演讲中,讲述了很多温暖人心的故事,拉近着中外民

众的心理距离，向世界形象传递出中国观点和中国态度。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墨西哥演讲时，引用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传递中国外交的义利观，还谈到米卢带领中国足球闯进世界杯比赛和墨西哥跳水队在中国教练指导下拿下好成绩的事例，非常接地气、平民化，既展大国领袖的风范，又现亲民务实的情怀。2014年3月，习近平在法国引用拿破仑的话提出了“新狮子论”，巧妙反驳了“中国威胁论”，传递出中国梦的世界价值。这对我们的传播工作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

顶层设计、顶层推动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共识，形成改革合力”。

顶层设计是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全局的角度，对某项任务或者某个项目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统筹规划，以集中有效资源，高效快捷地实现目标。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顶层决定性，顶层设计是自高端向低端展开的设计方法，核心理念与目标都源自顶层，因此顶层决定底层，高端决定低端；二是整体关联性，顶层设计强调设计对象内部要素之间围绕核心理念和顶层目标所形成的关联、匹配与有机衔接；三是实际可操作性，设计的基本要求是表述简洁明确，设计成果具备实践可行性，因此顶层设计成果应是可实施、可操作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提法不仅是一个阶段性的标志，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完成好这一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改革发展中提出了由“顶层设计”向“顶

层推动”的提升，在设计的同时加大推动，为改革发展打好思想基石，注入实践动力。

链接

2014年1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智慧。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善于从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中寻找改革切入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

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就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辩证统一。如何做到良性互动、有机结合？最根本的在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非从本本出发。达·芬奇有句名言：“科学是将领，实践是士兵。”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从实践中总结提炼科学方法和经验，反过来用于指导实践的过程。“实践之树长青”。只有尊重地方、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大胆鼓励探索和创新，才能不断为顶层设计提供脚本、积累经验，完善顶层设计，防止顶层设计成为空中楼阁。而从实践中得到完善的顶层设计，往往更接地气，对改革探索的针对性、指导性更强。改到深处，无处不是硬骨头和险滩暗礁，时时提醒我们要在科学的战略指导下，学会灵活管用的战术。地方、基层、群众的首创精神，尤其需要鼓励和弘扬。

深改小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简称“深改小组”，由习近平总书记任组长。

中央深改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确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等方面改革的重大原则、方针政策、总体方案；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协调处理全局性、长远性、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改革问题；指导、推动、督促中央有关重大改革政策措施的组织落实。

中央深改小组下设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纪律检查体制改革6个专项小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意义。他说，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一个或某几个部门往往力不从心，这就更需要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

改革促进派

2015年5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要高度重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改革推进到哪一步，思想政治工作就要跟进到哪一步，有的放矢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

“改革促进派”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被提出过，但它在中央深改组会议上被提及，无疑具有新内涵，也与全面深化改革之需要相呼应。改革促进派指首先要在思想上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认同中央在改革方面的战略部署，特别对“四个全面”的内涵要有深刻理解；其次，在行动上，要做促进改革的事，不能无所作为，更不能阻挠改革。是否支持



改革、参与改革、推进改革将是衡量领导干部合格与否的基本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敢于担当的就是促进派，把改革抓在手上、落到实处、干出成效的就是实干家。各地区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对抓改革、抓落实负有直接责任，要亲自抓谋划、抓部署、抓督察、抓落实。对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务，要高度重视、亲力亲为，中央有具体要求的，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折不扣落实下去；中央提出原则要求的，要结合实际进行细化实化。对本地区本部门改革任务，既要抓紧推进、敢于突破，又要立足全局、通盘考虑。市县一级要注意配足力量，创新工作方法，把精力集中在打通“最后一公里”上。要总结各地创造的新鲜经验，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要重视调查研究，坚持眼睛向下、脚步向下，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使改革更接地气。



共建共享

共建和谐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共建和谐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共建共享”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不断向前推进。2015年10月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同时，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仅源自于对发展成果的“共享”，也源自于对发展进程亲身参与、亲自尽力的“共建”。因为这种“共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尊重，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得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得到充分展现，人生价值得到肯定和实现，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也是我们强调发展依靠人民的另一个重要缘由所在。

链接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

民主法治，就是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

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

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

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

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以上这些基本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既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十分丰富，既是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总体特征，也是我们构建



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

(《党的十六大报告》)

理论自觉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

所谓理论自觉,主要是指一个政党在理论上的觉醒和自觉的行动,包括对理论在历史进步中的地位和社会发展中的功能、作用的自觉认识,对理论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自觉把握,对发展理论的社会与历史责任的自觉担当。

其特点主要有三:一是对理论价值认知的自觉性。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主要表现在:理论不仅反映现实而且预见未来,不仅维护现实而且批判现实,不仅调控社会和人的活动而且指导社会和人的活动,不仅相对稳定而且创新发展。二是对理论发展规律把握的深刻性。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客观规律一样,理论也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理论自觉就是能正确把握一定历史条件下理论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规律进行运用与创新,以便最有效地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推动理论科学发展。三是对发展理论历史责任担当的主动性。理论是一个政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也是一个政党理想追求和精神面貌的集中反映。有没有主动、强烈的理论担当,是一个政党是否成熟、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理论自觉就是一个先进的、成熟的、有强大生命力的政党,要高举先进理论的旗帜,高扬自己的理论理想,主动担

当起推进理论发展繁荣的历史责任。

链接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科学理论孕育催生、用科学理论武装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优势。

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着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实现了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开创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一次次与时俱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形成了党在新时期治国理政的系列战略思想，正指引着中国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已经走过了95年的历程，但我们要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一切向前

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日常用语中，“不忘初心”常常和“方得始终”连在一起使用，其意思是说一个人做事情，始终如一地保持当初的信念，最后一定能得到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讲话中对全党明确提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四个方面要求。第一，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第二，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第三，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力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不断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向前进；第四，要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二、分篇

SHIBADA YILAI SHIZHENG RECI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2014年10月20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法治思维是一个文化范畴。广义的法治文化包含了精神、制度乃至物质等不同方面，而法治思维则属于精神方面的文化要素。

法治文化的精神方面大概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一是法治意识和观念的层面，这是最低最基本的层面。全社会成员都具备相应的法治意识、观念，才能够形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观念基础。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既要有权利意识，又要有自觉遵守法律的义务观念；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除了相应的权利义务观念之外，还要有法治的权力观，以及带头守法、维护宪法与法律的权威的职责意识。二是法治思维和理念的层面，表现在法治意识和观念上升到思维、理念的层面，对制度建构和具体实践起到更加巨大的推动作用。三是法治的价值与态度层面，表现在人们的内心价值观和态度上对于法治的内在认同和尊崇，直至法治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是法治文化的最高层面。

法治方式就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与法治思维相应的法治方式，其外延更为宽泛。通常人们所说的“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都是属于法治方式的范畴。

法治方式与法治思维是内在和外在的关系，法治方式就是法治思维实际作用于人的行为的外在表现。法治思维影响和决定着法治方式。

链接

2016年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党委政法委要带头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标志着我们党对领导政法工作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提高政法工作法治化水平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这一精神，并自觉贯彻落实到政法工作中去。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法治思维是基于法治的固有特性和对法治的信念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在我国，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解决问题。政法机关作为执法司法机关，其工作人员是否具有法治思维、能否善用法治方式，关系到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建设，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

依宪治国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

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2014年10月20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依宪治国”的概念主要是从宪法的功能角度来考虑的。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其他一切法律法规必须以宪法为依据。如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不把宪法放在一个核心的位置，就很难保证法制的统一性。依宪治国是最高层级的依法治国。

依宪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要把宪法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与保障，强调法治思维，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强调宪法的教育与普及，形成社会共识与凝聚力；强调宪法确立的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实现社会正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

链接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按照宪法规定，对宪法的修改，应由人大常委会或五分之一以上的人大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大以全体代表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通过。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之前，其修改的内容都还只是建议和议案，不是最后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宪法修改草案条款共有14条，涉及诸多重要问题。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也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的诞生，以宪法的方式确立了我国基本的宪政制度，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利益。1954年宪法的一些基本内容和重要原则，为后来宪法和宪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使我国的宪政遭到严重破坏。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即 1982 年宪法，也是迄今一直在实施中的宪法。1982 年宪法继承和发展了 1954 年制定的宪法的基本原则，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吸收了国际经验，是一部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根本大法。它将四项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写进了宪法，明确规定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982 年宪法此后经历了 3 次修改，每一次修改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海洋强国

海洋强国是指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等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

2012 年 11 月 8 日，党的十八大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2013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内涵应该包括认知海洋、利用海洋、生态海洋、管控海洋、和谐海洋五个方面。

探索认知海洋是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先决条件。人类对海洋的探索永无止境，只有全面、准确、深刻地了解海洋，掌握海洋的运动规律，才能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认识海洋，一是要强化海洋科学研究，二是要强化海洋专门人才的培养，三是要强化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海洋，发展壮大海洋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也是实现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用海洋,一是要强化规划和区划的引领作用,二是要提高海洋开发利用水平,三是要提升海洋调查评价能力。

链接

中国首个海洋国家实验室在青岛启动

经过 15 年的筹建,海洋国家实验室在山东省青岛市正式启动。2015 年 9 月青岛海洋国家实验室科学考察船队及其基础条件公共平台、海洋创新药物筛选与评价平台建设计划任务书已通过专家评审,这标志着实验室先期重点建设的三个大型科研平台全部进入建设阶段。

当前,我国海洋事业正进入全面快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成立海洋国家实验室首要的是在基础研究方面,通过认识、了解其中的规律,总结更好的方法,以使我们能够进入海洋、利用海洋、管控海洋。海洋国家实验室将在海洋生命、海洋工程等科学领域进行科研,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可靠保障。

海洋国家实验室将面向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需求,紧跟世界海洋科技发展潮流,选择海洋动力过程与气候变化、海洋生命过程与资源利用、海底过程与油气资源、海洋生态环境演变与保护、深远海和极地极端环境与战略资源、海洋技术与装备六大方面作为重点研究方向。明确将西太平洋—南海—印度洋动力过程与环境气候安全(透明海洋)、蓝色生命过程与资源开发利用(蓝色粮仓)、西太平洋洋陆过渡带深部过程与资源环境效应作为实验室未来 3~5 年的重大科研任务。

 简政放权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2013年3月1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决定用3~5年时间完成该《方案》提出的各项任务，加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狭义的简政放权主要是指精简政府机构，把经营管理权下放给企业。广义的简政放权，还包括把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简政放权是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职责不分、政府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的状况，为增强企业活力，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而采取的改革措施。

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简政放权依然是重中之重的内容。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2014年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主题是“简政放权”。本轮简政放权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放权对象既包括下一级政府，也包括社会、市场和个人。

简政放权，精简的是束缚着市场主体的“无形枷锁”和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有形之手”，放活的则是企业的活力、发展的动力和全社会的创造力。地方正在推行两份清单：一份“权力清单”针对政府自身，一份“负面清单”则面向企业投资者。放管并重，意味着既要积极主动地放掉该放的权，又要认真负责地管好该管的事，以更有效的“管”促进更积极的“放”，使政府职能转变取得成效。

链接

2016年5月9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时说,公开透明是现代政府基本特征,要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要加大政府信息数据开放力度。目前我国信息数据资源80%以上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里,“深藏闺中”是极大浪费。

他说,简政放权改革成效必须要有具体衡量标准:一要看改革后企业申请开办的时间压缩了多少;二要看投资项目审批提速了多少;三要看群众办事方便了多少。要形成明确的量化指标,不能用模糊不清的概念。他要求,今年再削减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和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50项以上;削减国务院部门设置职业资格比例达到70%以上;削减一批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和资质认定。中央层面核准企业投资项目削减比例要达到90%以上。

他提出,要加紧制定国务院部门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在部分地区试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进一步压缩负面清单;加快编制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各方面清单,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等目标任

务,明确了司法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014年11月20日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历史性地列为全会的主题,司法体制改革掀开了新的篇章。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1. 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

2. 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

3. 推进严格司法。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健全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办案结果符合实体公正、办案过程符合程序公正的法律制度。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

4.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坚持人民司法为人民,依靠人民推进公正司法,通过公正司法维护人民权益。在司法调解、司法听证、涉诉信访等司法活动中保障人民群众参与。

5. 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强化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辩论权、申请权、申诉权的制度保障。

6. 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

链接

2015年9月2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进展及成效等情况发布会,介绍十八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进展及成效。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16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其中11次涉及司法体制改革议题,审议通过了23个司法体制改革文件。中央政法各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文件。



目前,一些改革方案已经出台,一些重要改革举措已经全面推开,一些重大改革任务已经开展试点,一些改革事项正在研究论证,司法体制改革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和明显成效。第一,司法管理体制改革正有序推进;一是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二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和职业保障制度;三是健全防止人为干扰司法的制度;四是深化公安改革;五是深化律师制度改革。

第二,人权司法保障机制建设取得积极成果。一是全面废止了劳动教养制度;二是健全错案防止、纠正、责任追究机制;三是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四是逐步减少适用死刑罪名;五是规范涉案财物处置的司法程序。

第三,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逐步推开。一是推进司法责任制等改革试点;二是积极推进司法公开;三是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四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改革试点;五是完善维护司法权威的法律制度。

第四,执法司法便民利民举措陆续出台。一是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二是公安机关在深化交通管理、户籍管理、出入境管理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便民利民举措;三是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司法责任制

国家特定机关或特定主体根据法律规定,通过必要程序确认法官的行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制度。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对进一步完善司法责任制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

切实保障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严格规范案件质量认定标

准、明确行之有效的责任承担形式，是构建法官司法责任制的三个核心要素。

建立和完善司法责任制是司法改革的关键环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求公权力行使坚持“有权必有责、权力受监督”原则。司法权虽有其自身特点和运行规律，但也受此原则约束，理应实行司法责任制，以严格司法、公正司法，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发生，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司法权威。

链接

2015年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若干意见》。

《意见》共分六部分48条，除目标原则和附则外，分别为改革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审判责任的认定和追究、加强法官的履职保障等，较为完整地明确了审判责任的前提、基础、范围、规则、程序、保障等主要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一）探索改革审判组织模式；（二）改革裁判文书签署机制；（三）推行院庭长办案常态化；（四）建立专业法官会议；（五）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六）明确司法人员职责和权限；（七）明确违法审判责任的七种情形；（八）加强法官依法履职保障。

权力清单

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以列表清单的形式公之于众。



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2014年9月10日，李克强总理在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开幕式致辞时说，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2015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

“权力清单”的具体内容包括：

1. 权力清单制度的原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力清单应当涵盖我国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凡是不涉及国家秘密的公共权力都应在公开之列，不应存在任何“暗区”甚至“盲区”。

2. 权力清单制度的关键是精确明细。对于每一项公共权力，“权力清单”都应明确权力的名称、来源（其依据的法律法规）、行使部门、行使规则、监督投诉渠道等。

3. 权力清单制度的核心是简政放权。围绕减少层次、优化流程、提高效能、方便办事的目标，分析每项权力的运行过程，找准权力运行的关键节点，厘清各个节点的内在联系，优化权力运行流程，固化业务操作程序。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与实行问责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权力意味着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授之有据、行之有规、错之有责是法治政府的应有之义。对于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来说，明晰权力的过程也是明确责任的过程，公布了政府的权力也就公布了政府的责任，这样人们就可以通过权力清单了解政府的权力范围和责任界限，促使政府更加审慎地对待和行使权力。

链接

新华网评论：把政府自身建设的基础夯实

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民主法治进程不断加快，政府治理能力取得长足进步。不过，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期待相比，政府的工作理念、管理内容、运行方式、治理水平还存在诸多不适应的方面。

首先，有些政府部门长期以来对自己拥有多少权力并不十分清楚，层级之间、部门之间有的职责还不明确，职责交叉重叠问题仍比较突出。只有对现有行政职权全面梳理、清理调整、依法审核，才能搞清政府的权力“家底”，让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自身到底有多少职权心中有数，并更好地履职尽责；让层级之间、部门之间进一步厘清职责关系，解决多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部门职责交叉、相互推诿扯皮等问题；让机构、人员根据其行政职权得到更加科学合理的配置。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于提质增效、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靠短期刺激政策等手段拉动增长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大力简政放权，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只有给行政权力“做减法”，明确列出权力清单，切实做到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才能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权责边界，促进简政放权，从根本上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为企业创新、大众创业提供更多机遇和更好环境。同时，只有把权力“晒”出来，也才能进一步改变政府权力运行过程不够透明、权责不对等、对权力的监督不够有力等问题，让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进而消除权力寻租和设租空间，实现对腐败现象釜底抽薪。

（2015 年 3 月 24 日）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2013年11月9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真正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作为治理体系核心内容的制度，其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但是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和制度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和理顺两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推进深化改革的逻辑起点。“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的和结果。

链接

教育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浦劬认为，把握国家治理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

第一种，简单按照西方“治理”概念的含义，来套解我国全面深化改

革的目标。这一倾向忽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的首要内容和前提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无视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总体格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总揽全局、统筹各方，其实际运行是一个领导核心，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简单片面地按照西方“治理”概念的含义解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中“国家治理”的含义，认为“治理”不同于“管理”，是多主体、多中心的治理或者社会自治；或者认为“治理”与“管理”的一字之差，就是民主政治与非民主政治的区别，如此等等。

第二种，简单认为“治理”的概念只是西方政治理论和管理理论的专利。实际上，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掌政权、运行治权、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改革开放目标层面上，总结历史经验，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确定为改革的关键和目标。因此，其根本理论逻辑出自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其历史逻辑出自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进程，其实践逻辑出自中国改革开放和问题解决的历史过程。

（《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9日）

政治生态

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

2014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2015年3月6日，在参加全国“两会”江西代表团座谈中，他还很形象化地要求“自然生态要山清水秀，政治生



态也要山清水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清正的从政环境，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命题。

良好的政治生态，可以内聚人心、外树形象，可以抓好班子、带好队伍，可以集中精力、形成合力。各级领导干部要自上而下、上下互动，从自身做起，带好头，不论是修养、作风、为人等各个方面，力争能够做到让人信服。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尤其是要有正确的人情观，不能为亲情所累、为私情所累、为人情所累。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正确对待自己、他人和群众。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要始终保持清正廉洁。这是领导干部做人做事的底线，底线就是高压线，碰不得。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管好自己，管好家属，管好身边人，做一个组织和干部群众信赖的人，做一个同事和朋友敬重的人，做一个家人和亲属引以为荣的人，做一个回顾一生能够问心无愧的人。

链接

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简称ECO，是ecosystem的缩写，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的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并在一定时期内处于相对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生态系统的范围可大可小，相互交错。太阳系就是一个生态系统，太阳就像一台发动机，源源不断给太阳系提供能量。地球最大的生态系统是生物圈，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是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人类主要生活在以城市和农田为主的人工生态系统中。生态系统是开放系统，为了维系自身的稳定，生态系统需要不断输入能量，否则就有崩溃的危险；许多基础物质在生态系统中

不断循环,其中碳循环与全球温室效应密切相关,生态系统是生态学领域的一个主要结构和功能单位,属于生态学研究的最高层次。

“生态系统”一词后来被广泛运用于其他领域。

公车改革

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社会化,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

2014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启动公务用车制度改革。2014年7月16日,《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下发,标志着公车改革正式启动。

公车改革的目的:为党政机关有效节约经费,遏制“车轮上的腐败”,重树政府廉洁形象。坚持社会化、市场化方向,推进中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合理有效配置公务用车资源,创新公务交通分类提供方式,保障公务出行,降低行政成本,推进廉洁型机关和节约型社会建设。

公车改革的目标:在2014年年底前基本完成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所属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公务用车制度改革,2015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用2~3年时间全面完成公务用车制度改革。通过改革,切实实现公务出行便捷合理、交通费用节约可控、车辆管理规范透明、监管问责科学有效,基本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公务用车制度。

链接

按照新方案,我国取消一般公务用车,普通公务出行社会化,适度发

放公务交通补贴。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及以下500元。

2015年1月,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透露,中央层面取消的3184辆公务用车已全部封存停驶,2015年春节前将正式启动第一批约300辆的拍卖,同时公布了9个车辆处置的鉴定评估、拍卖和解体机构。

2015年1月25日,中央和国家机关本级取消的106辆公务用车将举行首场不带牌照的“裸拍”。经过竞价,106辆车全部成交,拍卖金额总计660.9万元。

2015年9月,中国至少有16个省份已经成立了省级公车改革领导小组,并设置办公室。小组组长一般由省长或副省长担纲,办公室领导成员一般包括省级发改委、机关事务管理局、财政厅、审计厅等部门负责人。

中央国家机关车改已全面完成,共封存车辆3868辆,并向社会公开拍卖,2000多名司勤人员得到妥善安置;各省区市已基本完成车改总体方案制定。

(新华社,2016年9月16日)

户籍改革

2014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改革制度。

户籍制度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助性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它们构成了一个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倾斜,包含社会生活多个领域、措施配套、

组织严密的体系。政府的许多部门都围绕这一制度行使职能。

从狭义的角度分析,我国现行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1958年)、发展(1958—1978年)、初步改革(1978年至今)三个阶段。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宣告中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链接

2015年9月21日,公安部副部长黄明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国务院的意见出台以后,全国已经有24个省区市出台了具体的实施意见。

经梳理发现,目前已经出台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地区包括新疆、黑龙江、河南、河北、四川、山东、安徽、贵州、山西、陕西、江西、湖南、吉林、江苏、福建、广西、青海、甘肃、广东、重庆、云南、辽宁、湖北、内蒙古等。

观察各地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多数地区以2020年为时间节点,明确提出了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的具体目标。

以新近出台方案的几个省份为例,广东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1300万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广东城镇落户”;湖北提出“努力实现500万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内蒙古则提出“到2020年努力实现400万左右农牧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

此外,少数省份还提出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目标。其中,重庆提出“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以上,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河北提出“到2020年,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青海提出“到2020年,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以上”;江苏则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到5个百分点”。



协商民主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强调:“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2014年9月2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在政治学意义上,协商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或称“协商式民主”“结盟民主”,指在一个国家内可以有多个以种族、语言或宗教分割的政治力量并存,但同时依然保持很大程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主要是通过各个政治势力之间互相协商机制来取得的。协商民主理论源自并超越了自由民主和批评理论。它强调在多元社会现实的背景下,通过普通的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自由主义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不同层面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协商民主异军突起,在罗尔斯、哈贝马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推动下,协商民主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承认,成为当代西方民主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步步紧逼下,人们发现:“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类型,它能够有效地回应文化间对话和多元文化的社会认知的某些核心问题。”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概念,进而对“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进行规划和部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

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民主制度选择上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链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实际上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1941年，抗日根据地政权机构在人员分配上实行的“三三制”，就是中国式协商民主的雏形。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谈成立新中国的大事，标志着中国式协商民主形成并发挥作用。1978年人民政协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载入宪法，标志着人民政协作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载体得到肯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利益主体、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以及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我们党把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广泛运用到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不断推动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我们党反复强调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建立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协商机制。1993年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写入宪法。2011年中共中央正式使用协商民主这一概念，强调要把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结合起来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可见，中国式的协商民主并非照搬而来，而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实践探索经验的总结和凝练，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形式，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比拟、不可替代的作用。

（《河南日报》2014年1月15日）

“刀把子”

2015年1月20日，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培育造就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法队伍，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刀者，锋利也；把者，方向也。所谓“刀把子”，就是锋利的武器应该由谁掌握、向谁发力的问题。“一个有理智的人拿着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疯子手里有把刀”。政法机关是国家强力部门，拥有限制人身自由、收缴个人财产的强制力，一旦脱离了党和人民的掌握，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中，就会成为伤害党的事业和人民合法利益的犀利武器。“刀把子”论重申了1926年毛泽东同志的观点，就是锋利武器由谁掌握、向谁发力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用“刀把子”论要求广大政法干部弄清政法机关要打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重大问题。

链接

党的领导人曾多次提出过“刀把子”观点

第一次提出“刀把子”是在1926年的5月份。当时，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讲到，搞革命就是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体，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能掌握在自己人手上的话就会出乱子。这是党的领导人第一次提出“刀把子”这一说法。后来党的领导人和党内的一些文件也多次提到“刀把子”。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里就提到，军队是党和人民手中的枪杆子，政法部门是党和人民的“刀把子”。1998年，江泽民同志围绕打击走私活动发表

讲话,也提到政法是“刀把子”。胡锦涛同志也提出政法机关是反腐的“刀把子”,要从自身做起。

“习马会”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

2015年11月7日15:00,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进行了“世纪之握”,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意见,这是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会面使用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和名义,互称“先生”。2016年5月31日,《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在北京发布,“习马会”当选2015年年度十大流行语。

国务院台湾事务工作办公室主任张志军随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张志军表示,在此次两岸领导人会面中,双方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积极共识,具体如下:双方肯定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果。双方认为应该继续坚持“九二共识”,巩固共同政治基础,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加强沟通对话,扩大两岸交流,深化彼此合作,实现互利共赢,造福两岸民众。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该携手合作,致力于振兴中华,致力于民族复兴。

链接

“习马会”的重要意义

会面首先在于总结了两岸交往的历史经验,共同书写了两岸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习马会”上两岸领导人对两岸关系的政策主张阐述,不乏共



同点和相互呼应之处。两岸领导人都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的政治基础；两岸领导人视致力于中华民族复兴为两岸的共同使命；两岸领导人都认为，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彼此的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不应成为干扰两岸交流合作、伤害同胞感情的因素。这三个共同点，实际上构成了两岸关系最大公约数的主要内涵，由此也明确了巩固和发展两岸关系的基础。

会面发出了台海事务作为中国内部事务，应当由两岸中国人共同解决的信号。从1993年“汪辜会谈”以来，到2005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登陆”，再到此次两岸最高领导人会面，尽管期间两岸关系的发展曾经出现波折，但是从经济交流、人文交流到政治商谈的发展轨迹没有改变，两岸和平发展的趋势已初步形成。

会面开辟了两岸良性互动的新空间。对于台湾方面建立两岸热线的呼吁，大陆方面积极予以回应，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之间有望建立起沟通热线，从而推动两岸高层交往机制化、日常化。对于台湾涉外活动问题，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大陆愿意通过务实协商，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同时，大陆方面欢迎台湾同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欢迎台湾以适当方式加入亚投行。这些主张不仅有助于提振台湾经济，增进两岸的民心交流，也有助于两岸关系进一步向命运共同体演变。



容错纠错机制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让广大干部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辉煌成就，就是广大干部群众干出来的。”

近年来,一些领导干部的“不作为”现象不仅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而且在不同程度上贻误了改革攻坚和事业发展的大局。容错纠错机制就是要消除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畏惧心理,营造一个宽松、宽容、和谐的干事创业环境,为改革创新鼓劲。在经济新常态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各级政府和官员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索前进,过程中肯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区别对待,要宽容失败、允许试错、有错必改,特别是要为勇于创新者撑腰,倡导“为敢于担当者担当”精神。

“放管服”

简政放权、强化监管、优化服务。

2015年5月12日,李克强总理出席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时说,新时期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同时推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逐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6年5月9日,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计利当计天下利,要相忍为国、让利于民,用政府减权限权和监管改革,换来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释放。以舍小利成大义、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

链接

“放管服”打造经济新动能——我国简政放权改革综述

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持续较大的下行压力，我国经济实现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奠定较好基础。在这背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持续推进，成为中国经济动能转换的重要支撑。

推动放权新成效

在下行压力下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简政放权等改革措施催生经济内生动力。本届政府成立以来，国务院部门取消和下放大量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个人和企业资质资格认定事项大幅压减。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精简85%，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全面实施“三证合一、一照一码”。

今年以来，国家进一步取消咖啡师等百余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再宣布失效并停止执行506件国务院文件。此外，在全面实施“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再整合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对实现“五证合一、一照一码”作出部署。

专家认为，一系列改革，给市场让位，为企业松绑，让群众舒心，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带动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助力中国经济新动能加快培育。

探索监管新模式

上半年，全国新设市场主体783.8万户，比去年同期增长13.2%，平均每天新登记4万户。其中，新注册企业数量呈逐月上升的势头，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4万户，形成商事制度改革以来的一个高潮。

“目前，商事制度改革正处于深化、拓展时期，正处于从‘放活’向‘管好’推进的重要阶段。”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茅说。

商事制度改革正是我国简政放权改革的缩影。今年以来，我国在放权的同时，更加注重实施公正监管，推进综合监管，探索审慎监管，促进各类

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明确要建立和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范政府有关行为，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说，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有利于克服市场价格和行为扭曲，调动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与此同时，国家更加注重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创新市场监管方式，包括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手段对市场主体实行“智能”监管，构建新型监管制度。

张茅说，在商事制度改革过程中，要坚持“宽进”“严管”相结合，“放、管、服”相结合，积极建立以企业信息公示为基础、企业信用约束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机制。

（新华社北京2016年8月9日 记者陈炜伟、王攀、高敬）

“两个翻一番”

实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

2012 年 11 月 8 日，党的十八大提出，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两个翻一番”。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国民经济总量“翻两番”、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设想，后来，他又把这一设想发展成为“三步走”的战略构想。

“两个翻一番”。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两者是十八大报告中唯一的量化指标。和前两届党代会报告对比，尽管实现目标的时间节点都放在了 2020 年，但提法明显不同。十六大报告提出力争 GDP 比 2000 年翻两番，十七大报告提出人均 GDP 比 2000 年翻两番，而十八大报告在继续做大经济总量蛋糕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链接

“三步走”战略

1987 年 4 月 30 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外宾时初步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他说：“第一步在 80 年代翻一番。以 1980 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 250 美元，翻一番，达到 500 美元，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 20 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 1000 美元，进入小康社会；第三步，在下世纪再用 30 到 50 年的时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 4000 美元，

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全口径预决算

监督主体通过一系列方法和措施将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预算和决算的法制化运行机制。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引起社会普遍关注。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014年8月2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就《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作汇报时说，加强政府全口径预算管理，将政府所有的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依法规范政府收支行为，确保财政资金使用的安全、规范、有效。

全口径，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政府所有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均要纳入预算和决算的统计方法。全口径预算决算的监督主体为人大，人大审查并决定是否审批政府的财政收支计划，并最终决定预算决算。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实施主体为政府，政府根据地区财政收入和支出计划，制定财政预算决算草案，报请人大审批形成法制化的财政预算决算。

全口径预算管理是中国财政预算管理体制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特有名词，其产生与我国预算外、制度外政府收支的存在与发展是分不开的。为规范预算外、制度外政府收支而实施的一系列制度变革，反映了中国全口径预算管理改革的进程。



全口径预决算的形成和发展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21条中提出，“实行全口径预算管理和对或有负债的有效监控，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本级政府预算的审查和监督”。

2010年6月，财政部制发《关于将按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收入纳入预算管理的通知》，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将全部预算外收支纳入预算管理。相应修订《政府收支分类科目》，取消全部预算外收支科目。

深圳2014年出台了《关于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决算审查和监督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决算审查和监督的决定》，推动了政府首次编制全口径预算，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基金预算纳入本级预算草案提交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实现全口径预算审查监督的新突破。此前深圳的公共财政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只是提交代表大会审查批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和社保基金预算只是向人大常委会报告。



新型城镇化

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 as 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2013年11月，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最大不同，在于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注重保护农民利益，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

链接

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

——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 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45% 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 2 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 1 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城市群集聚经济、人口能力明显增强，东部地区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群成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的重要增长极。城市规模结构更加完善，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更加突出，中小城市数量增加，小城镇服务功能增强。

——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密度较高、功能混用和公交导向的集约紧凑型开发模式成为主导，人均城市建设用地严格控制在 100 平方米以内，建成区人口密度逐步提高。绿色生产、绿色消费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主流，节能节水产品、再生利用产品和绿色建筑比例大幅提高。城市地下管网覆盖率明显提高。

——城市生活和谐宜人。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常住人口，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善，消费环境更加便利，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空气质量逐步好转，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自然景观和文化特色得到有效保护，城市发展个性化，城市管理人性化、智能化。

——城镇化体制机制不断完善。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生态环境等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阻碍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基本消除。

（选自《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改革红利

2012年12月，李克强总理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他说，他不完全赞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的说法，同时承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增加。“那我们还有什么红利可以利用呢？”他自问自答：“这就是改革，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李克强总理具体阐述了“改革红利”的几个观点，一是鼓励改革试点省市在法律框架内大胆、灵活地推进改革，先行先试，效果良好的话再入法巩固。如此渐进而坚实，可以避免大的波折。二是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又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意即要摸石头，要扫雷、排除荆棘。他认为中国近年来改革动力的失落，原因之一就是基层创新茫然、乏力。三是改革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为减轻改革阻力，要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等等。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改革能在以下两个方面带来巨大红利：

一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

调节为辅”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使社会财富不断涌流出来。具体来说，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分税制改革等，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资源配置不断优化，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二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经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现在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研究表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效率；改革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促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由于工业生产效率高于农业，因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

链接

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

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2

万多字，涉及 16 个方面，其中 15 个是改革领域，有 60 条，其中 55 条是重大改革任务，可见改革力度空前。由于全文共 60 条，因此，称之为“全面改革 60 条”。

自由贸易区

广义上的自由贸易区有两层含义：一是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比世贸组织有关规定更加优惠的贸易安排；二是在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狭义上仅指提供区内加工出口所需原料等货物的进口豁免关税的地区，类似出口加工区。广义上还包括自由港和转口贸易区。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是指在国境内关外设立的，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原则上是指在没有海关“干预”的情况下允许货物进口、制造、再出口。中国自由贸易区是政府全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最重要的举动，其力度和意义堪与 20 世纪 80 年代建立深圳特区和 90 年代开发浦东两大事件相媲美。其核心是营造一个符合国际惯例的，对内资和外资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商业环境。



国务院已正式批准设立四个自由贸易区

2013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4年12月28日，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其中广东自贸区立足面向港澳深度融合，天津自贸区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契合，福建自贸区着重进一步深化两岸经济合作。

中国经济升级版

在2013年3月17日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概念。2013年6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同出席第四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会的美方代表就中美关系、两国经贸合作等问题进行座谈时做了进一步阐述：中国正在打造经济升级版，将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扩大对外开放。

2013年6月24日，《瞭望》杂志刊文指出，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就是“共同富裕，充分就业；高效低耗，环境优美；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创新驱动，活而有序”。

“共同富裕，充分就业”，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形成“橄榄形”的收入分配结构，使全国人民共享发展成果。“高效低耗、环境优美”，就是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物质资源消耗，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从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实现产业升级。通过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排放物的资源化



和再利用,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提高环境的密集度和舒适度,建设美丽中国。“城乡一体、区域协调”,就是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尽快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点是改革土地管理体制,落实农户对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地和宅基地的用益物权,使之成为农户财产性收入来源。“创新驱动,活而有序”,就是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和自主品牌的产品带动产业升级,重点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早日建成创新型国家。

链接

2013年3月29日,李克强在上海召开部分省市经济形势座谈会时强调,用勇气和智慧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李克强强调,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首先要立足于扩大内需,在扩大开放中培育和拓展好国内市场,这是在风云变幻中确保发展能够不断持续的重要基础。

李克强说,经济转型升级要体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稳增长,首先要看就业稳不稳,要更加注重向调整结构要就业,特别是要围绕经济升级的需求,像“抓工业上项目”那样对发展服务业下功夫、出实招,释放扩大就业潜力。

李克强指出,稳定经济大势,既要发挥宏观政策的作用,更要依靠改革促进转型,激发社会、企业、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要抓紧清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取消不合理的政策和制度规定,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使他们在更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参与竞争。特别是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向市场放权、为企业松绑,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

李克强希望长三角区域发挥基础雄厚、区位独特的优势,在改革开放上大胆探索、先行先试,既走在率先发展的前列,又作出率先升级的表率。

京津冀一体化

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开始于改革开放后的 20 世纪 80 年代，“京津冀一体化”概念出现已经有 20 多年时间。党的十八大之后，京津冀一体化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201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京津“双城记”；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又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4 年 2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4 年 3 月 5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

京津冀一体化由首都经济圈的概念发展而来，包括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的保定、唐山、石家庄、邯郸、邢台、衡水、沧州、秦皇岛、廊坊、张家口和承德，涉及京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 11 个地级市。区域面积约为 21.6 万平方公里，人口总数约为 1.1 亿人，其中外来人口 1750 万。

京津冀整体定位是：“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区域整体协同发展改革引领区、全国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新引擎、生态修复环境改善示范区。”三省市定位分别为，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链接

2016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全面落实、加快推进的关键之年

2015年年底，津保铁路开通，京津冀城市群间的连接更加紧密。

2016年河北将推进交通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加快京沈客专、唐曹铁路、首都地区环线等项目建设，开工建设京唐、京霸、廊涿城际和白沟支线，打通扩容一批“断头路”“瓶颈路”。

石家庄、保定、廊坊三市还要与京津共建50家科技园区，一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基地，这意味着大项目向三地投资快速增长长期即将到来。

北京平谷区“两会”上明确，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线路，轨道交通平谷线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复。该工程列入北京市重点项目，预计2016年上半年开工建设。

通州区委书记杨斌指出，通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除了做好交通连接、生态合作、人才交流之外，更深层次的产业链深度融合必须做好几个区域高端要素市场、产权交易平台、科技和金融中心等具体项目。

负面清单

一个国家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对某些与国民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在一些实行对外资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有关这方面的要求也以清单形式公开列明。

2013年9月27日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出：“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借鉴国际通行规则，对外商投资试行准入前国民待遇，研究制订试验区外商投资与国民待遇不符的负面

清单，改革外商投资管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让外资企业可以对照这个清单实行自检，对其中不符合要求的部分事先进行整改，从而提高外资进入的效率。与负面清单相对应的是正面清单，即列明了企业可以进行什么领域的投资。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3年）》，以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等为依据，列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外商投资项目和设立外商投资企业采取的与国民待遇等不符的准入措施。负面清单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及代码》（2011年版）分类编制，包括18个行业门类。S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和T国际组织两个行业门类不适用负面清单。

链接

负面清单与正面清单的比较

正面清单是指政府允许的市场准入主体、范围、领域等均以清单方式列明。

在正面清单模式下，外资只能在清单范围内享有国民待遇；而在负面清单模式下，外资能够享受到清单范围之外所有的与东道国国民相同的待遇。针对政府的负面清单与针对市场主体的正面清单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这种混合清单主要是指把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和活动的领域或情况以清单的形式清晰列出来，清单之外的领域或情况则是企业受禁止的或者受限制的，这也就是把企业关进了“制度笼子”，而这笼子外的广阔空间则是政府自由活动的空间。这种治理模式一方面往往压缩了市场的自发活动空间，导致企业的自发性行为受到极大的限制，压制了企业的创新欲望和创新能力，降低了经济的内在活力；另一方面过分地放大了政府的权力作用空间，容易导致以下几个后果：政府权力的滥用，强化政府决策的随意性和权变



性,滋生权力寻租和腐败,扭曲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社会运行成本。

按照正面清单管理模式的相关原则,市场主体就无法进入这些领域或业态,这就严格限制了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自由。即便减少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也可能会在法律的空白领域设置大量变相许可,如核准、备案、达标、验收等,从而规避行政许可法定的相关原则,使得实践中各种不予备案、不予验收等措施仍然会通行无阻,限制了市场主体的行为自由。这就导致如下结果:只要法律不明令禁止,行政机关都敢做;只要政府没有明确准许,市场主体都不能做。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只有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领域,市场主体才无法进入,凡是清单没有列明的领域,市场主体均可以进入。因此,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相比,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赋予了市场主体更充分的行为自由——凡是法无禁止的,即推定市场主体有行为的自由,在“法律的沉默空间”,政府机关也不得设置额外的审批程序,变相规避行政许可法定的原则。



精准扶贫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论断。

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两会”贵州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2015年1月,习近平新年首个调研地点选择了云南,总书记强调要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5个月后,总书记来到与云南省毗邻的贵州省,强调要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并提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习近平总书记对精准扶贫的内涵进行了形象而深刻的阐述。

2012年年底到河北阜平老区考察时,他说不要用“手榴弹炸跳蚤”。

2015年3月8日全国“两会”期间,他到广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把扶贫攻坚抓紧抓准抓到位,坚持精准扶贫,倒排工期,算好明细账,决不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

2015年6月18日,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他就加大力度推进扶贫开发工作提出“四个切实”的具体要求: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要做到“六个精准”,即: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

2015年10月16日,他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要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增加扶贫投入,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坚持中国制度优势,注重六个精准,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链接

十八届五中全会:实施脱贫攻坚工程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因人因地施策,提高扶贫实效。

分类扶持贫困家庭,对有劳动能力的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致贫的提供医疗救助保障。实行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衔接,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配置资源指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市场机制根据市场需求与供给的变动引起价格变动从而实现对资源进行分配、组合及再分配与再组合的过程。市场配置资源主要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来进行。价值规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和合理。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在思想上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在行动上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让市场和个人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

链接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国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

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

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经济新常态

一般是指一个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危机、经济调整之后出现的一个过渡阶段的经济运行态势。

2013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要求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

在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全面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三个特点、四个机遇和一个挑战。

三个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四个机遇：第一，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实际增量依然可观。第二，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第三，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第四，

新常态下，中国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

一个挑战：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

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讲话指出，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

链接

“新常态”（New Normal）一词开始于西方学者。最初，在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2009年5月出版物中提出“新常态”一词之后，这一概念只在经济、市场和政治领域吸引了有限的支持。后来的五年，世界经济低迷，增长缓慢，失业率之高令人震惊，于是“新常态”概念逐渐被广泛接受。其间，卡门·莱因哈德（Carmen Reinhart）、肯·罗格夫（Ken Rogoff）、萨默斯（Larry Summers）、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辜朝明（Richard Koo）、托马斯·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等人所做的细致分析工作也促进了“新常态”概念被广泛认可。

其基本含义是，一个经济体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过度经营、过度借债、随意冒险和信贷扩展之后，需要很多年才能完全恢复，经济活动将会持续处于缓慢萧条、失业率异常居高的状态，而不会很快弹回增长状态（“V”字形弹性恢复）——这种观点是最初的推理依据。紧接着，政策回应进一步造成发展滞后，总需求不足加剧了经济增长和就业的艰难程度，西方经济体很可能无法从此次经济危机重新回归从前的经济循环，也不能循着旧日辉煌轨迹，人们开始关注供应方面因素。

显然，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内涵与西方学者和西方国家眼中的新常态存在很大差别。

城乡一体化

以人为本，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

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
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
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
为首要任务。”2015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
统筹谋划，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
一体，形成双轮驱动。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就是要把
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
划，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
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改变长期形
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
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让农民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样的文明和实惠，使整
个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一体化是随着生产力的
发展而促进城乡居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变化的过程，使城
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
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空间、政策（制度）
上协调发展。

链接

日本避免“城乡二元结构”

日本在 20 世纪前半叶因追求发展工业，一度出现工农收入和城乡差距拉大等现象。但此后，日本通过根本性制度安排，从源头上避免“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实现了较为均衡的统筹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根本性制度安排成为日本避免“城乡二元结构”出现的核心因素。首先，城乡居民享受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在户籍、政治权利、社会保障和人员流动等政策上对城乡居民一视同仁，避免人为造成城乡差别。其次，消除阻碍人员、资金等经济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壁垒，促进各种资源向农村和落后地区流动。第三，重视城市化过程的总体布局，避免出现“城乡结合部”和“贫民窟”。由于规划合理、配套齐全，日本很多大城市带动了周边大片区域发展，东京周边的“首都圈”和大阪神户周边的“阪神圈”等发达经济圈应运而生。

“一元公司”

新《公司法》取消公司最低注册资本限制（此前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 3 万元），现今无论多少钱均可注册，被社会通俗地解读为“一元公司”。

2013 年 12 月 2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修正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通过，新《公司法》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一元公司，是指依照法律规定、遵守法定程序、仅用一元钱注册而成立的公司。在新《公司法》颁布之前，我国长期对公司有最低注册资

本限制，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分别为500万元、3万元和10万元。新《公司法》放宽了公司注册资本登记条件，直接为一元公司的产生提供了制度上的便利和保障，一元公司随即有了产生的可能性。

链接

外媒称中国掀起“大众创业”热潮：人人想当马云

外媒称，中国已经掀起一股创业热潮。这里的空气中弥漫着金钱的味道，似乎到处都能听到白手起家创业致富的励志故事。

据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4月22日报道，中国互联网图书销售商当当网上列出的带有关键词“创业”的图书超过了2.7万种，而在亚马逊网站上输入相同的搜索关键词后，仅能找到1.1万条相关结果。一些创业故事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当当网排名首位的创业类图书名为《永不放弃：马云给创业者的24堂课》。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如今的资产超过200亿美元。他最早的职业是英语教师，每月收入大约仅为12美元（约合74.35元人民币）。在中国的书店里，有关成功学的书籍在塞得满满的自助类图书区域中占据了很大一块地方。

上述故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们都是真实的。从无名小卒崛起为商界大亨的中国顶级企业家不仅只有马云，还有“中国手机之王”雷军。雷军创建了科技界巨擘小米公司，40岁出头就成了亿万富翁。此外，还有特立独行、连续创业的企业家史玉柱。由普通人创立的数以百计的中国内地公司已在香港或美国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有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在这一过程中诞生。能在美国或香港上市，获得全球最为成熟完善的资本市场的认可，对世界各地的初创公司而言都堪称终极荣誉。

创立企业，赚到数百万元或数亿元，如今这在中国显得既引人注目又稀松平常。这个国家的“90后一代”年轻人在一个具有连通性和创新性的时代长大成人。他们从小就一直听说有关把新鲜点子转化为巨额财富的



故事。中国最活跃的风险投资人士决心在他们中间发现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知名风险投资基金美国国际数据集团为资助90后年轻人开展的创业项目拿出了1亿美元,迄今为止已经为一个动漫应用程序、一家卡拉OK网站和一家互联网露营服务提供商分别注入了资金。

(参考消息网,2015年4月24日)



土地流转

土地使用权的流转。

201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要求大力发展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五年内完成承包经营权确权。2015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分别做出批示,要求规范有序探索和推进土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

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拥有土地的长期经营使用权。这里所说的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使用权流转。具体而言,是指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户将土地经营权(使用权)转让给其他农户或经济组织,即保留承包权,转让使用权。可以通过转包、转让、入股、合作、租赁、互换等方式出让经营权,鼓励农民将承包地向专业大户、合作社等流转,发展农业规模经营。

土地流转必须坚持四大原则:坚持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原则;维护农民的权益,坚持“自愿、有偿、依法”的原则;坚持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土地同其他生产要素优化组合的原则;坚持保护耕地重点保护基本农田的原则。

链接

土地流转的五大模式

土地互换：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户，为方便耕种和各自的需要，对各自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简单交换，是促进农村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经营的必由之路。

土地出租：在市场利益驱动和政府引导下，农民将其承包土地经营权出租给大户、业主或企业法人等承租方，出租的期限和租金支付方式由双方自行约定，承租方获得一定期限的土地经营权，出租方按年度以实物或货币的形式获得土地经营权租金。其中，有大户承租型、公司租赁型、反租倒包型等。

土地入股：入股，亦称“股田制”或股份合作经营，是指在坚持承包户自愿的基础上，将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价入股，建立股份公司。在土地入股过程中，实行农村土地经营的双向选择（农民将土地入股给公司后，既可继续参与土地经营，也可不参与土地经营），农民凭借土地承包权可拥有公司股份，并可按股分红。该形式的最大优点在于产权清晰、利益直接，以价值形态形式把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确定下来，农民既是公司经营的参与者，也是利益的所有者，是当前农村土地流转机制的新突破。

宅基地置换：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重庆被国家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在土地改革领域率先进行大胆探索，创造了土地流转的九龙坡模式即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也就是说，农民放弃农村宅基地，宅基地被置换为城市发展用地，农民在城里获得一套住房。农民放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城市社保，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

股份合作：“股份+合作”。山东省宁阳县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新机制，建立起“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分配方式。这种模式是，农户以土地经营权为股份共同组建合作社。村里按照“群众自愿、土地入股、集约经营、收益分红、利益保障”的原则，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



合作社按照民主原则对土地统一管理，不再由农民分散经营。合作社挂靠龙头企业进行生产经营。合作社实行按土地保底和按效益分红的方式，年度分配时，首先支付社员土地保底收益每股（亩）700元，留足公积公益金、风险金，然后再按股进行二次分红。

（土流网，2016年1月11日）



新经济

建立在信息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经济持续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并存，经济周期的阶段性特征明显淡化的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作主旨演讲时曾介绍“新经济”的主要内容。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这是“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6年4月15日下午，李克强总理到北京大学考察，为北京大学推出的“新经济指数”点赞，称赞此举是一项开创性工作。

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出现了第二次大战后罕见的持续性的高速度增长。在信息技术部门的带领下，美国自1991年4月份以来，经济增长幅度达到了4%，而失业率却从6%降到了4%，通胀率也在不断下降。如果食品和能源不计在内的话，美国1999年的消费品通胀率只有1.9%，增幅为34年来的最小值。这种经济现象当时被人们表述为“新经济”。20世纪末互联网泡沫的破灭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发生，使美国新经济遭遇重挫。

李克强总理指出，“新经济”的覆盖面和内涵非常广泛，涉及一、二、

三产业，不仅仅是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发展“新经济”是要培育新动能，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是题中之义。“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正面临转型的阵痛期，再让传统动能继续保持过去那样的高增长，不符合经济规律。”李克强总理说，“但只要我们的坚韧地走过来，让‘新经济’形成新的‘S型曲线’，就会带动起中国经济新的动能。”

链接

2015年中国新经济年会揭晓出2014年度“十大新经济关键词”

网络信息安全。随着网络空间重要性的不断上升，社会、经济、生活、生产等活动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互联网上，各国均开始重视网络空间战略。在此背景下，网络空间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也将成为未来国家经济、政治、军事的核心。

4G正式商用。2014年，中国4G商用化顺利起步。中国电信业谋变的节奏加快，虚拟运营商、铁塔公司成立……让市场各方猜想无限。不到一年时间，4G用户总数达到9000万，4G网络的基站总数也超过70万个，4G终端款式已经有600多款，4G资费在不断下降，三大运营商也在纷纷向产业链示好，4G正以超出所有人预期的速度成长。

中概股上市潮。微博、途牛网、聚美优品、京东、阿里巴巴、智联招聘、迅雷、9158母公司天鸽互动、联众、陌陌、蓝港互动……赴美上市大戏一场接着一场。

BAT生态圈。BAT是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的合称。这三大巨头犹如国内互联网企业顶级的存在，是无数互联网企业甚至许多存在百年的实体企业仰望的高山。2014年，BAT再上一个量级至千亿美元，显著拉开与第二梯队的差距，逆袭的故事越来越少。

跨界转型。2014年，互联网的风口处，各路资本纷纷上演跨界转型记。



卖烟花的跑去拍电影、开饭店去玩大数据云计算、拍电影的改行做投资、做投资的跑去买地产、做地产的跑去卖矿泉水、盖百货的跑去做电商、做电商的跑去建民营银行……

O2O。回望2014，言必称 Online To Offline。O2O 被互联网企业视作服务下沉、构建服务生态体系的利器，被线下商家视作寻找用户蓝海的新生命线，你好我好，用户好。

互联网金融。2013 年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的元年，2014 年更加耀眼夺目。微信红包打响了2014 年互联网金融的第一枪，让传统金融机构再次见识互联网企业攻城略地的实力。

智能化。一边是互联网，一边是传统制造业，看似不搭的两个行业在移动互联网和智能转型的大潮下，汇聚在一起，碰撞出惊人的化学反应，智能硬件产业横空出世。

首富之争。或许是因为马云和王健林那场著名的非正式赌约，许多人把阿里巴巴和万达商业地产这两场 IPO 盛宴视作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和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一次比较，更有爱热闹者将其具象地理解为“首富之争”。



“两手论”

发挥好“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双重作用。

2014 年 5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在经济发展中要坚持“两手论”。2016 年 3 月 5 日，他在参加他所在的上海代表团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指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

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就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看不见的手”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自然秩序”规律所作的比喻。“看不见的手”指的是市场作用，“看得见的手”指的是政府之力。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和市场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行为往往表现为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市场功能往往表现为供求、价格自发调节和公平竞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链接

党对市场的定位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五大依然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定位，更为透彻地表达了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真谛。习近平在对《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

2014年5月2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决定性作用’和‘基础性作用’这两个定位是前后衔接、继承发展的。”



文旅经济

文化与旅游两种资源有机结合，或人文和自然两种资源有机结合的新型经济。

2014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2015年11月1日，2015韩国“中国旅游年”在首尔国会议员会馆举行闭幕式，李克强总理在致辞中祝贺2015“中国旅游年”在韩国顺利圆满举办。他表示，旅游不仅是经济活动，也是人文交往。“文旅经济”渐成一个热词。

文旅经济的特征：一是具有稀缺、人文、自然三大现代主流经济的关键元素；二是和当代公认的知识经济类型一样，以人力资源为第一要素，着力营造社会创新环境，打造自主知识产权，依托文化创意提升经

济品质，以技术进步主导经济增长；三是不参与争夺土地、石油、矿藏、能源等不可再生资源，甚至比通信网络、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清洁能源更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四是与其他经济的关联性强，能够带动工业经济、临港经济、山区经济、商务经济等众多经济形态，比工业经济更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五是适宜培育休闲文化，吸引高端人才和新兴产业落户创业。

链接

新华社海口 2016 年 1 月 29 日电（记者周慧敏、齐中熙） 2016 年，我国旅游业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预计国内旅游 43.8 亿人次，增长 9.5%；旅游入出境 2.63 亿人次，增长 5%。旅游投资达到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

2016 年，我国国内旅游收入预计达到 3.8 万亿元，增长 11%；国际旅游收入 1210 亿美元，增长 6.5%；旅游总收入预计 4.55 万亿元，增长 10%。

据初步测算，2015 年我国全年接待国内外旅游人数超过 41 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达 4.13 万亿元。中国公民出境旅游人数达到 1.2 亿人次，旅游花费 1045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2% 和 16.7%。全年旅游业对全国 GDP 的直接贡献为 3.32 万亿元，占 GDP 总量比重的 4.88%；综合贡献为 7.34 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 10.8%。旅游直接和间接就业 7911 万人，占全国就业总人口的 10.2%。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2014 年 9 月 10 日，李克强总理在天津召开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

次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2015年6月16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措施的意见》，明确指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培育和催生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的必然选择，是扩大就业、实现富民之道的根本举措，是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和创业活力的有效途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把创业、创新与人、企业这几个关键要素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突出要打造经济增长的引擎，而且突出要打造就业和社会发展的引擎，不仅突出精英创业，而且突出草根创业、实用性创新，体现了创业、创新、人和企业“四位一体”的创新发展总要求，揭示了创新创业理论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为创新创业理论和实践研究开辟了崭新的新天地。

2015年7月27日，李克强总理在出席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时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既发挥好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和科技人员的骨干中坚作用，又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链接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事记

1.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市场要活、创新要实、政策要宽，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
2. 2014年9月10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致辞时，指出：“只要大力破除对个体和企业创新的种种束缚，形成‘人人创新’‘万众创新’的新局面，中国发展就能再上新水平。”
3. 中共中央政治局2015年2月12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共中

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中指出，完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和任务，关键是稳和进相互促进，要着眼于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坚持稳政策稳预期、促改革调结构，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推动经济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

4. 2015年3月5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再次提到要“把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就一定能够迎来万众创新的新浪潮”。由此，“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浪潮开始引发公众关注，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之一，也成为2015年热点事件之一。

5. 2015年3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为创新型企业提供综合金融服务；开展互联网股权众筹融资试点，增强众筹对大众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力。

6. 2015年5月7日，李克强总理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考察调研。他强调，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充分激发亿万群众智慧和创造力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重要途径，要坚决消除各种束缚和桎梏，让创业创新成为时代潮流，汇聚起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新动能。

7. 2015年6月16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这是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系统性、普惠性政策文件。

8. 2015年7月6日下午，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会见出席首届世界华侨华人工商大会的全体代表，李克强强调，中国正着眼于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着力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

9. 2015年7月27日，李克强总理出席国家科技战略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既发挥好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和科技人员的骨干中坚作用，又最大限度地激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10. 2015年10月19日，李克强总理在北京出席首届“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并考察主题展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发展方式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结构性改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打造发展新引擎。”

11. 李克强总理 2015 年 11 月 5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削减前置审批、推行投资项目网上核准，释放投资潜力、发展活力；部署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and 运用，助力创新创业、升级“中国制造”。

12. 2016 年 3 月 2 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规定》强调要打通科技与经济结合的通道，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企业等创新主体及科技人员转移转化科技成果，推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互联网 +

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领域之中。

2014 年 11 月，李克强总理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2015 年 3 月 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2015 年 7 月 4 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这是推动互联网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加速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各行业创新能力，构筑经济社会发展新优势和新动能的重要举措。

“互联网+”目的在于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互联网+”行动计划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现代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等的融合创新，发展壮大新兴业态，打造新的产业增长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环境，为产业智能化提供支撑，增强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互联网+”有六大特征：

一是跨界融合。+就是跨界，就是变革，就是开放，就是重塑融合。

二是创新驱动。粗放的资源驱动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变到创新驱动发展这条正确的道路上来。

三是重塑结构。信息革命、全球化、互联网业已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地缘结构、文化结构。权力、议事规则、话语权不断在发生变化。

四是尊重人性。人性的光辉是推动科技进步、经济增长、社会进步、文化繁荣的最根本的力量，互联网的力量之强大从根本上也来源于对人性的最大限度的尊重、对人的体验的敬畏、对人的创造性发挥的重视。

五是开放生态。对“互联网+”而言，生态是非常重要的特征，而生态的本身就是开放的。推进“互联网+”，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把过去制约创新的环节化解掉，把孤岛式创新连接起来，让研发由人性决定的市场驱动，让创业并努力者有机会实现价值。

六是连接一切。连接是有层次的，可连接性是有差异的，连接的价值是相差很大的，但是连接一切是“互联网+”的目标。

链接

“互联网+”的主要形式

“互联网+工业”。即传统制造业企业采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改造原有产品及研发生产方式，与“工业互联网”“工业4.0”的内涵一致。

“移动互联网+工业”。借助移动互联网技术，传统制造厂商可以在汽



车、家电、配饰等工业产品上增加网络软硬件模块，实现用户远程操控、数据自动采集分析等功能，极大地改善了工业产品的使用体验。

“云计算+工业”。基于云计算技术，一些互联网企业打造了统一的智能产品软件服务平台，为不同厂商生产的智能硬件设备提供统一的软件服务和技术支持，优化用户的使用体验，并实现各产品的互联互通，产生协同价值。

“物联网+工业”。运用物联网技术，工业企业可以将机器等生产设施接入互联网，构建网络化物理设备系统（CPS），进而使各生产设备能够自动交换信息、触发动作和实施控制。物联网技术有助于加快生产制造实时数据信息的感知、传送和分析，加快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

“网络众包+工业”。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企业通过自建或借助现有的“众包”平台，可以发布研发创意需求，广泛收集客户和外部人员的想法与智慧，大大扩展了创意来源。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搭建了“创客中国”创新创业服务平台，链接创客的创新能力与工业企业的创新需求，为企业开展网络众包提供了可靠的第三方平台。

“互联网+金融”。从组织形式上看，这种结合至少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互联网公司做金融；如果这种现象大范围发生，并且取代原有的金融企业，那就是互联网金融颠覆论。第二种是金融机构的互联网化。第三种是互联网公司和金融机构合作。



全要素生产率

要素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开发利用的效率。

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要“增加研发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十三五”规划编制中加入的一个“新概念”。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又称为“索罗余值”，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Robert M. Solow）提出，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即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其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说，生产率与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都贡献于经济的增长。从效率角度考察，生产率等同于一定时间内国民经济中产出与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从本质上讲，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地区）为了摆脱贫困、落后和发展经济在一定时期里表现出来的能力和努力程度，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综合反映。

链接

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的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技术进步的程 度。

全部要素的生产率（TFP）无法从总产量中直接计算出来，故只能采取间接的办法：

$$GY=GA+\alpha GL+\beta GK$$

其中：GY——经济增长率

GA——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

GL——劳动增加率

GK——资本增长率

α ——劳动份额

β ——资本份额

老工业“二人转”

习近平总书记借用东北传统艺术形式指导当地经济转型。

2015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不能再唱‘工业一柱擎天，结构单一’的‘二人转’，要做好加减乘除。加法——投资、需求、创新，减法——淘汰落后产能，乘法——创新驱动，除法——市场化程度。现在加法多、其他少，亟待补课。”

二人转原是指我国东北地区的走场类曲艺、地方戏，是广泛流传于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及内蒙古自治区部分地区的戏曲形式，史称小秧歌、双玩艺、蹦蹦，又称过口、风柳、春歌、半班戏、双条边曲等。二人转融合了东北秧歌、民间说唱莲花落、戏曲、东北民歌、笑话、杂耍等曲艺形式，大约有300年的历史。

借用“二人转”帮东北老工业寻找出路，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延续。2011年，他考察吉林，悉心指导当地干部群众图跨越、谋振兴。2014年，他对东北振兴作出重要指示，为吉林新一轮振兴发展指明了方向。

链接

2016年4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发布。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深入实施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有关热点问题。

“新一轮东北振兴和2003年提出东北振兴有本质不同，那时要解决的

是生存问题，现在要解决的是转型发展问题。”国家发改委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司司长周建平说，现在东北地区面临的是如何适应新常态、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如何练好内功、如何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经济发展质量效益更好。

周建平说，目前正在研究制定新一轮东北振兴三年滚动计划，把重要任务和政策举措落实到年度。还将提出新一轮东北振兴的一批重大项目，同时在紧锣密鼓地编制东北振兴“十三五”规划。

他说，近三年滚动计划中初步计划有130多个项目，主要涉及基础设施等。

滚石上山、爬坡过坎

2015年7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春召开部分省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无论从东北地区来看，还是从全国发展来看，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都具有重要意义。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到了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国家要加大支持力度，东北地区要增强内生发展活力和动力，精准发力，扎实工作，加快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

“滚石上山”的典故，出自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西西弗斯犯罪，被罚推一滚石到山上。巨石沉重，山坡陡峭，石头每被推到山顶，旋即又滚落下来。但他毫不气馁，日复一日，不懈坚持，终其一生，都在和这种命运不屈地抗争。

这故事中的情境，和中国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比之又更为艰辛。“逆水行舟”虽然也是举步维艰，毕竟还有舟楫之

力、帆樯之便可以凭借,只要有风,终能破浪。而“滚石上山”的过程中,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凭借,必须拼尽全力,一往直前,无法偷懒,也不能中途停止,否则梦想和身体就会随石头一起无情地跌下山谷,摔得粉碎。德国思想家歌德就这样说过:“我现在已经活了75岁,没有哪一天过的是真正舒服的日子,就好像每天都在推着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我又不不停地推上去,未曾有片刻的偷懒或喘息。”

“爬坡过坎”说的是同样的意思。走山路的时候,免不了要上坡。如果坡很陡,远看起来,上坡的人就像在坡上爬行,所以叫“爬坡”。如果山太陡,两山之间会有山沟,越过山沟就叫作“过坎”。不管是“爬坡”还是“过坎”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很不容易。“爬坡过坎”这个词引申意是指完成某件艰巨任务的过程中很不容易,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链接

2015年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赴东北考察并主持召开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现场“督阵”东北经济,在座谈会上,他表示很“揪心”。

数据显示,2014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经济增速分别是5.8%、6.5%、5.6%,位列全国后五位,不仅低于全国7.4%的GDP增速,更是滑出了经济合理区间的底线。2015年,辽、吉、黑三省增速分别为3%、6.5%和5.7%,全部低于全国6.9%的增速水平。财政收入方面就更加不容乐观,2014年吉林财政收入增长4.9%,黑龙江增长1.8%,辽宁则下跌了4.6%,均远低于全国水平。2015年吉林财政收入为2.2%,辽宁和黑龙江都是负增长。

 众筹

大众筹资，是指用“团购+预购”的形式，向网友募集项目资金的模式。

2015年9月16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需要打造支撑平台。要利用“互联网+”，积极发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新模式，促进生产与需求对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融合，有效汇聚资源，推进分享经济成长，助推“中国制造2025”，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新格局。以众筹促融资。发展实物、股权众筹和网络借贷，有效拓宽金融体系服务创业创新的新渠道新功能。

众筹利用互联网和 SNS 传播的特性，让小企业、艺术家或个人对公众展示他们的创意，争取大家的关注和支持，进而获得所需要的资金援助。相对于传统的融资方式，众筹更为开放，能否获得资金也不再是由项目的商业价值作为唯一标准。只要是网友喜欢的项目，都可以通过众筹方式获得项目启动的第一笔资金，为更多小本经营或创作的人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众筹构成：(1) 发起人：有创造能力但缺乏资金的人；(2) 支持者：对筹资者的故事和回报感兴趣的，有能力支持的人；(3) 平台：连接发起人和支持者的互联网终端。

众筹规则：(1) 每个项目必须设定筹资目标和筹资天数；(2) 在设定天数内，达到或者超过目标金额，项目即成功，发起人可获得资金；如果项目筹资失败，那么已获资金全部退还支持者；(3) 众筹不是捐款，支持者的所有支持一定要设有相应的回报。

众筹特征：(1) 低门槛：无论身份、地位、职业、年龄、性别，只要

有想法、有创造能力都可以发起项目；(2) 多样性：众筹的方向具有多样性，在国内的众筹网站上的项目类别包括设计、科技、音乐、影视、食品、漫画、出版、游戏、摄影等；(3) 依靠大众力量：支持者通常是普通的草根民众，而非公司、企业或是风险投资人；(4) 注重创意：发起人必须先将自己的创意（设计图、成品、策划等）达到可展示的程度，才能通过平台的审核，而不单单是一个概念或者一个点子。

链接

关于众筹的两个问题：

1. 众筹是不是非法集资？

不是。众筹模式从商业和资金流动的角度来看，其实是一种团购的形式，和非法集资有本质上的差别，所有的项目不能够以股权或是资金作为回报，项目发起人更不能向支持者许诺任何资金上的收益，必须是以实物、服务或者媒体内容等作为回报，对一个项目的支持属于购买行为，而不是投资行为。

2. 众筹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1) 筹集天数恰到好处：众筹的筹集时间应该长到足以形成声势，又短到给未来的支持者带来信心。在国内外众筹网站上，筹资天数为 30 天的项目最容易成功。

(2) 目标金额合乎情理：目标金额的设置需要将生产、制造、劳务、包装和物流运输成本考虑在内，然后结合本身的项目设置一个合乎情理的目标。

(3) 支持者回报设置合理：对支持者的回报要尽可能的价值最大化，并与项目成品或者衍生品相配，而且应该有 3 ~ 5 项不同的回报形式供支持者选择。

(4) 项目包装：有视频的项目普遍比没有视频的项目能筹得更多的资金。而在国内的项目发起人，大多不具有包装项目能力。

(5) 定期更新信息：定期进行信息更新，以让支持者进一步参与项目，并鼓励他们向其他潜在支持者提及你的项目。

(6) 鸣谢支持者：给支持者发送电子邮件表示感谢或在您的个人页面中公开答谢他们，会让支持者有被重视的感觉，增加参与的乐趣，这也常常被国内发起人忽视。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

2015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近来频繁显露的局部风险特别是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也再次提醒我们必须通过改革保障金融安全，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快改革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从词义上讲，金融监督是指金融主管当局对金融机构实施的全面性、经常性的检查和督促，并以此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和发展。金融管理是指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实施的



监督管理。广义的金融监管在上述含义之外，还包括了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和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内容。

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对金融机构设立的监管；对金融机构资产负债业务的监管；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如市场准入、市场融资、市场利率、市场规则等；对会计结算的监管；对外汇外债的监管；对黄金生产、进口、加工、销售活动的监管；对证券业的监管；对保险业的监管；对信托业的监管；对投资黄金、典当、融资租赁等活动的监管。其中，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是监管的重点。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准入与机构合并、银行业务范围、风险控制、流动性管理、资本充足率、存款保护以及危机处理等方面。

链接

美国新版金融监管改革

最令奥巴马自豪的执政成绩应是2010年7月21日签署的新版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了，它拉开了大萧条以来美国最大规模金融监管改革的序幕。该法案决定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协调包括美联储、财政部、SEC、FDIC等机构的金融监管权力；在美联储内部成立消费者保护机构，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其服务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限制商业银行的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并将之前缺乏监管的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通过美联储贴现窗口融资的大型商业银行需分离衍生品业务，部分场外衍生品将进入交易所交易；美联储还将监督企业高管的薪酬，确保不会导致对风险的过度追求；针对倒闭金融机构建立清算机制，防止类似雷曼破产事件对市场产生的巨大冲击等。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统计报告称，新版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实施两年多来，主要参与和执行机构在执行法案方面已取得有意义的进展。截至2010年7月18日，该法案需要制定的243项规则中已有91%被提议或完成。数

据显示，该法案实施以来，美国银行机构的资本增加了逾 4200 亿美元，构筑了应对不可预期损失的缓冲器；同时，美国企业获得的信贷上升了 15%，企业增加了 380 万个就业岗位，美国银行机构还有效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增长。就金融监管而言，联邦监管的范围已从此前的传统银行扩大至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掉期、衍生市场、对冲基金、投资银行、票据交换所和交易所等。联邦存款保险覆盖了 55% 的消费者与企业存款，高出 2008 年初的 52%。2010 年 9 月 17 日正式运作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已比较成功地扮演了“负责实施美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金融保护措施，成为金融机构的监视器”的角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5 年 11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此后于 12 月 18 日至 21 日召开的 2015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是我们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对于过去侧重于需求方面的刺激政策而言的，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链接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因而得名。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弗把供给经济学解释为：“提供一套基于个人和企业刺激的分析结构。人们随着刺激而改变行为，为积极性刺激所吸引，见消极性刺激就回避。政府在这一结构中的任务在于使用其职能去改变刺激以影响社会行为。”

需求管理的理论和政策遇到的问题给供给管理理论提供了机遇，使得一个当时尚在发展中的异端学派异乎寻常地受到了当时美国政府的垂青，成为里根经济复苏计划的主要理论根据，其代表人物拉弗也成为自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以来影响力上升最快的经济学家。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西方的供给学派。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发表讲话时明确指出：“首先，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

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五大支柱性政策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时提出，要实施好五大支柱性政策，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经济结构性改革方向，发展实体经济，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激活存量增长动力，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积极利用外资，积极稳妥扩大对外投资。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潜能，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重点领域改革落地，加快推进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牵引作用的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改革。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链接

五大支柱性政策的具体举措

第一，宏观政策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第二，产业政策方面，要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

第三，微观政策方面，要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要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要提高有效供给能力，扩大消费需求。

第四，改革政策方面，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第五，社会政策方面，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三去一降一补”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简称。

在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改造提升传统比较优势，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努力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开局。”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主要包括以下具体内容：

去产能，即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

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去库存，即化解房地产库存。房地产库存商品和传统制造业商品的消化在时效性上有本质的差别，作为固定资产的房产资产供需平衡的实现更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商品房供给环节要进一步控制房地产的投资、适当降低商品房价格，而在需求环节，推出包括户籍改革等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增加新市民住房需求等政策。

去杠杆，即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防止地方政府破产、防止全面金融危机的产生，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这是新常态下供给侧金融改革的关键。

降成本，即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宽松的货币政策下，资金大幅度流入金融市场，降低企业在物流、电力、财务等方面的负担，只有把企业成本降下来，使资金投入能得到最大化的应用，才能让资金进入到实业投资渠道。

补短板，即扩大有效供给。由于经济体制和其他领域改革的不同步，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短板也越来越多。如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公共事业、公共基础设施、住房、教育、医疗、环保等方面。越是与老百姓关系密切的领域，短板现象也越严重。

链接

杠 杆

杠杆一词，最早来自于古希腊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杠杆成为了利用小股力量撬动大量资源的代名词，对于实体经济活动和金融投资都意义非凡。杠杆率（总债务/GDP）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都受到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

对一国杠杆率的衡量一般可以按照家庭、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和政府四个部门分别测算加总。从各国的发展经验看，杠杆率与经济增长之间



存在倒“U”形关系，即适度的杠杆对经济有益，但如果杠杆率过高，债务增速过快，杠杆反而会拖累经济增长。

在微观领域，杠杆率一般是指权益资本与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的比率。杠杆率是一个衡量公司负债风险的指标，从侧面反映出公司的还款能力。杠杆率的倒数为杠杆倍数，一般来说，投行的杠杆倍数比较高，美林银行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是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倍数在2007年为33倍。



工业 4.0

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智能化时代。

2015年10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李克强总理题为《催生新的动能实现发展升级》的文章。这篇文章选自李克强总理2015年8月21日在国务院先进制造与3D打印专题讲座上的讲话。文章说，与发达国家在工业3.0基础上迈向4.0不同，我国不仅要追赶工业4.0，还要在工业2.0、3.0方面“补课”。2015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中德（沈阳）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建设方案》的批复文件。作为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合作的重要载体，中德产业园成为国家批复的第一个以中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合作为主题的战略平台。

所谓工业4.0，是基于工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作出的划分。按照目前的共识，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智能化时代。工业4.0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德国，在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被正式推出，该项目由德国联邦教育局及研究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联合资助，投资预计达2亿欧元。德国的工业4.0

(Industry4.0)是指利用物联信息系统(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实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

“工业4.0”项目主要分为三大主题:一是“智能工厂”,重点研究智能化生产系统及过程,以及网络化分布式生产设施的实现。二是“智能生产”,主要涉及整个企业的生产物流管理、人机互动以及3D技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应用等。该计划将特别注重吸引中小企业参与,力图使中小企业成为新一代智能化生产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同时也成为先进工业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供应者。三是“智能物流”,主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物流网,整合物流资源,充分发挥现有物流资源供应方的效率,而需求方则能够快速获得服务匹配,得到物流支持。

链接

“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被称为中国版工业4.0,这一概念在2014年12月被首次提出。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两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首次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宏大计划。

2015年3月25日,李克强组织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进实施“中国制造2025”,实现制造业升级。5月8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

2015年6月15日,李克强先后考察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在考察中,李克强说,中国制造在国家综合国力提升中功不可没,但要看到,我们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总体还处于中低端水平。新形势下,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动制造业由大变强,不仅在一般消费品领域,更要在技术含量高的重大装备等先进制造领域勇于争先。

2015年4月、7月和11月,李克强总理先后就经济形势召开了三次专家和企业负责人座谈会。在这三次座谈会上,钢铁、装备制造、物流等诸多传统制造业领域的企业负责人参会,“中国制造2025”成为李克强在每



次座谈会上必提的话题。他反复强调，中国经济升级发展根本靠改革创新。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创新主体，要继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抓住国家推出“中国制造 2025”的重大机遇，面向市场，贴近需求，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塑造能力。



重农固本

把农业、农村、农民看作国之根本。

在 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5 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体现了习总书记所强调的“重农固本”的理念，将“发展新理念”“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绿色发展”“产业融合作为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手段”等内容列入文件当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就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认为，新时期重农固本需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充分考虑市场、需求和资源环境约束的基础上，主动适应大众高品质、需求多样、价廉物美的需求。农业应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为大众提供丰富多样的安全食物，满足民众亲近自然、亲近农业的娱乐休闲旅游需求。他指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是，在保障口粮安全的基础上增加优质农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民收入。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品质、效益，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金和政策的重点。

链接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1) 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不断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健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体制机制，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为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2) 目标任务。到2020年，农村各类所有制经济尤其是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财产权的保护制度更加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科技创新体系、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和农村基层组织制度更加完善，农民民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农业农村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水平进一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更具活力。

营改增

营业税改增值税。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

全面实施“营改增”。从2016年5月1日起,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

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 = 当期销项税额 - 当期进项税额

销项税额 = 销售额 × 税率

销售额 = 含税销售额 ÷ (1 + 税率)

销项税额是指纳税人提供应税服务按照销售额和增值税税率计算的增值税额。

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或者接受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和应税服务,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税额。

基本示例:

A公司4月份购买甲产品支付货款10000元,增值税进项税额1700元,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甲产品含税销售额为23400元。

进项税额 = 1700元

销项税额 = $23400 \div (1 + 17\%) \times 17\% = 3400$ 元

应纳税额 = $3400 - 1700 = 1700$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应纳税额 = 销售额 × 征收率

销售额 = 含税销售额 ÷ (1 + 征收率)

链接

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至此,货物劳务税收制度的改革拉开序幕。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年底,国务院扩大营改增试点至10省市。截至2013年8月1日,“营改增”范围已推广到全国试行。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 12 月 4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至此交通运输业已全部纳入“营改增”范围。自 2014 年 6 月 1 日起，将电信业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中国全面实施“营改增”，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制度更加规范。这是自 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财税体制的又一次深刻变革。

分享经济

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Peer-to-peereconomy）”“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

2016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以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分享经济发展，建设共享平台，做大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集群，打造动力强劲的新引擎。支持分享经济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富裕起来。

2015 年，以滴滴出行、优步、Airbnb、回家吃饭等为代表的新兴商业模式，改变了传统产业格局，推动开创了互联网经济的新业态，被人们概括为“分享经济”，也称“共享经济”。“分享经济”的核心是以闲置资源换取经济收益。2015 年 9 月，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特别致辞中指出，目前全球分享经济呈快速发展态势，通过分享、协作方式搞创业创新，门槛更低，成本更小，速度更快。

链接

案例一 分答：“网红经济”催化下的知识技能共享平台

案例定位：知识分享

最新融资：2016年6月元融资金额2500万美元，璟资本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联合投资，王思聪的普思资本与“罗辑思维”参与跟投。

案例概述：用户在分答平台上可以自我介绍或描述擅长的领域，设置付费问答的价格，其他用户感兴趣就可以付费向其提问，对方用60秒的时长来回答。问答环节结束后，“游客”若感兴趣，可以继续花钱收听，所付的钱将由提问者和回答者平分。微信大数据新榜在6月3日发布了“分答”收入排行榜，榜单中王思聪以23万元的收入高居榜首，粉丝数超过4万；其后网红作家“ayawawa”和“不加V”分别以8.9万元和8.1万元的收入位于第二、第三名，粉丝数在1万左右。

案例二 丸子地球：让环球旅行变得更容易

案例定位：旅游服务

最新融资：2016年1月完成数千万元的A轮融资，阿里巴巴为战略投资方，苏河汇、五岳天下和银杏谷资本跟投。

案例概述：丸子地球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陪游服务，成为撮合用户和业余导游的第三方平台，做细分旅游服务领域的淘宝，它不涉及旅行中的机票和酒店，而是直接对接目的地地接市场，提供包括当地留学生、华人华侨或者本地人在内的中文导游。游客可以在该平台与旅游目的地的向导对接，并由向导提供个性化的接机、翻译、陪游等服务，并制订更有特色的旅行计划。目前丸子地球的业务已覆盖了50多个国家、500多个城市，海外接地导游多达两三千人。

“人地钱”挂钩

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地新增指标与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挂钩、基建投资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扩大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范围。居住证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要加快覆盖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使他们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

“人地钱”挂钩是调动地方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积极性的政策机制。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提高内在承载力，不能人为“造城”。“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使城镇占用土地的速度远远快于吸纳人口的速度。一些城市盲目建设“新城”，由于缺乏产业支撑而变成“鬼城、空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和原来的户籍人口在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会遭遇政策差异。“人地钱”挂钩有助于在各种保障权益上向实现同等待遇的方向努力。其次，“人地钱”挂钩能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市场的建立，有助于通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公民的基本权益得到保障。

工匠精神

追求卓越的创造精神、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

古语云：“玉不琢，不成器。”“工匠精神”不仅体现了对产品精心打造、精工制作的理念和追求，更是要不断吸收最前沿的技术，创造出新成果。在互联网时代下，制造业的社会地位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有些人认为再提“工匠精神”已经落伍了。但正如《中国制造2025》所指出的，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科技创新的主战场，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目前我国制造业还存在着大而不强、产品档次整体不高、自主创新能力弱等问题。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确定的目标和任务，从“制造大国”变为“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智造”，尤其需要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

链接

何为德国工匠精神？

德国工匠精神是“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负”的坚持。全德360万企业中，92%由家族经营，规模最大的100家家族企业平均年龄超过90年，200年以上企业达837家，数量位居全球第二。这些百年老店不盲目求快、不浮不怠，坚持精益求精、久久为功，穷其一代甚至数代打造自身品

牌的案例屡见不鲜。他们对所处行业有着特殊情结，即使暂时不景气，也从不轻言放弃。德国最古老的私人银行之一迈世勒银行历经 300 年风雨，至今屹立不倒，其企业信条即为“欲速则不达”，坚持稳健第一、速度第二，不因一时一事动摇初心，注重长期规划，立足时代传承。

德国工匠精神是“凝神屏气无言语、两手一心付案牍”的专注。其一，企业秉持“术业有专攻”。据统计，全德共有 1500 多家特定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占全球半壁江山，其中 86% 为机械制造、电气、医药、化工等关键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抓准行业“缝隙市场”，潜心深耕，以小博大，在各自领域成为“领头羊”。这些企业虽默默无闻，却是超级的利基市场占有率者，拥有 70% 乃至 100% 的全球市场份额，可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以伍尔特集团为例，该企业自 1945 年成立以来专注生产单一产品——螺丝，几十年如一日精雕细琢，终成无可替代的行业翘楚。其二，工匠具有“职业气质”。许多德国工匠心中对职业怀有始终如一的热爱，对产品有着止于至善的追求，他们兢兢业业、苦心钻研，力图实现“从 99% 到 99.99%”的完美跨越。

德国工匠精神是“不因材贵有寸伪，不为工繁省一刀”的严谨。为保障产品质量，德国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行业标准和质量认证体系。自 1918 年起，德国工业标准化委员会共制定 3.3 万个行业标准，其中 80% 以上为欧洲各国所采纳。在行业标准的基础上，德国又建立起质量管理认证机制，对企业生产流程、产品规格、成品质量等逐一审核，确保可靠性和安全性，对消费者负责。同时，德国还针对出口产品建立事前管理、事中监控、事后处理程序，出现售后质量问题时，企业应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解决。在无比严格的质控下，德国从生产机械、化工、电器设备，到厨房用品、体育用品，乃至一支圆珠笔都秉持“但求最好，不怕最贵”原则，严选材料、严格工序、严把质量、严格检验，每一个成品都堪称世界上最过硬的产品。

德国工匠精神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造。德国讲求“匠心”，而非“匠气”，反对因循守旧、闭门造车，而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创新。据统计，德国研发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各家族企业研发经费平均高达销售总额的 4.6%。德国虽非信息技术、基因工程等新兴行业先锋，却能在实际



生产领域不断推陈出新，其人均专利申请数量是法国的2倍、英国的5倍、西班牙的18倍，在全球独占鳌头。究其原因，以弗劳恩霍夫研究院为代表的数百家应用科研机构填平了技术与市场之间的鸿沟，使工业领域的创新能力迅速抵达终端，惠及整个行业。

（史明德：《德国如何打造工匠精神》，
《人民政协报》2016年5月30日第10版）



光网城市

实现了全光网络覆盖的城市。所谓全光网络，指的是网络传输和交换过程全部通过光纤实现，因为不必在其中实现电光和光电转换，能大大提高网速。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建设一批光网城市，推进5万个行政村通光纤，让更多城乡居民享受数字化生活。

当今时代，互联网已渗透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宽带中国”已经变成现实。“光网城市”的提出，又让人们对光纤网络的大面积入户和网速的大幅度提升充满了期待。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已提出：“全面推进‘三网’融合，加快建设光纤网络，大幅提升宽带网络速率。”经常触网的人一定记得，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对我国的“网速”表示不满，坦言：“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网速都比北京快”，“中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之落后，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公共服务。信息高速公路的快捷程度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相信“光网城市”的建设能够继“宽带中国”之后，进一步提升人民生活品质、助推中国社会进步。

海外仓

将货物批量发送至国外仓库，实现本地销售、本地配送这样的跨国物流形式。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试点，支持企业建设一批出口产品“海外仓”，促进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展。

随着2015年5月份商务部《“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推出，不少电商平台和出口企业正通过建设“海外仓”布局境外物流体系。海外仓的建设可以让出口企业将货物批量发送至国外仓库，实现该国本地销售，本地配送。这种新的跨国物流形式有利于解决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种种痛点，鼓励电商企业走出去。客户下单后，出口企业通过海外仓直接本地发货，大大缩短配送时间，也降低了清关障碍；货物批量运输，降低了运输成本；客户收到货物后能轻松实现退换货，也改善了购物体验。在各大跨境电商和出口企业建设海外仓的同时，相关政府部门应完善跨境电商相关的法律、税收服务建设。

相机调控

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为应对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我们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和相



机调控。

这是“相机调控”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相机调控”强调政府要根据市场情况和各项调节措施的特点，灵活机动地决定和选择当前究竟应采取哪一种或哪几种政策措施。相机调控很重要的就是要“预调、微调”。对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产业，政府出台的政策应该是有差别的。例如房地产市场就出现了分化现象，政府根据一、二、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的不同特点，制定了有针对性的契税房贷政策。

链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的新定位愈发清晰

2013年，党中央、国务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区间管理的宏观调控思路 and 方式，提出只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政府就不刺激干预，专心调结构、促改革。

“合理区间”是党和政府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的目标希望，更是向市场主体发出的明确信号：既不让市场觉得，一有困难政府肯定出手，也让市场相信，真正遇到困难时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近两年，区间调控的新定位更为丰富和完善。总的来说，就是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节奏，使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保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限”，在这样一个合理区间内，着力调结构、促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2014年开始，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我国更加注重进行定向调控。传统意义上的总量调控难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薄弱环节和区域，容易导致发展不平衡、不稳定，需要加强定向调控，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多依靠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的力量，有针对性地进行“喷灌”和“滴灌”。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下，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速持续回落；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大幅增加，收支矛盾不断凸显。在严峻的形势下，财政政策既要保民生、保基本，又要稳增长、调结构，还要促改革、促创新，国家

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采取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大力推进“营改增”，对小微企业、服务“三农”的金融机构和高技术企业等实施减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在2015年，短期内连续两次大幅度提高了年应纳税所得额，优惠范围覆盖所有小微企业。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共有258万户小型微利企业享受减征企业所得税优惠，减税120多亿元，户均减免税额4600余元；2800多万户小规模纳税人和个体工商户享受暂免征收增值税、营业税优惠政策，免税613亿多元，两项共减税733亿多元。

此外，国家还整合专项资金、打造创新机制，设立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启动实施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注重引导、撬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为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防范可能出现的财政金融风险，进行了地方债务置换，妥善解决融资平台公司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

货币政策方面，积极运用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等货币政策工具，不断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有效发挥了激活力、补短板、强实体的重要作用。

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又提出：要更加精准有效地实施相机调控，强调做好政策储备和应对预案，把握好调控措施出台的时机和力度，不断提高相机抉择的水平。

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这是我国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的新探索、新实践，不仅促进了“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更为“十三五”时期我国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奠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日报》2016年1月7日）

（三）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篇

1. 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居于最高层次，对其他层次的价值理念具有统领作用。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有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

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对美好社会的生动表述，也是从社会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属性，是我们党矢志不渝、长期实践的核心价值理念。自由是指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向往，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平等指的是公民在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其价值取向是不断实现实质平等。它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人人依法享有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公正即社会公平和正义，它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获得为前提，是国家、社会应然的根本价值理念。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它通过法制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爱国是基于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厚情感，也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它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友善强调公民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

链接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他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他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必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习近平强调，要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要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他强调，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文化强国

一般来说，文化大国，是指那些文化综合国力对世界文化发展具有明显影响力的国家；文化强国，是指那些文化综合国力对世界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

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任务后，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点，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二是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三是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四是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

链接

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



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表面上文化确乎很“软”，但却是一种不可忽略的伟力。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也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 2013 年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总书记围绕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四个方面所作的精辟阐述，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本指引。



新型文化业态

凭借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支持而衍生出来的、与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有关的文化业态。

2012 年 11 月 8 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由于新型文化业态是高新科技运用于文化领域的产物，所以，也有学者指出，新型文化业态是指利用数字技术和软硬件载体，将图像、文字、影像、语音等内容进行整合，通过数字化创作、编辑、生产制作及传递，向消费者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的文化内容产品。新型文化业态区别于传统的、常规的文化业态，它是利用现代高新科技手段发展出来的具有跨领域、综合性发展、创新型等特征的文化业态。新型文化业态是一

个相对概念,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原来一些“新”的文化业态逐渐成熟并被归类为“旧”文化业态范畴,而更“新”的文化业态不断兴起和发展。新型文化业态的兴起和发展是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先导,是促进文化产业成为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推进器。

新型文化业态通过专业化分工与互动协作,加快各类生产要素的聚集,结成产业的协作、流通和服务网络,形成基地或园区,使各类新兴文化业态在空间上形成整合。在经济空间重组、社会空间极化的耦合作用下,文化产业显现出新的区域经济空间类型,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应。

链接

山东发力“文化+”文化与各业态融合发展

“文化+互联网”“文化+科技”“文化+金融”“文化+旅游”……如今,文化与各业态融合发展已成为山东文化产业发展的新动能。记者从省文改办了解到,2015年,我省以“文化+互联网”为主要形式的文化信息传输服务发展迅猛,文化信息传输服务单位达61家,比上年增长56.4%;资产157.2亿元,比上年增长39.5%。文化信息传输服务单位数量增速位居文化产业十大类之首,资产增速位居第二。

“文化+”蓄势发力,在转型升级、融合发展方面探索出新路子,成为我省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近年来,我省文化企业生产技术和营销模式不断创新,催生培育了创意设计、数字文化服务、移动多媒体、动漫游戏、网络文化等新兴文化业态。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两大类行业中。2015年,这两个大类实现营业收入、营业利润和吸纳就业人员分别为244.6亿元、31.3亿元和5.1万人,比上年分别增长30.5%、33.2%和23.0%,比规模以上文化企业增速分别高15.8个、19.8个和14.2个百分点,显示出新兴文化业态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巨大潜力。

拥抱互联网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顺势所趋。2015年7月17日,以大众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整合大众报业集团新媒体板块组建的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力争做成全国一流新型传媒集团。省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的具体实践，标志着山东贯彻落实党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取得新突破。”

今年2月，《山东省“互联网+文化产业”行动方案》印发，推动互联网技术应用、创新成果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未来，山东将培育100家融合度高、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互联网+”文化企业，建设200个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比较优势明显的“互联网+文化产业”项目，建成30个基础性、先导性强的文化产业大数据、云服务平台，形成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富有活力的“互联网+文化产业”载体集群。

（《大众日报》2016年8月25日）

网上主旋律

把坚持正确导向摆在突出位置，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音、时代进步的主旋律，形成是非分明、惩恶扬善的网络舆论氛围。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

唱响网上主旋律，必须强化法制建设，促进网络规范形成。应针对网络社会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专门立法，严厉打击各种非法行为，加大对手机淫秽信息和网络谣言的整治力度，进一步规范网络秩序，促使网络行为规范化。通过互联网立法、网络规范，引导公众更有序、更规范、

更合法地享有自由权益。

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政府引导能力。对于网络信息的内容安全管理，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对互联网信息的引导，逐步推动互联网的信息发布和网络经营行为的规范化；围绕网站内容建设、论坛管理等，加强对网站的工作指导，强化网上舆情的收集和分析，及时处理违法违规行爲，抑制有害信息传播。

必须依靠技术手段，维护网络信息秩序。应加强网络管理技术的研究和利用，积极发展先进网络管理技术，通过技术强化网络舆情管理，维护网上信息秩序，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

必须倡导行业自律，管理网络信息传播。加强互联网管理，推进网络内容建设，必须依靠政府、业界、公众三方的共同努力，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与公众监督相结合的管理格局。

链接

唱响网上主旋律——记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党委

腾讯公司成立于1998年11月，有员工3万多名，是目前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也是用户最多的互联网企业之一。原党总支于2011年升格成立党委，下属党总支12个、党支部106个，党员5593人。2012年，被评为广东省“南粤先锋”先进基层党组织。2013年，被确定为省、市、区三级党建工作示范点。

近年来，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按照有利于组织开展活动、有利于党员教育管理和有利于完善组织体系的原则，顺应公司业务发展和组织架构变革，适时对党组织架构进行升级调整，逐步完善“党委—总支—支部”三级组织架构。公司党委成立以来，坚持抓班子带队伍、促业务践责任，发挥好政治核心和政治引领“两个作用”，着力打造“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

公司党委扎实推进党务工作队伍建设，先后共举办了15期党务干部



培训班,轮训北京、上海、成都等12个党总支的专兼职党务干部,培养了一批党性强、作风正、素质优、业务精的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工作人员。探索建立党员组织关系与人事关系联动机制,理顺党员组织关系,通过严格组织生活制度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增强党员党性意识和纪律观念。

坚守正确网络舆论导向,公司党委始终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通过QQ、腾讯网、微信等中国领先的网络平台,坚定传递党和政府声音、唱响“爱国、敬业、和谐”网上主旋律。在党委带领下,公司着力打造中国最大最好的网络社区,满足群众网络生活需求。去年四季度,QQ活跃账户数达8.53亿,同比增长5%，“微信/WeChat”合并月活跃账户数6.97亿,同比增长39%。积极推动“互联网+”战略有效落地,积极与各地政府部门建立合作,运用移动互联、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协助政府优化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助推新常态下政府转型发展。

(《中国组织人事报》新闻网,2016年7月13日)



媒体融合

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基础上与传统媒体的有机整合。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对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作出了具体部署。

根据中央深改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就是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坚持统筹协调、坚持创新发展、坚持一体化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就是要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就是要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

文化、视频化的趋势,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等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提高技术研发水平,以新技术引领媒体融合发展、驱动媒体转型升级;就是要按照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规范管理、确保导向的要求,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

链接

“媒体融合”(media convergence),最早由尼古拉斯·尼葛洛庞蒂提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浦尔认为,媒介融合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其概念应该包括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概念是指将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产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如电子杂志、博客新闻等;而广义的“媒介融合”则范围广阔,包括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结合、汇聚甚至融合,不仅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还包括媒介功能、传播手段、所有权、组织结构等要素的融合。也就是说,“媒体融合”是信息传输通道的多元化下的新作业模式,是把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媒体传播通道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

2. 社会建设

“三个公平”

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社会财富越增加，公平越重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公平正义作为追求目标，“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等重要论述，体现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实现“三个公平”，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发展做基础，公平就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以平稳健康的发展作基础，社会公平才有实现的坚实基础。

实现“三个公平”，必须大力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法律体现最大的民意。严格依法办事，人民群众的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充分保障。任何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任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行为都应当受到法律制裁。

实现“三个公平”，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损害社会公平。充分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权力所到之处都向人民公开、让人民监督，才能有效减少权力滥用。

 和谐共生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2013年11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外方代表时提出，我们将继续抱着谦虚的态度，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发展经验，包容并蓄，走同其他国家和谐共生的发展道路。2015年5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致亚信非政府论坛首次年会的贺词中指出，促进亚洲地区不同文明、地域、种族、宗教互尊互信、和谐共生，民间力量不容低估。在同年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和谐，意味和睦相处，谐平共生，“和”与“谐”二字看是有共义，实则有分义，“和”有“和面”之意，意即“面对面”商讨、议事、谈判；而“谐”具有“糅合”之意，意即“谐调”“统一”“共处”。社会共生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任何人都生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共生系统之中。共生关系不只存在于社会某个方面，而是遍布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区、社群、家庭等所有领域，其表现更是形形色色，千姿百态。没有共生，也就没有人的存在。

社会共生论认为，每个人都希望占有更多资源发展自己，而资源具有稀缺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会出现冲突。然而，个人生存所需的许多资源只有通过别人才能得到，所以人与人之间还存在互相依赖的一面。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对他人的依赖愈来愈多。排斥引发斗争，依赖导致妥协。斗争与妥协互动，形成共生。共生关系有优劣之分，和谐共生就

是达到相对最优化：人与人之间在合理的度之内分享资源；代与代之间合理分享资源——人利用自然，同时又保护自然。

记得住乡愁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留给城市居民；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

所谓乡愁，不仅是记忆中的山水和建筑，还包括割不断的血脉和乡情。乡村生活，并不一定是丰足舒适的，但弥漫着城里难觅的乡土情谊，让人久久难忘。但随着物欲和利益对乡村的侵蚀，淳朴的乡情也开始变淡、变味。很多走出农村的人发现，虽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了，但很多人已经找不到了记忆中的故乡。乡村正在消失，记忆失去凭据，让很多人怅然若失。这不仅是文人怀旧，还关系到文化的根脉。这意味着，在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不一定要处处向城市看齐，乡村要有乡村的样子。所谓的城乡一体化，需要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和现代化程度，但也要保留村庄原始风貌，特别是要保护一些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村庄。要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链接

“记得住乡愁”的城镇化才有生命力

未来城镇化首先应该是“人的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中心，要让城镇成为有“人性”的城镇，文化传承在城镇化发展中一定不能缺位。城镇化一定要强调“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尽量让农村那些古树、庙宇、古典建筑等风貌存活下来，而不是沉淀为一种记忆。“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而不是大拆大建，让历史和文化湮没在城镇化狂飙猛进的烟尘中。让这些自然风貌与别致风景留在中国的版图上，我国的百姓生活才能更恬静，心灵才能找到安放的家园，城镇化才能真正有生命力。在这里，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不离家、进厂不进城，并且农民在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可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质的服务，实现就地市民化、就近城镇化，据调查这也是农民幸福感最强的一种城镇化。

乡土味道

2015年1月2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考察时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

建设美丽乡村是农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农村的茅草房变成了瓦房，瓦房变成了钢筋水泥的楼房，木门



换成了铁门，雕花窗户换成了铁窗，石板路变成了水泥路，搭瓜棚的野藤变成了尼龙绳……昔日的草、瓦、木门、木窗、石板、野藤，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逐渐在我们眼前消失，它们离我们渐行渐远，一些地方昔日的乡土气息、乡土味道再难觅踪影，乡土气息、乡土味道在逐渐消亡。乡土味道亟待保留，乡土气息亟待解救。留着乡土味道，就是要求各地在建设美丽乡村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好环境，保护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保护好乡村文化。

链接

中国的乡土文化源远流长，而广大农村则是滋生培育乡土文化的根源和基因。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城市经济飞速发展，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许多乡土文化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因此我们对中国乡土文化的了解和认识还相当有限。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繁衍发展的精神寄托和智慧结晶，是区别于任何其他文明的唯一特征，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因！乡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非物质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其中包含民俗风情、传说故事、古建遗存、名人传记、村规民约、家族族谱、传统技艺、古树名木等诸多方面。

“全面二胎”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俗称“全面二胎”政策。

“全面二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提倡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子女；符合法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再生育子女，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同时明确，夫妻双方户籍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关于再生育子女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适用。第二，删除了对晚婚晚育夫妻、独生子女父母进行奖励的规定，同时明确按照“老人老办法”的原则，法律修改前按照规定应当享受奖励扶助的计划生育家庭老年人、独生子女父母和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害、死亡的父母可继续享受奖励扶助。第三，根据实施“全面二胎”政策的新形势，规定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第四，规定夫妻自主选择避孕节育措施。根据生育政策调整，配套推进计划生育服务管理改革，删除夫妻应当接受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指导等带有强制服务色彩的内容，规定夫妻自主选择避孕节育措施。第五，禁止买卖精子、卵子及代孕。具备相应专业技术人员、设施设备、伦理审查机构及管理制度的医疗机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审查批准，可以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具体管理办法和技术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链接

“全面二胎”政策出台背景

“全面二胎”政策的酝酿，可以追溯到2011年。当年5月，国家人口计生委下辖的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提交《关于〈完善单独政策初步测算报告〉的报告》。同年7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半年工作暨综合改革工作会议达成共识：在自愿原则下，可选择一些试点省份进行“单独二胎”试点。广东、上海等省市也曾表态，希望首先在各自的省市进行试点。而此次的全面放开二胎，也意味着此前“双独二胎”“单独二胎”政策的继续。2010年11月进行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出的主要数据，也被外界认为是有利于推动中国人口政策的放宽调整。这次人口普

查的数据显示,至2010年11月1日,中国内地总人口为13.40亿人;年均增长率0.57%(2000—2010年);60岁及以上老人比例为13.26%;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女为100)。出生率方面,2000年至2010年年均增长0.57%,较之上一个十年——1990—2000年的1.07%年均增长率,下降接近一半,幅度惊人。同时,人口学界更看重的指标——“总和生育率”,即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时,代与代之间人口更替将大致均衡。在此之上,人口逐渐增加,在此之下则减少。中央民族大学理学院副院长、统计学教授徐世英的团队,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直接计算出来的总和生育率结果是1.18,远远低于2.1。这一结果为各方所认可。

获得感

表示获取某种利益后所产生的满足感。这里主要指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的幸福感。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2月27日上午在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时提出。2015年3月4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联组会发表对台讲话时再次提到“获得感”：“只有让两岸协商对话、交流合作的成果,转化为台湾各阶层民众的普遍‘获得感’,才能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理距离,才能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势头不被逆转。”

“获得感”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既有看得见的,也有看不见的。

“获得感”首先是要感受到改革带来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比如,人民群众有房住,收入增加,能接受优质教育,能看得起病,养老有保

障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在精神层面，要让每个人有梦想、有追求，同时活得更有尊严、更体面，能够享受公平公正的同等权利。

“获得感”有别于“幸福感”，它强调一种实实在在的“得到”。如果不讲“获得”而一味强调幸福，就容易流于空泛。另一方面，“获得感”的提出，使人民得到的利好有了进行指标衡量的可能，而幸福是不可衡量的。所以，在当下的中国，“获得感”更加贴近民生、体贴民意。这种“获得感”，一般来说能够转化为幸福感。

链接

在过去的一年里，“获得感”成为各界干部群众关注和议论的焦点词汇。“获得感”之所以引起这么强烈的共鸣，说明该词真的把准了社会脉搏，说到了百姓的“心坎上”。

事实胜于雄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始终立足于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一目标，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这一目标的举措。以基本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民生保障制度不断健全，财政资金用于民生的比例稳定在70%以上。城乡就业形势稳定，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达到6071万人，“十二五”规划新增就业4500万人的目标已提前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9.5%，快于8.0%的GDP增速，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9%，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0.1%。居民生活质量持续改善，居民养老服务机构增加到3.3万个，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步伐加快，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降低。居民旅游大幅增多，2014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36亿人次，比2010年接近翻一番。基本公共服务继续强化，明确了基本公共教育等9领域44类80服务项目，人民群众上学、就医、享受文化生活等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得到维护。

（南方网，2016年1月11日）

厕所革命

对农村厕所进行改造的重大举措。

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光东村了解到一些村民还在使用传统的旱厕，他指出，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多向农村倾斜，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11月19日，“世界厕所日暨中国厕所革命宣传日”活动在京举行，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致辞中说：“开展‘厕所革命’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充分肯定。习近平总书记今年4月1日专门就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批示，7月16日在吉林省延边州调研期间再次提出厕所革命有关要求。”

厕所是衡量文明的重要标志，改善厕所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环境状况。中国对农村地区家庭的“卫生”厕所标准是，要有墙壁、屋顶、门和窗，面积不得小于两平方米，可以是抽水厕所或旱厕，但须设有地下沼池。进入新世纪，厕所革命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材料环保、节能节水的理念开始成为共识。“厕所革命”被各省市纳入旅游发展规划，成为提升地区形象的重要举措。

链接

中国厕所的变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村地区厕所简陋，粪水暴露、蚊蝇滋生，霍乱、痢疾等肠道传染病和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高发，给人民群众的健康带来巨大灾难。

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20世纪70年代,中国爱卫会组织开展“两管五改”活动,清理整治环境,建厕所、管粪便、除四害,突出对人畜粪便的管理。

20世纪80年代,推动改水、改厕、健康教育“三位一体”爱国卫生运动。

20世纪90年代,中国将改厕工作纳入《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和卫生改革与发展的相关决定,在中国农村掀起一场“厕所革命”。

21世纪以后,中国城乡“如厕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已基本解决,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4年,中国卫生厕所普及率已从1993的7.5%提高到了76.1%。2004年截至2013年底,中国中央累计投入了82.7亿元改造农村厕所。

中国农村改厕的目标是中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2015年达到75%,到2020年达到85%。

全民医保

人人享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服务。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

全民医保,就是指政府必须建立或举办让城乡所有公民都能参加的医疗保险,使所有的人患病之后都能从政府举办的医疗保险制度那里得到帮助,所有人群不分地位、身份、性别、地区、收入,一律平等。

全民医保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缓解了市民“看病贵”问题。国家已逐步建立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首次实现医保的全覆盖。国家还把关闭、破产企业和困难企业职工、大学生、非公经济组织从业人

员和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城镇职工或居民医保范围。2009年全面推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重点解决老人、残疾人和儿童的基本医疗保险问题。2010年完成了从制度设计到实际操作的全部过程。

链接

全民医保基本实现

中国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9月19日联合发布中国劳动保障蓝皮书《中国劳动保障发展报告(2014)》。蓝皮书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中，全民医保早已基本实现。

蓝皮书指出，2013年年末，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3.22亿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4.98亿人，有1.41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老年人都已领取基本养老金；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分别覆盖了1.99亿、1.64亿和1.64亿职工。社会保障水平逐年提高，其中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了“十连调”。社保基金收支结余规模不断扩大，抗风险能力增强，截至2013年年底，五项社保基金收、支和累计结余分别达到3.52万亿元、2.79万亿元和4.51万亿元，此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总额突破1万亿元。初步建成社保公共服务体系，不断提高管理服务水平。

幸福感

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

2016年4月15日，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

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要以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契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全面实施《国家安全法》，深入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要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动员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

幸福感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

链接

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将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策目标，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对于幸福的理解涉及了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等多个学科，这说明了社会心理体系的高度复杂性，而这种复杂的主观世界要用数量化的工具来加以测量和说明，无疑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提出一

个重大挑战。因此，关于幸福指数一种可能的误读就是，将幸福指数简单化的倾向。典型表现之一是，希望通过一份调查问卷就能达成对主观幸福感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幸福感在测量上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进行测量的时间之点上人们所表达的生活感受，是否能够代表他们在一个时期里的总体生活感受。

幸福指数是社会发展状况及其问题的“风向标”和“晴雨表”。如果说社会心理体系包含理性层面的认知评价和感性层面的情绪感受，那么，在幸福感中情绪感受这一感性层面常常占据主导地位，幸福感有时是一种很个体化的主观领域。因此，在实践领域中，幸福指数可以成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一个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方面。

互联网治理

国家、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角色制定和应用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过程中的原则、标准、规范、决策步骤和共同规划。

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发表演讲，提出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四项原则”、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五点主张”，成为凝聚共识、贡献创见最广阔的平台与基础。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是：

(1) 尊重网络主权。应该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网络发展道路、网络管理模式、互联网公共政策和平等参与国际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利，不搞网络霸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纵容或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活动。

(2) 维护和平安全。各国应该共同努力，防范和反对利用网络空

间进行的恐怖、淫秽、贩毒、洗钱、赌博等犯罪活动。不论是商业窃密，还是对政府网络发起黑客攻击，都应该根据相关法律和国际公约予以坚决打击。维护网络安全不应有双重标准，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以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

(3) 促进开放合作。完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维护网络空间秩序，必须坚持同舟共济、互信互利的理念，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观念。各国应该推进互联网领域开放合作，丰富开放内涵，提高开放水平，搭建更多沟通合作平台，创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推动彼此在网络空间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让更多国家和人民搭乘信息时代的快车、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

(4) 构建良好秩序。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于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义务。要坚持依法治网、依法办网、依法上网，让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同时，要加强网络伦理、网络文明建设，发挥道德教化引导作用，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

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是：第一，加快全球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第二，打造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促进交流互鉴；第三，推动网络经济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第四，保障网络安全，促进有序发展；第五，构建互联网治理体系，促进公平正义。



链接

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发表 《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

2016年6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共同发表《关于协作推进信息网络空间发展的联合声明》,达成如下共识:

- 一、共同倡导推动尊重各国网络主权,反对侵犯他国网络主权的行为。
- 二、共同倡导推动尊重各国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反对通过信息网络空间干涉他国内政,破坏公共秩序,煽动民族间、种族间、教派间敌对情绪,破坏国家治理的行为。
- 三、加强信息网络空间领域的科技合作,联合开展信息通信技术研究开发,加大双方信息交流与人才培养。
- 四、加强信息网络空间领域的经济合作,促进两国产业间交往并推动多边合作,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协助,弥合数字鸿沟。
- 五、切实维护两国公民在互联网的合法权利,共同致力于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信息网络空间新秩序。
- 六、加大工作力度,预防和打击利用网络进行恐怖及犯罪活动,倡议在联合国框架下研究建立应对合作机制,包括研究制定全球性法律文书。
- 七、开展网络安全应急合作与网络安全威胁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网络安全威胁治理。

3. 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发展

以效率、和谐、持续为目标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式。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从内涵看，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

链接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绿色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坚持绿色富国、绿色惠民，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调整优化空间结构，划定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保护红线，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设立统一规范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调节城市规模，依托山水地貌优化城市形态和功能，实行绿色规划、设计、施工标准。支持绿色清洁生产，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鼓励企业工艺技术装备更新改造。发展绿色金融，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加强资源环境国情和生态价值观教育，培养公民环境意识，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消费自觉。



美丽中国

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美丽中国”被纳入“十三五”规划，首次被纳入五年规划。

根据党的十八大报告，“美丽中国”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建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二是将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美丽中国”要求对现有文明进行整合与重塑，以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

神文明、政治文明以及社会建设都发生与生态文明建设内在要求相一致的生态化转向。这在为中国人民创造出美好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同时，必将引领中国走向更高层次的文明。

链接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途径

全社会合力推进建设，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以及每一个家庭和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共同关心并积极参与这项事业。要在更高层面上、更大范围内审视和解决中国突出的环境问题，积极探索中国环境保护的新道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概括起来，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2. 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3.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4.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5. 加大科技支持力度；6. 营造“美丽中国”建设氛围，使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7. 强化经济手段在环境保护中的基础作用，推动环境保护政策手段和措施的战略转变。8. 建设“美丽中国”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两山论”

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对“两山论”进行了最为全面、经典的一次阐述：“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两山论”生动形象表达了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比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要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建设美丽中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两山论”既阐明了经济与生态的辩证统一关系，也体现了可持续、可循环的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二者不可分割，构成有机整体。“两山论”清楚地表明，我们绝不可再走用绿水青山去换金山银山的老路，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链接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由来已久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安吉天荒坪镇余村考察。在座谈会上，村干部介绍了关停污染环境的矿山，然后靠发展生态旅游借景发财，实现了“景美、户富、人和”。习近平听了高兴地说：“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9天后，习近平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发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评论，鲜明提出，如果把“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

十年后的2015年3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正式把“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写进中央文件，成为指导中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

十年来，习近平无论主持浙江工作，还是主持中央工作，无论到全国各地考察，还是到国外出访，无论负责党的十八大报告起草，还是在一系列有关会议上，多次论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形成了一套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

生命共同体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用途管制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山水、云林、霜雪、竹石等自然风物总是成对出现，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比如，有“仁者乐山”，就有“智者乐水”；有“行到水穷处”，接下来就是“坐看云起时”。山水田园不分割，是传统思维，更应是我们今天对待生态的态度。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只有打通彼此间的“关节”与“经脉”，才能全方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如果农业部门只盯着管好田，水利部门只想着通了水，林业部门只顾着养好野生动物，而缺乏一个整体规划，这样的美景恐怕是难以实现的。要盘活山水林田湖这个生命共同体，关键是要有一张大

格局,让相关各方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局面,才能真正实现山水相连,花鸟相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APEC 蓝

中国政府用超常规手段使得 2014 年 APEC 领导人会议期间(11 月 5 日至 11 日)北京的空气质量达到优级水平。

伴随着 2014 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周临近,北京进入 APEC 时间。北京及周边 5 省市采取的一系列措施逐渐显效,2014 年 11 月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明显好转,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4 年 11 月 3 日上午 8 点,北京市城六区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 37 微克,接近一级优水平。天空也逐渐变蓝,被市民称为“APEC 蓝”。

2014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 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聚焦重点领域,严格指标考核,加强环境执法监管,认真进行责任追究。为了督促各地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做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保障 APEC 会议期间空气质量,环境保护部于 2014 年 10 月 20 日至 25 日,派出 15 个督查组对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等 6 省(区、市)的 24 个重点地市空气质量保障方案落实情况进行了第一阶段督查。2014 年 11 月 6 日起,实施最高一级空气重污染应急减排措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山东省,要求尽可能采取限、停产,机动车限行与管控,燃煤和工业企业停限产,工地停工,加强城市道路保洁,调休放假等措施。

“从 2008 年的奥运会到此次的 APEC 会议,都可以看出雾霾是可

以治理的，而且治理的措施都是明确、行之有效的。”环境卫生领域从事科研工作已有 26 年的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原所长金银龙说。

人努力天帮忙

对生态环境改善的艰巨性和紧迫性的一种形象表述。

2014 年 11 月 10 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为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各经济体领导人及配偶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发表讲话时说：“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是感觉舒适一点。好在是人努力天帮忙啊，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总体好多了，不过我也担心我这个话说早了，但愿明天的天气也还好。”

习主席在这次讲话中进一步说道：“这几天北京空气质量好，是我们有关地方和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我要感谢各位，也感谢这次会议，让我们下了更大的决心，来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我们今后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也有人说，现在北京的蓝天是 APEC 蓝，美好而短暂，过了这一阵就没了，我希望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APEC 蓝能够保持下去。”

铁腕治污

中国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坚强决心。

2015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环境污染是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要铁腕治理”。

2015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环保规划目标任务的收官之年，在经济发展注重提质增效的新常态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当年的工作总体部署中指出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攻坚战，总计用697字谈及环保和节能减排，涉及污染防治、环境执法、环境税立法、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在污染防治方面，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降低3.1%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减少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别减少3%左右和5%左右。深入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区域联防联控，推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促进重点区域煤炭消费零增长。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加强江河湖海水污染、水污染源和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行从水源地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在环境执法方面，报告指出要严格环境执法，对偷排偷放者出重拳，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对姑息纵容者严问责，使其受到应有的处罚。在产业发展方面，在2014年“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生机勃勃的朝阳产业”的基础上，今年要把节能环保产业打造成新兴的支柱产业。

在生态保护方面，李克强调森林草原、江河湿地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绿色财富，必须倍加珍惜。要推进重大生态工程建设，拓展重点生态功能区，办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开展国土江河综合整治试点，扩

二、分篇I

大流域上下游横向补偿机制试点,保护好三江源。扩大天然林保护范围,有序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今年新增退耕还林还草 1000 万亩,造林 9000 万亩。

服务型政党

真正体现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服务型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是：

抓好党员思想和作风建设是前提。思想建设是党建工作的灵魂，因此，必须在党员的思想建设上下功夫。作风建设也是抓好服务型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要认真落实党风建设的责任，使每个党员干部都遵守纪律。在作风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同时依靠群众参与，要将每个层次的工作都落实到位，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要进一步完善党内监督机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抓好党性教育是关键。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关键要抓好党性教育。党性教育包括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党员的自我教育和党组织教育。党员在进行自我教育的时候，必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主动把好思想总开关，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党组织就像一个“大熔炉”，担负着对党员加强党性教育的责任。

做好党员的管理是保障。基层党组织的建立以及党员队伍的培养不能仅仅只做好党员的选拔与党员的教育工作，还必须加强对党员队伍的管理工作，党员干部的管理工作是提高党员素质的重要途径。党员干部的管理需要从党员自身做起，要将对党员干部的管理任务下派到每

一个基层党组织中，通过党员之间的互相监督达成管理的效果和目标。基层党组织对于党员队伍的管理必须是全方位整体的管理，管理内容要涉及党员的思想、作风、工作技能、学习情况等方面。只有狠抓党员队伍的管理关，才能保证党员干部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4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基层服务型党组织要达到“六有”目标：一是有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建设服务意识强、服务作风好、服务水平高的党组织领导班子；二是有本领过硬的骨干队伍，培养带头服务、带领服务、带动服务的党员干部队伍；三是有功能实用的服务场所，建设便捷服务、便利活动、便于议事的综合阵地；四是有形式多样的服务载体，创新贴近基层、贴近实际、贴近群众的工作抓手；五是有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形成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工作制度；六是有群众满意的服务业绩，取得群众欢迎、群众受益、群众认可的实际成效。经过三至五年努力，使基层党组织服务意识明显增强、服务能力明显提高、服务成效明显提升，各领域涌现出一大批符合“六有”目标的基层服务型党组织。

“八项规定”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会议要求，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八项规定”的具体内容是：

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严格控制以中央名义召开的各类全国性会议和举行的重大活动，不开泛泛部署工作和提要求的会，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出席各类剪彩、奠基活动和庆祝会、纪念会、表彰会、博览会、研讨会及各类论坛；提高会议实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

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没有实质内容、可发可不发的文件、简报一律不发。

规范出访活动，从外交工作大局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出访活动，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按照规定乘坐交通工具，一般不安排中资机构、华侨华人、留学生代表等到机场迎送。

改进警卫工作，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

改进新闻报道，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席会议和活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

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

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链接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4 年 1 月 8 日发布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数据显示，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后，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各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共计 24521 起，处理 30420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7692 人。

数据还显示，2013 年 12 月，各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3387 起，处理 3847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1269 人。

中央纪委在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0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建立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月报制度。

上海市纪委监委政务八项规定出台，上海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87个，处理相关责任人111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2人。

截至2015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三年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格执纪问责，全国已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4934起，138867人受到处理，其中55289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2012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京主持召开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调研座谈会上强调：要把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载体，真正让党员干部在活动中受到教育，达到在思想上、作风上“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目的。

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镜子可以照自己，也可以照他人，这次主要是照自己。

正衣冠：主要是在照镜子的基础上，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良好形象。

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既要解决实际问题，更要解决

思想问题，保持共产党人政治本色。人每天都在接触灰尘，所以要经常洗澡，打点肥皂，用丝瓜瓤搓一搓，用水冲一冲，洗干净了，就神清气爽了。同样，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也会沾上灰尘，也会受到政治微生物的侵袭，因此也需要“洗澡”，既去灰去泥、放松身心，又舒张毛孔、促进新陈代谢，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人的身体有了毛病，就要看医生，就要打针吃药，重了还要动手术。人的思想和作风有了毛病，也必须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就可能小病拖成大病，由病在表皮发展到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治，正所谓“禁微则易，救末者难”。

链接

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会议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要贯穿“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

要让党员、干部明白，自己的问题自己查找、自己解决最主动。有病要抓紧治，如果讳疾忌医，小病拖成大病，最后不仅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不利，对自己也有百害而无一利。“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都要自觉行动，照镜子要自己照，正衣冠得自己正，洗洗澡有泡澡还有淋浴，搓泥也要自己主动搓，别人帮着搓、硬搓都不如自己搓的好。要主动把自己治愈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改什么、怎样改、改得怎么样，让群众看清楚，给干部以压力，有助于推动问题解决。

整治“四风”是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明特点。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更多是具体执行单位，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群众、面对具体矛盾和问题，不查不摆难以过关，真查真摆需要勇气，这也增加了活动难度。能不能抓出

实效,关键在能不能坚持标准、严字当头。照镜子,不认真照,就看不出美丑;正衣冠,松松垮垮,就树不起形象;洗洗澡,舒舒服服泡温泉,就难以清身洁体;治治病,药力不够,也难以药到病除。

政治纪律

指各个不同时期根据党的政治任务的要求,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的基本要求,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在政治生活中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1927年党的五大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纪律”这个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治纪律的重要性。2012年11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题为《认真学习党章 严格遵守党章》的讲话。他说:“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党章对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奋斗纲领和重大方针政策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员权利和义务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制度和各级党组织的行为规范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作出了明确规定,对党的纪律作出了明确规定。”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严明政治纪律就要从遵守和维护党章入手。

政治纪律的基本要求是: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和路线、方针、政策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组织和党员对中央已经做出决定的重大方针和政策问题有不同意见,在坚决执行的前提下,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公开发表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言论,采取同中央的决

定、决议相违背的行动。

政治纪律是维护党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的纪律，在党的纪律中具有头等重要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1）党内各级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任何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允许的。（2）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纪律工作必须坚持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服务的方针。对于锐意改革的干部和群众，要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对于在改革中出现的失误，除了严重违法乱纪都必须依法处理外，都要采取疏导的方针，批评教育帮助的方针。（3）各级党组织都要注意加强政治纪律教育，提高党员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自觉性。

链接

为了实现党的纲领和主张，坚持党在政治上的原则性和组织上的纯洁性，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十分重视政治纪律，要求每个党员和每个要求入党的人都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拥护党的政治主张。1927年党的五大关于《组织问题议决案》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政治纪律”这个概念。《议决案》的第三条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1975年，针对当时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党内状况，邓小平重新提出了党的政治纪律问题。他说：“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保证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中央再次提出和强调执行党的政治纪律问题。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第一条就具体规定了党的政治纪律，强调：“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党内政治生活准则中最根本的一条。”以后，十二大以来的党章都把保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作为新时期加强党

的建设的根本要求。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也都对全党政治上的统一做了强调。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指出：“全党同志要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始终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保证政令畅通。”

在新的历史时期，正确执行党的政治纪律，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任何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允许的；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纪检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服务的方针；同时，各级党组织都要注意加强政治纪律教育，提高党员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的自觉性。

“老虎”“苍蝇”一起打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此后“打虎拍蝇”成为了中国全面反腐的形象“代名词”。

“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打”字，表层含义是对各层面的腐败重拳打击，严厉惩治大大小小的贪腐分子；深层含义则是在打的过程中驱动各项制度全面运转，确保制度充分贯彻落实。首先，制度的实质和精髓在于管用和有效。再完备的制度，如果发挥不出惩治和威慑作用，就只能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其次，“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在制度运转中查找现有制度的缺陷和漏洞，进而有针对性地加以弥补和完善，扎紧制度的笼子。第三，“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使新制度更具针

对性、有效性和实用性。实际上，“打”与制度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也是统一的。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作风建设要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作风建设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让人民群众不断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和变化。

“踏石留印”原意是指人踏在硬石上也能留下印痕；“抓铁有痕”原意是指人抓到一块钢铁也能留下较深的印痕。二者常作褒义词应用，与“蜻蜓点水”一词互为反义。一般是用以形容人的工作扎实，不管干什么工作都能留下自己业绩。应用中二者常常连用，如：领导干部要对重大决策、重要部署、主要矛盾、关键环节时刻放在心上，亲力亲为，抓出实效，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如：要让“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成为我们推进各项工作的“规定动作”，而且要成为一种“工作常态”，使实效见诸“终端”。形容做事情不达目标不罢休，有坚持到底，做就要做好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提及这一关键词的场合，主要是针对两项工作：一是全面从严治党，二是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013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根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求，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民，就是坚持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坚持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务实，就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发扬理论联系实际之风。清廉，就是自觉遵守党章，严格执行廉政准则，主动接受监督。

活动的基本原则是：正面教育为主、批评和自我批评、讲求实效、分类指导和领导带头。

活动要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坚决反对奢靡之风。

活动分三个环节：第一环节：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第二环节：查摆问题、开展批评；第三环节：整改落实、建章立制。

链接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于2013年6月18日启动，教育活动时间一年左右，活动紧紧围绕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自上而下在中共全党深入开展。教育活动指导思想是为民、务实、清廉。切入点是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教育活动重点对象是县处级以上



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批活动于2014年1月开始进行，于2014年10月结束，这次活动更为贴近基层。根据中央统一安排，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中分别联系一个县，习近平总书记联系兰考县。



“四风”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四风”问题是违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

形式主义：表现为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有的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学了也是为应付场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无心也无力在实践中认真运用。有的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闻、上电视作为头等大事，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有的抓工作不讲实效，不下功夫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形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仪式一场接着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客里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去就是为了出镜头、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

官僚主义：表现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主要表现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公仆意识淡薄、群众感情淡漠；跑官要官，任人唯亲；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讲大局、不顾长远，不重视基础性工作，而是急于出政绩，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不负责任，不敢担当，对待上级部署囫圇吞枣、断章取义，执行上级决定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吃拿卡要，与民争利，公共利益部门化，把部门权力个人化；表里不一，纪律松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视规定为无物，使制度形同虚设。

享乐主义：表现为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有的意志消沉、信念动摇，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有的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有的拈轻怕重，安于现状，不愿吃苦出力，满足于现有学识和见解，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立新目标，缺乏新动力，“清茶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

奢靡之风：表现为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修建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甚至占地上百亩、耗资几个亿，搞得富丽堂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有的热衷于造节办节，节庆泛滥成灾，动辄花费几百万、几千万，劳民伤财。有的热衷于个人享受，住房不厌其大其多，车子不厌其豪华，菜肴不厌其精美，穿戴讲究名牌，对超出规定的生活待遇安之若素，还总嫌不够。有的要求超规格接待，住高档酒店，吃山珍海味，喝美酒佳酿，觥筹交错之后还要“意思意思”。有的兜里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弦，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甚至到境外赌博场所挥金如土。有的作风不检点，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链接

八项规定需要常抓不懈

猴年春节是中央八项规定发布后的第四个年头，从中央到地方反“四风”态势强劲，诸多违反八项规定的行为正被清扫，党风政风大为好转。然而，尽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高压势头不减，但“四风”新变种、新花招不时出现，特别是节日期间的“四风”现象仍屡禁不止，值得警惕。梳理各地纪检监察机关通报的违规案件发现，仅2015年就查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8万余起，处理9万余人。

解决“四风”问题，诚然需要广泛而深入地开展教育实践活动，更需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反对奢靡之风要着重狠刹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



主体责任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党委的主体责任：一是加强领导，选好用好干部，防止出现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二是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三是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四是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

处违纪违法问题；五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管好自己，当好廉洁从政的表率。

落实主体责任，关键在狠抓作风建设，咬定青山不放松，真正让党员干部不敢、不能、不想腐败。关键在狠抓严明纪律，严防纪律松弛、克服组织涣散，执纪必严、违纪必究，不让纪律成为一纸空文。关键在狠抓惩治腐败，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特别要坚决查处那些顶风违纪、不知收敛、群众反映强烈的贪腐案件，形成有力震慑。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2014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通过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管理，严肃纪律，使领导干部“不能腐”；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宗旨意识，使领导干部“不想腐”。

链接

新华网评：如何让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

一个领导干部，组织培养起来很不容易，但自己要墮落下去却很容易。干部墮落，受到处理，个人断送政治前途固然令人惋惜，但党组织受到的伤害同样不能小觑。因此，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着眼于未雨绸缪，坚持抓早抓小，对存在的问题早发现、早处置，防止小错酿大祸。让领导干部“不

想腐”“不能腐”“不敢腐”，其根本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使我们党的组织不受伤害或少受伤害。

发生腐败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少数领导干部放松个人主观世界改造，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具有“想腐败”的思想动机；权力制衡的机制还不够健全，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使领导干部存在“能腐败”的客观条件；对腐败行为的及时发现、严厉惩处的方法、措施和途径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使领导干部诱发“敢腐败”的侥幸心理。让领导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既是反腐倡廉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进一步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基本路径。

实践证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得比较好的人，有良好党性和敬业精神的人，就比较能做到自律，就能顶住诱惑。让领导干部“不想腐”，就是要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常补理想信念之“钙”，形成“不想腐”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对领导干部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行为规范的教育，使其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自觉地限制私欲的膨胀，从而达到清正廉洁的目的。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要严于律己，防微杜渐，自觉抵制名利、金钱、女色的诱惑，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

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避免一些地方存在的“牛栏关猫”式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才能让公共权力真正用于公众。让领导干部“不能腐”，就是要从源头抓起，从完善机制入手，形成一整套“不能腐”的严格制度体系，使腐败的“成功率”大大降低。坚持深化改革和创新，尽快形成使腐败分子难以得逞的体制、机制、法制，加强对领导干部八小时以外的监督，拓宽监督渠道，也就是通过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法制和机制规范领导干部对公共权力的使用，使其难以滥用权力、以权谋私。

运用严刑峻法对腐败分子实行严厉的制裁，让腐败分子在政治和经济上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使那些利欲熏心、胆大妄为之徒断然止步。让领导干部“不敢腐”，就是要加大执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和社会氛围。加大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对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使行政权力的运行处于众目睽睽之下，避免“暗箱操作”，一旦出现腐败现象，有畅通、

敏捷的检举、控告、罢免等制度来揭发和制止这种行为，不使腐败分子“痛苦一阵子，幸福一辈子”，而是使腐败分子“提心吊胆一阵子，痛苦折磨一辈子”。

(2013年10月17日)

“三严三实”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作关于推进作风建设的讲话中首次提出。该要求被称为“三严三实”。

严以修身：就是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

严以用权：就是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

严以律己：就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谋事要实：就是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

创业要实：就是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做人要实：就是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做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链接

201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方案》，对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安排。

《方案》要求，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对照“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要求，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着力解决“不严不实”问题，切实增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上见实效，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上见实效，在真抓实干、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上见实效。

活动要求，把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与做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结合起来，与完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做到专题教育与日常工作有机融合、相互促进，两手抓、两不误。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2014年3月9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表明了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决心和态度。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生命线，作风建设事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事关国家发展大计。当前，我国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支撑发展的要

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改革“险滩”等着去涉，“硬骨头”等着去啃。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一些地方并未彻底扫清。少数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这些问题尽管是老问题，尽管是少数，但依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不仅与我们党的宗旨格格不入，也是党性不强、纪律不严的体现。

链接

毛泽东同志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首次提出了“作风”的概念，系统概括出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了党的作风建设一整套理论，并以此指导全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较好地解决了当时党的作风建设存在的问题；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的全面拨乱反正，开创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的新局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抓住作风建设这个“牛鼻子”，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在全党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为主要内容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2016年又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习党章党规、学习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活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坚持坚持再坚持，把作风建设抓到底”、“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既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又是对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的丰富与发展。

“稻草人”

指置各项法律制度于不顾，让它们形同虚设。

2014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但不要让它们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具体说道：我们的制度不少，可以说基本形成，但不要让它们形同虚设，成为“稻草人”，形成“破窗效应”。很多情况没有监督，违反了也没有任何处理。这样搞，谁会把制度当回事呢？我们党的制度是从党章开始的，学习党章学了半天，最后还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不行！我们的制度有些还不够健全，已经有的铁笼子门没关上，没上锁。或者栅栏太宽了，或者栅栏是用麻秆做的，那也不行。现有制度都没执行好，再搞新的制度，可以预言也会是白搭。所以，我说一分部署还要九分落实。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气力要花在这上面。

“猎狐行动”

国际追逃追赃行动。

2014年7月22日，国家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中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2014年年底，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既打国内“老虎”“苍蝇”，也把反腐的“天网”撒向海外，掀起声势浩大的国际追逃追赃。公安部开展的“猎狐行动”，就是坚持缉捕、劝返两手都要硬，追逃、追赃两手都要狠，尽最大努力收缴外流的赃款赃物，这对境外逃犯形成了冲压式震慑。

2014年7月至12月底，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开展了“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组织领导坚强有力，协同作战合力倍增，创新战法成效明显，政策威慑威力强大，共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80名。“猎狐行动”已成为中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形象标志。

链接

2015年7月22日，公安部启动“2015猎狐行动”，此后不断发布阶段性“战报”。至10月17日，从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56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88名，其中抓获潜逃十年以上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21名；从日本、比利时等发达国家抓获84名，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126名。

据央视 2015 年 11 月 30 日报道，其自公安部获悉，截至 11 月 24 日，自 57 个国家和地区抓获的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已达 329 人，其中 149 人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截至 2015 年 10 月 27 日，25 个省区市也通报了“猎狐行动”的阶段性成果。“战报”显示，浙江抓获人员数量最多，高达 43 人；其次是广东，42 人。据不完全统计，抓获人员中潜逃十年以上的超过 20 人，其中潜逃时间最长的为 16 年，如陕西警方抓获的骗贷 500 万元的嫌疑人何某，潜逃时间就已达 16 年。

“天网”行动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

2014 年，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设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办公室成员由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员组成。2015 年 3 月，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部署 2015 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决定 4 月启动“天网”行动。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的重要行动，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捕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2015 年 3 月经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会议决定正式启动。

“天网”行动由多个专项行动组成，分别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单位牵头开展。中央组织部会同公安部开展治理违规办理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证照专项行动。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主任黄树贤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加强防逃工作，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能让腐败分子躲进“避罪天堂”，逍遥法外。

链接

2015年12月19日，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在记者吹风会上表示，自“天网”行动开展以来，中国追捕并带回800多名涉嫌腐败和经济犯罪的前共产党官员和企业领导。其中近一半是被引渡回中国，还有一些人则选择了自首。

报道称，中国迄今对外只缔结了39项引渡条约。这些引渡条约多数是与亚洲和非洲国家签订的。美国、加拿大等国没有与中国缔结引渡条约，而这些地方对中国经济罪犯来说是最具吸引力的逃亡目的地。

但是中国签订的司法协助类条约越来越多，反腐合作也是2016年杭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议题之一。

政治规矩

2015年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政治规矩”一词。他提出，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政治规矩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第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

守的刚性约束；第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第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2015年1月1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

链接

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不守政治规矩”的现象进行了总结：

在原则立场上，不守规矩主要体现为不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包括“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甚至是“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口无遮拦，毫无顾忌”。

在党内团结方面，不守规矩的主要体现，是“团团伙伙”、小山头、小圈子、宗派主义。2013年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党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不能借着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场合，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称兄道弟，“宗派主义必须处理，山头主义必须铲除”。

“高压线”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要切实执行组织纪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民主集中制、党内组织生活制度等党的组织制度都非常重要，必须严格执行。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都要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要切实加强组织管理，引导党员、干部正确对待组织的问题，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讲真话，讲实话，讲心里话，接受党组织教育和监督。要切实执行组织纪律，不能搞特殊、有例外，各级党组织要敢抓敢管，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猛药去疴、刮骨疗毒”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十八大以来，从“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到“反四风”，再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广大党员干部是一场“头脑风暴”；2012年12月以来，14项以作风建设为目的的重要规定、条例，不同方向剑指党政机关开支、官员“隐性福利”以及党员干部工作作风……这些皆可谓“猛药去疴、重典治乱”之举措。2013年，全国共有18.2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被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6400多人，比上年同期增长36.3%……这些都体现了“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链接

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疴，病；重典，严厉的刑罚。指用猛药来治病，



用严厉的刑罚来治理乱象。

刮骨疗毒、壮士断腕：刮削被毒箭射伤的臂骨、截断被毒蛇咬伤的手腕，用以阻止毒素向全身蔓延，体现了决断、果敢的勇气。此喻割舍败坏的局部、维护大局的安全的决策、实施的勇气。“刮骨疗毒”事见《三国志·蜀志·关羽传》：关羽左臂为流矢所中，箭镞之毒入于骨，医者（传说是华佗）为其破臂、刮骨以除毒。“壮士断腕”语见唐·窦臯《述书赋下》：“君子弃瑕以拔才，壮士断腕以全质。”



治裸官

所谓裸官，是指配偶已经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修订后的条例加入了“裸官不得提拔”“被问责干部两年内不得升职”等与实际联系紧密的内容。2015年4月21日，中央纪委网站发布《中央纪委机关2015年选调干部公告》，大规模选调50名左右处科级干部。此次选调明确要求对家庭成员是否移居国境外进行填报。这也是十八大后公开选调干部时首次明确要查是否“裸官”。

“裸官”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社会对此反映比较强烈。

“裸官”并不都是贪官。但从近些年查办的一些腐败案件看，确有一些腐败分子本身就是“裸官”。他们第一步先是通过各种渠道把配偶、子女移居到国（境）外，自己在国内“裸身做官”，搞贪污腐败，伺机向国（境）外转移赃款，一有风吹草动就择机潜逃。比如，广东省查处的广州市原副市长、增城市委原书记曹鉴燎案，东莞市委原副秘书长吴湛辉案，就是典型的“裸官”腐败案。

加强“裸官”管理监督,体现了中央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的坚强决心,是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需要,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需要,是维护党的形象和政府公信力的需要。

链接

2010年2月22日,监察部网站发布《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监管裸官首次作为预防腐败局工作重点被提出。

2010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和《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

2010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要求领导干部应该每年报告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也就是说,各地应该都掌握“裸官”的大体情况。

按照《规定》,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内容共14项,包括:本人的婚姻变化情况;本人持有因私出国(境)证件的情况;本人因私出国(境)的情况;子女与外国人、无国籍人通婚的情况;子女与港澳以及台湾居民通婚的情况;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情况;配偶、子女从业情况,包括配偶、子女在国(境)外从业的情况和职务情况等。在时间上,要求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一年度个人有关事项,新任领导干部应当在符合报告条件后30日内按照本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规定》还提出,不按照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诫勉谈话、通报批评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免职等处理;构成违纪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

2011年3月5日,中国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

2014年1月,中组部发布《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首次从中央层面,对“裸官”提出约束措施:凡是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四有”干部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干部。

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上谈到，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心中有党，就是时刻记着自己是党的人，心里想着党的事儿。这就要求具有高度自觉的党员意识、党的意识，行为特征是为党做事，替党分忧。

心中有民，就是心中时刻装着百姓，脑里时刻想着群众。这就要求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努力改善民生。

心中有责，就是要勤政务实，忠于职责。这就要求有强烈的责任感，在涉及党和人民重大利益面前负责任，敢担当。

心中有戒，就是时刻远离贪欲，心存敬畏。这就要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拒腐防变，清正廉洁。

链接

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节选）

一、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只有理想信念坚定，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才能有牢固思想基础。理想信念动摇了，那是不可能心中有党的。大家要把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不断领悟，不断参透，

做到学有所得、思有所悟，注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真正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二、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大家心中要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不谋私利、克己奉公。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要想得透、看得淡，自觉打掉心里的小算盘。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三、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为官避事平生耻。”干部就要有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不能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县一级领导要谋几十万、上百万人的改革发展稳定大计，管千头万绪的事务，这个舞台足够大，刚才你们也说到了，是“芝麻官”千钧担。党把干部放在这样一个岗位上信任，是重托，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不能干一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发展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四、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姓公不姓私，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



从严治党

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报告中都强调了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坚持从严治党的要求。2013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绝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2015年，“全面从严治党”成为“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治党的重要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要求。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适应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根本要求。

从轻车简从访贫问苦，到切实改进文风会风；从大力消减迎来送往，到精简取消宴请接待；从“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决策，到各级深入基层的创新举措；从清理不合格党员，到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等，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实干举措，彰显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忱拥护。

链接

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王京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措施及成效（节选）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征。

一、从严加强思想理论武装，保证全党思想统一、步调一致。第一，突出抓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培训；第二，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第三，大力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

二、从严加强作风建设，推动党风政风明显好转。第一，制定实施八项规定；第二，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三，深入推进“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三、从严把好选人用人关，大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第一，落实新时期好干部标准，着力破解“四唯”问题；第二，严把干部考察任用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第三，着眼事业长远发展，改进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第四，推进干部能上能下，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机制。

四、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第一，完善从严管理干部队伍制度体系；第二，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第三，严格日常管理监督。

五、从严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第一，以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统领，扎实推进各领域的党建工作；第二，严格党员教育管理，提升党员队伍整体素质；第三，全面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健全和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

六、从严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第一，依纪依法严惩腐败，查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取得重大进展；第二，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挥反腐“利剑”作用；第三，落实“两个责任”，努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

七、从严加强制度建设，着力提高制度治党、依规管党的水平。第一，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第二，扎实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第三，切实增强制度执行力。

“七个有之”

搞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的有之；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有之；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的有之；搞收买人心、拉动选票的有之；搞封官许愿、弹冠相庆的有之；搞自行其是、阳奉阴违的有之；尾大不掉、妄议中央的也有之。

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指出，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同年10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再次指出，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同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七个有之”对帮派团伙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这些年，在干部监督上，相当一部分党组织习惯于把防线只设置在反对腐败上，认为只要干部没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就都可忽略不计，没有必要加以追究，也不愿意加以追究。有的干部也认为，自己没有腐败问题就行了，其他问题都不在话下，没有什么可怕的。殊不知，“七个有之”危害力极强，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群众深恶痛绝，此次习总书记的“七个有之”，是对“七种问题”的严厉警告。

百人红色通缉令

红色通缉令是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的国际通报，其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已发出逮捕令、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在逃犯。

2015年4月22日，按照“天网”行动统一部署，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加大全球追缉力度，俗称“百人红色通缉令”。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十分重视同成员国执法机构的合作，多次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这次集中公布的100人包括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都是涉嫌犯罪、证据确凿的外逃人员，已经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正在全球范围追捕。中方通过国际刑警等渠道提请有关国家执法机构加强合作，协助将有关嫌疑人缉拿归案，并表示这次公布的只是其中一部分，今后对于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依然要发现一起，通缉一起。

据中纪委网站消息，截至2016年4月底，集中公布100名已被发布红色通缉令的外逃人员名单，已到案30人。

链接

这次集中公布的100人包括外逃国家工作人员和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都是涉嫌犯罪、证据确凿的外逃人员，已经由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正在全球范围追捕。其中，77人为男性，23人为女性；48人曾在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担任“一把手”，其他人员包括民警、会计、出纳、



银行信贷员等。

从涉嫌犯罪类型看，60%以上为贪污和受贿，此外还有挪用公款、合同诈骗、职务侵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诈骗、滥用职权、骗取贷款、徇私舞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从案发地看，广东、浙江、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相对较多。从可能逃往的国家和地区看，最多的是美国，有40人；其次为加拿大，有26人；此外，新西兰、澳大利亚、泰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也较多。



忠诚、干净、担当

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云南工作作重要指示时，对党员干部提出的要求。

忠诚、干净、担当是习总书记心中“好干部”的标准，即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牢记于心。

对党忠诚即各级领导干部要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认真执行党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做到为官一方，造福一方。

个人干净，意味着作风过硬。指的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上不违反党的纪律，不贪污不受贿，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级党员干部要严于律己，清清白白为官，干干净净干事，明明白白做人。

敢于担当指的是各级党员干部要有强烈的责任心，要把执政为民为己任。担当不只是在急难险重的任务前，不畏惧、不退缩、勇往直前，担当还是一种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热爱我们的祖国。

不定指标、上不封顶

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做到零容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不松，“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

“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告诫全社会，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持久战，没有上限、没有特区、没有休止符。以前，一些干部抱有“刑不上大夫”的侥幸心理，但在两年左右的时间，一批贪腐的高级别官员先后落马，打破了这种幻想；一些干部觉得打“虎”拍“蝇”可能只是“三把火”，但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再也不敢把反腐当成“过家家”了。毛泽东同志曾说：“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同样适用于反腐败斗争。广大党员、干部务必理解反腐“不定指标、上不封顶”的深意，管住自己的手脚、守住清白之身。

“不定指标、上不封顶”是一种信号，表明党的反腐败斗争将始终形成高压态势，并成为廉政建设工作的“新常态”。“不定指标、上不封顶”是一种要求，提醒各级纪检监察部门，要时刻绷紧反腐败这根弦，建立起常态化、全天候的监督模式，以实实在在的反腐成果，提振全社会的反腐士气，坚定全社会战胜腐败的信心。

塌方式腐败

短期内出现的一定范围内的系统性腐败问题。

2014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讲话指出，从已经查处的案件和掌握的问题线索来看，一些腐败分子贪腐胃口之大、数额之巨、时间之长、情节之恶劣，令人触目惊心！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塌方式腐败”！

塌方式腐败即一定范围出现的“一窝黑”“一班蛀”案件，如山西腐败系列案件，是短期内出现的系统性腐败问题。此类腐败不仅败坏了政治生态，还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形象，损害了群众的利益。

“地方腐败窝案的根子往往在一把手的权力失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认为，一把手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与其他官员相比，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环节更加繁多，其“率先垂范”作用更加恶劣。

防止官场结盟，关键在于公私分明。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与安全研究所教授毛寿龙认为：公私边界模糊，恰恰是腐败产生的重要的制度根源；公私分明是政治生态系统修复和重建的关键。要建立公私分明的官场文化氛围，一方面要探索领导干部回避制度、异地任职等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要严格党内生活，防止党内生活庸俗化。

链接

2013年至2014年，山西政界发生“矿难”，2011年产生的13位常委已有7人调任或下马，省委书记袁纯清、组织部长汤涛调任。金道铭、令

政策、杜善学，分属山西省委、政协、政府“三套班子”，他们的落马可谓“一窝腐败”。

根据山西纪委、监察厅发布的数据，2013年，该省共处分违纪党员干部11879人，其中市厅级干部26人，县处级336人。如果算上案件频发的2013年上半年，这个数字更大。

团团伙伙

这里说的团团伙伙，是指在利益集团内部，掌权者为了私利而抱团合伙。

2014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应当铭记，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绝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多次告诫各级党员干部：“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这意味着，既然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党内就决不能容忍搞什么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利益输送，更不允许自行其是、阳奉阴违。党内向来主张同心同德、清清爽爽的同志情谊，反对“圈子文化”和“山头主义”。

“团团伙伙”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江湖帮派文化的产物。唐朝晚期，面对“牛李党争”的乱局，唐文宗曾经发出“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无奈慨叹，留下了“朋党兴，政事乱”的历史警思。我们党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也很多，譬如：罗章龙搞小圈子和小组织派别活动，张国焘搞小圈子分裂红军、分裂党甚至另立中央，高岗、饶漱石搞小圈子梦想成为国家副主席，等等，都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现实

之中，权力圈子的腐败事件也是层出不穷。

事实表明，正是由于这种搞团团伙伙的“山头主义”“圈子文化”，让一些领导干部丧失了党性，漠视了国法，在相互的称兄道弟、抱团扎堆中滋生腐败，将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将上下级关系看成人身依附关系，将国家资源当成自己的私产，将下级干部当成“家臣”，在选人用人上奉行“一言堂”，任才举贤只看自己圈内人，对圈子外的人极力排斥，党员干部之间的关系被异化、政治生态被严重污染，其结成的“团团伙伙”，不仅成为不法分子和不正之风的保护伞，更为“塌方式腐败”的形成埋下祸根。

链接

习近平：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

“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党内，所有党员都应该平等相待，都应该平等享有一切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该履行的义务。

“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怎么样可以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党组织等同于领导干部个人，对党尽忠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尽忠，党内不能搞人身依附关系。

“干部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

“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

忠’。不应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

（选自《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党从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

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要抓早抓小，有病就马上治，发现问题就及时处理，不能养痍遗患。要让每一个干部牢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道理。“零容忍”，即“查处违纪问题必须坚持有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发现什么问题查清什么问题，不能装聋作哑、避重就轻，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保持高压态势不放松”是要向全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容。在反腐败问题上动真格，在群众关注的作风问题上即使事情再小也揪住不放，体现的是一种坚强决心，宣示的是一种鲜明态度。

“五个必须”

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2015年1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讲规矩是对党员、干部党性的重要考验，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他提出，广大党员干部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就是要做到“五个必须”。

“五个必须”的具体内容是：

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是，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

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

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

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日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

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铁帽子王”

历史上指的是清朝王公贵族中可以世袭特权的个别人物、家族，一些拥有功勋的亲王、郡王等。

2015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的评论员文章称,“反腐没有‘铁帽子王’,反腐败绝不封顶设限”。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专题研讨班上曾警告,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稻草人”。他当时也说:“法治之下,任何人都不能心存侥幸,都不能指望法外施恩,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其后,中纪委网站在2015年2月3日刊发的文章《不得罪腐败分子就要得罪13亿人民》中,也提到“在贪腐问题上,没有人能当‘铁帽子王’”。

从历史上看,“铁帽子王”一般指的是清朝王公贵族中可以世袭特权的个别人物、家族,一些拥有功勋的亲王、郡王可以不受法律的约束,甚至触犯法律后依然能获得“免死金牌”,比如历史上著名的多尔衮、多铎、庆亲王奕劻等人物,都算是“铁帽子王”。不过,目前“铁帽子王”这一说法,并非特指哪个“大老虎”,而是释放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层誓与寻租护租等利益集团做斗争,坚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号。

链接

所谓“铁帽子王”,是指世袭罔替的王爵,它源于清代的封爵制度。铁



帽子王和其他亲王相比，享有的特权一是“世袭罔替”，隔代不降爵；二是俸禄优厚，岁俸银1万两，禄米1万斛；三是赐予世袭罔替王府，又叫铁帽子王府。清代，共有12位承袭爵位无需降等的“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即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肃亲王豪格、庄亲王硕塞、克勤郡王岳托、顺承郡王勒克德浑，因为他们功勋卓绝，所以获得世袭罔替的永久封爵，同时还享有配享太庙的殊荣。另外四位属于恩封，他们是清代中后期在稳固江山中立功而受封的，即怡亲王允祥、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

清王朝分封皇室爵位共有功封、恩封、袭封和考封四种形式十二等爵，其中辅国将军以上还分世袭罔替和世袭递降两类。一般情况下，因为功封王爵者多属世袭罔替，也就是俗话说的“铁帽子王”。因为恩封爵位者则多属世袭递降，但在递降到辅国将军这一爵位时便不再递降。获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位的宗室并不能世袭，每世递降一等。无爵位的宗室叫“闲散宗室”，用四品顶戴。唯有12大“铁帽子王”因为其祖先功勋卓著，被赐世袭不降封典。如果某“铁帽子王”获罪夺爵，以其旁支袭爵，但其后世也不乏被夺爵的历史记载。

“关键少数”

主要指中央政治局、省部级干部、县委书记。

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关键少数”主要指以下三种情况：

中央政治局：“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中央政治局担负着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方向、统筹协调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组织应对国内外重大矛盾风险的重要职责，是“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

省部级干部：“承上启下”的“关键少数”。省部级干部在中国政治生态中处于承上启下的特殊地位：相对中央来说，是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者；相对市县乡来说，又常常是部委和省区市重大事务的决策者。积极响应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任务抓在手上，积极推动行业和地方改革发展，省部级干部责无旁贷。

县委书记：“少数的关键”。领导干部是“关键少数”，县委书记则是“少数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说，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3000多个县就像这张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是我们党在县域治国理政的重要骨干力量。”

链接

“关键少数”要发挥“关键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华大地上，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为共和国建功立业。

改革开放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and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阔步前行。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执政党，每个党员都是党的肌体中的一个细胞和一份子，而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关键



少数”，直接关系到整个肌体的健康、活力和生命。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的“关键少数”，要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叮嘱和期待，积极作为、敢于担当，更好带领群众干事创业，真正发挥“关键作用”。

“最后一公里”

2014年1月20日，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解决好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这里说的“最后一公里”，表述的是一段距离，反映的是一种隔阂，暴露的是一种感情。在惠民政策集结出台的新形势下，群众最痛恨的是政策始终“走在路上”，实惠始终没有“落在身上”，就差“最后一公里”。因此，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让人民群众真正得实惠，就要切实解决好这“最后一公里”问题。

链接

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

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借群众力量消除“最后一公里”。古语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各级领导干部要把群众意见作为消除“最后一公里”的最大动力，切实与广大群众保持“零距离”和“亲密接触”。心贴心地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站在一块田地里，脚踏实地征求群众意见、真心实意换位思考，真正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倾听群众的所恨所怨所言，最大限度把社会各界的意见收集起来，把群众的智慧、力量和

干劲凝聚起来，不断缩短服务群众的距离，拓展服务群众的空間，才能收到服务群众的好效果。

切实纠正不正之风，理直气壮打通“最后一公里”。上级惠民政策再好、办法措施再完善，如果不落实到群众当中，一切都等于零。因此，要保证上通下达，从群众最关心的具体问题抓起、从群众最不满意的突出地方改起，坚决纠正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严厉整治脱离群众的现象、服务群众不到位的问题和侵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努力打通制约服务群众的“肠梗阻”，保证群众话有地方说、事有地方办、困难有人帮、问题有人管。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用制度笼子框住“最后一公里”。从根本上说，要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必须探索建立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和工作制度，把在实践中积累的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好经验和好办法形成可以长期坚持的好制度好机制。同时，建立完善的操作细则，把干部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断加大对干部行使权力的刚性约束，有效减少在联系和服务群众中的“不作为”和“乱作为”，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共产党员网，2014年3月27日）

把纪律挺在前面

要让纪律严起来、落下去，该纪律处分的及时处分、该组织处理的作出处理，发挥纪律的正面引导和惩戒警示两方面作用。

2015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北京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要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纪律挺在前面，立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纪律是不可触碰的底线，规矩是检验对党忠诚的重要标准。讲规



矩是内在自觉要求，是对党性的重要考验。无数案例表明，领导干部往往是从破坏规矩、违反纪律开始、进而违法。从严治党就要执纪必严、动辄则咎，体现纪律的严肃性。日常管理中就体现着一份责任和担当。要抓早抓小，触犯了纪律就要及时处理，决不能放任自流，造成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链接

全面从严治党，为什么要把纪律挺在前面？

遵守党的纪律是对党员最起码的要求。我们党是肩负神圣使命的政治组织，这一性质决定了党规党纪必然要严于国家法律。党员守住了党纪底线，就不至于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如果所有党员都退守到法律防线，只有违法犯罪的才受到惩处，多数党员都“脱管”，全面从严治党就会落空。

有助于破解党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怪圈。时下，有人把全面从严治党等同于反腐败，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就是打“老虎”拍“苍蝇”、查腐败惩贪官；有人甚至认为“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党员在守纪方面出现问题时，有的党组织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等到党员党纪防线彻底失守，从违纪滑下违法深渊，就会由“好同志”沦为“阶下囚”，不仅对党员个人及其亲属造成伤害，更是给党组织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如果把纪律挺在前面，党员“破纪”时能得到及时提醒、及时纠正，就不至于触碰法律高压线，即使算不上“好同志”，也不会沦为“阶下囚”。把纪律挺在前面，正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

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

2015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提出：“要重视基层风气问题，下大气力整治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不良行为，对随意插手基层敏感事务、截留克扣基层物资经费、处事不公、吃拿卡要、侵占群众利益等问题，必须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要着力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良好环境。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下大气力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醒、警示、警戒。要加强对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管理，彻底改变对干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现象。”

如果把政治生态比作一片森林，那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就是护林员。林中，绝大部分树木都昂然挺立，但也有的被虫蛀风蚀成了“病树”，有的旁逸斜出成了“歪树”，有的则成了腐烂到根的“烂树”。护林员要做的是，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因树制宜、精准施策：对“烂树”，要连根拔掉；对“歪树”，要及时扶正；对“病树”，则要及时医治。让更多树都能成长、成材，护林员才算更好地完成了任务。

链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古人说，“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对“病树”“歪树”而言，应该对党忠诚、相

信组织,有过就改、迷途知返,经受“治病”的阵痛,再获新生;如果讳疾忌医、执迷不悟,终将病入膏肓、沦为“烂树”,难脱被“拔”命运。

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持久战。在坚持不懈的强力反腐中,既有打虎拍蝇的“霹雳手段”,也有过而让改的“菩萨心肠”,“拔烂树”“治病树”“扶歪树”,才能“护好树”“造好林”,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让政治森林万木葱茏、生机勃勃。

“四种人”

政治的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群众的贴心人、班子的带头人。

2015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提出。

做政治的明白人,就是要对党绝对忠诚,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执行党的纪律和规矩,真正做到头脑始终清醒、立场始终坚定。

做发展的开路人,就是要勇于担当、奋发有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握和顺应深化改革新进程,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从实际出发,带领群众一起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特别是要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做群众的贴心人,就是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心中始终装着老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正做到心系群众、热爱群众、服务群众。

做班子的带头人,就是要带头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带头搞好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带头抓班子带队伍，带头依法办事，带头廉洁自律，带头接受党和人民监督，带头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真正做到率先垂范、以上率下。

链接

有人把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县委书记称为“新老县委书记的对话”，20世纪80年代，习近平曾任职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于是这不是普通的对话，这是期望，更是价值观的传承。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如果把国家喻为一张网，全国的县就像网上的纽结。“纽结”松动，国家政局就会发生动荡；“纽结”牢靠，国家政局就稳定。

巡视制度

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通过建立专门巡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的制度。

党的十八大后，党中央从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出发，把巡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十次研究巡视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3—2017年）》，听取每一轮巡视情况汇报。2015年8月3日，党中央印发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党内法规的形式把巡视制度确定为党内监督的十项制度之一。2004年，全国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也都设立了巡视机构，组建了专职巡视队伍。为了规范巡视工作，中纪委、中组部于2004制定了《关

于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党的十八大后，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党内巡视制度建设和完善。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要求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这个中心，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每次听取汇报都详细审阅巡视报告，对巡视中发现的问题有针对性地评判，对重要的整改、处置工作作出指示，对巡视的目标任务、方式方法、成果运用、队伍建设和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巡视工作指明了方向。

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经开展了9轮巡视，共巡视了149家单位党组织，实现了对31个省区市、中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全覆盖。

链接

中国历史上的巡视制度

从历史上看，巡视制度发轫于西汉，成熟于唐、明。汉武帝时，把全国划分为13部，每部设立一名刺史，共13个刺史。刺史的工作方法是“乘传周流”（“传”指公家驿站的马车；“周流”意为到处巡视）。

汉、唐、明三代巡视制度有如下特点：（1）出巡官员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汉代刺史的秩位只有六百石，却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长官。他们代表皇帝行使监察权，能够“以小监大”“以卑督尊”。（2）出巡时间有充分保证。汉武帝时的刺史，每年8月下去巡察，年底结束，有4个月的工作时间。唐代监察御史出巡时间可达半年之久。明代巡按御史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各自的巡视区工作。从发展的趋势看，愈到后来，出巡的时间愈长。（3）长期流动，不长驻一地。无论是汉代，还是唐、明，巡视官员都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不是地方一级的行政机构。（4）出巡官员职责明确。汉武帝对刺史规定了“六条问事”，划定了监察范围。明代的“大事奏裁，小事立断”，也是类似的规定。这些做法也含有对出巡官员约束的意思。

专项巡视

继 2013 年中央做出“巡视对象不固定”“巡视组长一次一授权”变革后的又一新部署，主要针对特定问题、特定领域、特定人员。

2014 年 1 月，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探索专项巡视”。

专项巡视以问题为导向，形式更为灵活，哪里问题多、哪个部门问题多，就往哪投入更多力量，以便发挥巡视和监督的最大效力。“专项巡视”的特点在于“问题导向”：哪个地区或单位问题多，就向该地区或单位派驻巡视组，完全没有规律可循，上个月巡视过了，只要发现新问题，下一个月还可以再巡视。

链接

巡视是党章规定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目前，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实行巡视制度，建立专门巡视机构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监督。

一、中央巡视机构设置

党的中央委员会成立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向中央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包括：一是贯彻党的中央委员会有关巡视工作的决议、决定；二是研究决定巡视工作年度和阶段计划、方案；三是听取巡视工作汇报；四是研究巡视成果的运用，提出相关意见、建议；五是向党中央报告巡视工作情况；六是对巡视组进行管理和监督；七是研究处理巡



视工作中的其他重要事项。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为其日常办事机构。办公室设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职责包括：一是承担综合协调、政策研究、制度建设等工作；二是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巡视工作中的重要情况、向中央巡视组传达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作出的决策和部署；三是配合有关部门对巡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考核、调配、任免、监督和管理；四是配合巡视组对党中央和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进行督办；五是办理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党的中央委员会设立巡视组，承担巡视任务，向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并报告工作。中央巡视组负责对下列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巡视：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同级政府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二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政协委员会党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三是中央要求巡视的其他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中央建立巡视组组长库，由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每次巡视任务提出组长人选，一次一授权。

二、中央巡视工作重点

巡视工作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围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这个中心开展，把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作为主要任务。工作中，要突出四个重点：一是要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二是要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三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四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三、中央巡视组主要工作方式

(一) 听取被巡视地区、单位党委（党组）的工作汇报和有关部门的专题汇报；

(二) 根据工作需要列席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有关会议，列席被巡视党

组织领导班子的民主生活会和述职述廉会；

（三）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等；

（四）召开听取意见座谈会；

（五）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干部群众个别谈话；

（六）调阅、复制有关文件、档案、会议记录等资料；

（七）对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民主测评、问卷调查；

（八）以适当方式对被巡视地区、单位的下属单位或者部门进行走访调研；

（九）对专业性较强或者特别重要问题的了解，可以商请有关职能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予以协助。

四、中央巡视工作主要程序

（一）巡视准备：向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和中央组织部、审计署、国家信访局等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有关情况，研究制定巡视工作方案，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印发巡视通知等。

（二）巡视了解：向被巡视地区、单位通报巡视目的和任务，公布巡视组监督的范围、工作安排和联系方式，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被巡视地区、单位存在的问题。巡视期间，发现领导干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等问题，及时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

（三）巡视汇报：巡视了解结束后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巡视情况，主要反映巡视发现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巡视反馈：向被巡视地区、单位反馈巡视发现的问题，提出整改的意见和建议。反馈工作应体现从严治党的精神，严肃认真，形成震慑。

（五）移交督办：对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决定的事项，依据干部管理权限和归口管理、各司其职的原则，分别移交中纪委、中组部有关部门或中央有关职能部门处理并及时督办。对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整改情况，以适当方式开展监督检查。

巡视全覆盖

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巡视的全覆盖。

2013年11月9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2015年12月6日,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官员表示,2016年将重点推进对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全覆盖,确保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对中央管理的所有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部巡视一遍。

全面从严治党,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必然要求监督全覆盖。派出巡视组的党组织在一届任期内,要对其直接管理的地区、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巡视一遍。完成这个任务,必须改革创新、整合资源,盘活存量、充实队伍。

坚持常规巡视和专项巡视相结合,对地方以常规巡视为主,辅之以专项巡视;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则以专项巡视为主,分领域、分类别开展巡视。专项巡视要突出“专”的特点,机动灵活、闻风而动,精准发现、定点突破,必要时杀个回马枪,开展“回头看”。

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研究被巡视对象的历史文化和干部队伍状况,见微知著,由表及里,发现共性问题,这样才能使重点更加突出、震慑力更强。

链接

中央巡视办处长罗礼平2015年12月6日在中纪委官网访谈时表示,巡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的重要手段。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是巡视工作取得成效的根本保障。截至201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9次听取巡视报

告，政治局会议3次研究巡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先后12次发表重要讲话，为巡视工作指明方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召开53次小组会议、8次动员部署会议、6次专题会议、1次电视电话会议，推进巡视工作。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已经进行了8轮的巡视，巡视149个地区和单位，实现了对于地方和中管央企的全覆盖。2015年11月23日，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关于巡视55家中管央企情况的专题报告。

罗礼平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组用了2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对中管央企的全覆盖。

据介绍，巡视央企主要发现了五大方面问题。一是党的领导弱化。一些央企只抓业务不抓党建，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二是权力寻租腐败严重，央企领导人员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搞关联交易、利益输送。三是选人用人方面的问题突出，不讲组织程序、违规用人，有的带病提拔，有的买官卖官。四是“四风”问题屡禁不绝，公款打高尔夫球、公款吃喝、公款旅游等问题突出，顶风违纪时有发生。五是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改革不彻底、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到位，导致央企违规盲目决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罗礼平透露，中央一级的巡视全覆盖任务有280多个单位，可细化为地方、部门、央企、金融、事业单位五个板块。目前已经完成了对地方和央企的全覆盖，今年第三轮巡视结束以后，还将完成对金融单位的全覆盖，到今年年底，全覆盖任务将完成三个板块。距离全覆盖还有100多个单位，任务十分艰巨。

罗礼平强调，根据中央部署，2016年将重点推进对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全覆盖。确保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对中央管理的所有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全部巡视一遍，不折不扣完成中央交给的巡视任务，发挥巡视震慑遏制治本作用。



派驻纪检组

派驻纪检组是上级纪检部门派驻下辖地方，指导或监督当地纪检部门工作的临时（常驻）性机构。

2015年1月，中央纪委在中央办公厅等单位新设7家派驻纪检组，探索实现全面派驻的有效途径，迈出派驻监督全覆盖的重要一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党内监督全覆盖。实现对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全面派驻，使党内监督不留死角、没有空白，这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化纪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八条规定：“派驻纪检组按照有关规定对驻在部门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监督。”为使中央纪委派驻纪检组更好地履行对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的监督职责，经商中央组织部，提出如下意见。

一、派驻纪检组应当协助驻在部门党组建立健全规范党组及其成员正确履行职责和行使权力、加强自我约束和互相监督的措施和制度。

二、派驻纪检组组长参加驻在部门党组会议和有关行政领导会议，对领导班子执行议事规则的情况进行监督，对有关问题负责任地提出意见或建议。

三、派驻纪检组按照有关规定对驻在部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进行监督。

派驻纪检组在驻在部门按规定征求对拟选拔任用干部人选的意见时，应当按时以书面形式反馈意见。

四、派驻纪检组应当了解汇总对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在用车、住房、出国（境）、休假、兼职、配偶子女从业和收受礼品登记等方面执行廉洁

自律规定及个人家庭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派驻纪检组了解驻在部门党组成员执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情况，并报中央纪委。

五、派驻纪检组通过了解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参加对驻在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等方式，对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

派驻纪检组定期向中央纪委报告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

六、派驻纪检组应当派员参加驻在部门党组成员述职述廉会议，了解相关的民主评议或民主测评情况。

派驻纪检组要将驻在部门党组成员的述职述廉情况向中央纪委作综合报告。

七、派驻纪检组通过参与民主生活会前征集对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意见的工作、参加党组民主生活会、了解党组及其成员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情况等方式，对驻在部门党组民主生活会的情况进行监督。对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在民主生活会上所作的检查或说明，需要查明事实的，按照有关程序办理。

八、派驻纪检组应当严格按照中央纪委的规定，办理涉及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的信访举报件。

九、派驻纪检组组长要主动与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就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廉洁自律规定等方面的情况交换意见。

十、派驻纪检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查阅驻在部门的有关文件、资料，派员参加有关会议和活动，召开座谈会，与有关人员谈话，组织专项检查或者专项调研等。

派驻纪检组需要采取上述方式开展工作，涉及重要事项的，一般应事先与驻在部门党组主要负责人沟通，特殊情况应当事先报经中央纪委批准。

十一、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有下列情况的，派驻纪检组必须及



时向中央纪委报告，并根据中央纪委的要求向驻在部门党组主要负责人通报：

（一）直接收到反映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违反党纪问题的信访举报；

（二）发现驻在部门党组及其成员严重违反有关制度、涉嫌违反党纪问题及其他非正常情况；

（三）派驻纪检组在履行监督职责中提出纠正意见，驻在部门无正当理由不纠正的；

（四）中央纪委要求报告的其他事项。

十二、派驻纪检组按规定向中央纪委报告发现的情况和问题时，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议由中央纪委发函请驻在部门党组成员说明有关情况；

（二）建议由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或者由中央纪委委托驻在部门党组主要负责人与驻在部门党组成员进行谈话；

（三）建议对反映驻在部门党组成员违反党纪的问题进行初步核实。

十三、派驻纪检组在履行监督职责过程中发现问题，除必须向中央纪委报告的外，应当及时向驻在部门党组提出纠正意见或建议。

十四、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纪委的派驻纪检组参照执行本意见。



“四铁”干部

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

2015年12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提出。

“铁一般信仰”是基础。有了信仰,才会有方向感,才不致偏离轨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与理想追求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追求如一的信仰。

“铁一般信念”是动力。信念是坚守信仰、实现理想的坚强动力之源。信念最为集中和强烈的表现,是在世界观、人生观等信仰推动下的坚定不移的行动力。

“铁一般纪律”是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表明,正是有了严格如铁的纪律作保障,才有了铁打的队伍、铁打的精神、铁打的人民和铁打的江山。铁的纪律,既包括遵德守法的一般准则,还包括对党员干部更高要求的党的准则与纪律约束。

“铁一般担当”是责任。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担当就是“接受并负起责任”之意。像“在其位、谋其政”,是履职尽责的担当;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一种无所畏惧勇向前的精神担当;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无私奉献胸襟宽广的价值担当。

链接

“四铁”干部是“四有”干部的升华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出,做县委书记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近日,总书记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又强调,要培养造就一支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干部队伍。

一个“四有”,一个“四铁”,一以贯之,相辅相成,程度渐进,极尽升华。“四铁”就是要不折不扣、坚定不移地执行“四有”,不抛弃,不动摇,不懈怠,不放松。铁一般信仰就是心中有党永远不抛弃。铁,熔点高,耐高温,刚正不易弯曲。在各种真真假假、似是而非思想炒得沸沸扬扬的今天,党员干部应该铁血不换忠于使命,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铁一般信念就是心中有民绝对不动摇。铁,硬度强,耐击打,但凡脆弱之物,遇铁则碎。党员干部更该铁骨铮铮地在为民服务中,



把自己的信念锤炼得如铁一般坚硬和牢固，矢志不渝地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

铁一般纪律就是心中有戒始终不懈怠。铁，活性低，耐腐蚀，雨雪风霜下始终不改本色。党员干部最该铁腕丹心守住权力前后院，解得对金钱、权力、美色等“考题”，耐得住寂寞，顶得住压力、经得住诱惑。铁一般担当就是心中有责一直不放松。铁，韧性强，耐冰寒，天生一身傲骨。党员干部还该铁肩担道义扛起发展大旗，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在官一任富一方的雄心，锻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闯劲，练就攻坚克难排万难的铁肩担当。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6年2月29日）



“四个意识”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2016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时首次公开提出。

政治意识，主要是指政治思想、政治观点，以及对于政治现象的态度和评价。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决胜全面小康、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迫切需要党员干部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保持敏锐的政治观察力和鉴别力，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始终坚守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

大局意识，主要指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看问题，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核心意识，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听从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威信。

看齐意识，就是要经常主动全面地向党中央看齐、向习近平总书记

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看齐，向党中央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项决策部署看齐，确保党和国家的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链接

这“四个意识”中的前两个，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经常出现在中国政治话语系统之中。而“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是在最近才成为政治热词。为何强调“核心意识”？当今中国治理和中共执政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世界格局正在深刻调整，国内格局正在深刻变革，中国面临两个棘手的世界难题，即“中等收入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需要有智慧、有担当的领导核心，这事关13亿多中国人民的福祉和利益。

三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下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治理中国的绩效非常亮眼。未来几年的中国治理和变革，难度之大，责任之大，可以想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四个意识”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政治、中国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将深远影响未来几年的中国政治格局和改革绩效。党中央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将以更大的责任与担当，带给中国民众更多获得感。

“两学一做”

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基层延伸,巩固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进一步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持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党中央决定,2016年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2016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

学党章党规。着眼明确基本标准、树立行为规范,逐条逐句通读党章,全面理解党的纲领,牢记入党誓词,牢记党的宗旨,牢记党员义务和权利,引导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章、维护党章,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认真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学习革命先辈和先进典型,从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违纪违法案件中汲取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发挥正面典型的激励作用和反面典型的警示作用,引导党员牢记党规党纪,牢记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树立崇高道德追求,养成纪律自觉,守住为人、做事的基准和底线。

学系列讲话。着眼加强理论武装、统一思想行动,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导党员深入领会系列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深入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深刻理解党的科学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内在联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区别普通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确定学习的重点内容。

做合格党员。着眼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发展对党员的新要求,坚持以知促行,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党员。引导党员强化政治意识,保持政治本色,把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量;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常主动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践行党的宗旨，保持公仆情怀，牢记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强党性锻炼和道德修养，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廉洁从政、从严治家，筑牢拒腐防变的防线；始终保持干事创业、开拓进取的精气神，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在“十三五”规划开局起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链接

如何开展“两学一做”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落实党章关于加强党员教育管理要求、面向全体党员深化党内教育的重要实践，是推动党内教育从“关键少数”向广大党员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向经常性教育延伸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部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要突出正常教育，区分层次，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用心用力，抓细抓实，真正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做。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以尊崇党章、遵守党规为基本要求，以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武装全党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党员自觉按照党员标准规范言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觉悟；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树立清风正气，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进一步强化宗旨观念，勇于担当作为，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为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团结统一夯实基础，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增强针对性，“学”要带着问题学，“做”



要针对问题改。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理想信念模糊动摇的问题，主要是对共产主义缺乏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精神空虚，推崇西方价值观念，热衷于组织、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党的意识淡化的问题，主要是看齐意识不强，不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在党不言党、不爱党、不护党、不为党，组织纪律散漫，不按规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按时交纳党费，不完成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宗旨观念淡薄的问题，主要是利己主义严重，漠视群众疾苦、与民争利、执法不公、吃拿卡要、假公济私、损害群众利益，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时临危退缩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精神不振的问题，主要是工作消极懈怠，不作为、不会为、不善为，逃避责任，不起先锋模范作用等；着力解决一些党员道德行为不端的问题，主要是违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不注意个人品德，贪图享受、奢侈浪费等。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抓好不严不实突出问题整改，推动党的作风不断好转。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坚持领导带头，以上率下；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要以党支部为基本单位，以“三会一课”等党的组织生活为基本形式，以落实党员教育管理制度为基本依托，针对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普通党员的不同情况作出安排。要给基层党组织结合实际开展学习教育留出空间，发挥党支部自我净化、自我提高的主动性，防止大而化之，力戒形式主义。

“四讲四有”

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

2016年年初，中央提出要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学习党章党规，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中央要求通过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广大党员做“四讲四有”的合格党员。

讲政治、有信念，就是要求做到政治上合格。讲政治是对共产党员第一位的要求，始终保持思想上的清醒、理论上的坚定，提高政治觉悟、增强政治定力、牢记政治责任，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挺起理想信念这个“主心骨”，加强理论武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党性修养，努力把坚定的理想信念转化为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的具体行动。

讲规矩、有纪律，做到遵守纪律合格。严守党的纪律规矩，贵在经常、重在日常、也要做在寻常。各级党组织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入党誓词，认真学习、严格执行党章党规党纪，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的秘密，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做，入心入脑、执行到位，使党的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刚性约束。

讲道德、有品行，做到品德上合格。把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作为人生的必修课，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始终做到公私分明、先公后私，自觉树立为追求理想而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勇于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境界。

讲奉献、有作为，做到发挥作用合格。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干事创业、为民服务上，发扬“五加二”“白加黑”精神，主动作为、善于作为、敢于作为，在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当标兵、作示范。

链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增强党性、加强学习、遵纪守法等多个层面对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提出明确要求。每个党员都要

把握这些基本要求，并把它作为自我检查的镜子、自我衡量的尺子，时时对照、常常反省，不断校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坚持不懈地做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合格共产党员。

“四讲四有”标准是全体党员的标准。发挥共产党员的作用，就要把“四讲四有”标准具体化、实践化。其实，现实中的党员大多数是默默无闻的。但平凡中孕育着伟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只要自觉做到“四讲四有”，坚定信念，严格标准，立足现实，就能干大事。要始终走在前列，发挥带头作用。党员带头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带头同各种错误倾向、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要发挥骨干作用。党员要努力学习，提高思想觉悟、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兢兢业业，立足本职带头争创佳绩，以实际行动取得群众的信赖。要发挥桥梁作用。党员要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时刻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把群众与党紧密连接起来，自觉地维护和服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

问责条例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中共中央的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党中央紧紧抓住落实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先后对一批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典型问题严肃问责，强化问责成为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色。为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党中央决定制定《中国

共产党问责条例》。

链接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第一条 为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党的问责工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落实党组织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第三条 党的问责工作应当坚持的原则：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

第四条 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

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第五条 问责应当分清责任。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第六条 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一）党的领导弱化，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



响的；

（二）党的建设缺失，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生活不健全，党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问题突出，党内和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的形象，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不负责、不担当，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造成严重后果的；

（四）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五）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突出的；

（六）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

第七条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检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轻的，应当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切实整改。

（二）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情节较重的，应当责令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改组。对失职失责，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本身又不能纠正的，应当予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

（一）通报。对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二）诫勉。对失职失责、情节较轻的，应当以谈话或者书面方式进行诫勉。

(三) 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对失职失责、情节较重,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应当根据情况采取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措施。

(四) 纪律处分。对失职失责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追究纪律责任。

上述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

第八条 问责决定应当由党中央或者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其中对党的领导干部,纪委(纪检组)、党的工作部门有权采取通报、诫勉方式进行问责;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采取纪律处分方式问责,按照党章和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执行。

第九条 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涉及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应当在一个月内办理完毕相应手续。

受到问责的党的领导干部应当向问责决定机关写出书面检讨,并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采取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方式问责的,一般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十条 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第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相关规定。

第十二条 本条例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2016年7月8日起施行。此前发布的有关问责的规定,凡与本条例不一致的,按照本条例执行。

（五）军事、外交篇

1. 军事

强军目标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2013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强调，全军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而奋斗。

（1）听党指挥是灵魂，决定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听党指挥是建军之魂、强军之魂。我军作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保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听党指挥，就是要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坚决听党指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必须落实到行动上，以行动来检验；做到听党指挥，必须坚持把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摆在突出位置。切实把听党指挥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坚持不懈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深入开展军魂教育，认真学习党史军史，打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基础，坚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

（2）能打胜仗是核心，反映军队的根本职能和军队建设的根本指向。

能打胜仗是军队履行职能的根本要求；能打胜仗，就是要确保部队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坚持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胜仗聚焦，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设抓准备；做到能打胜仗，必须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习近平指出，要坚决完成担负的各项军事斗争任务，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真抓实干、常备不懈，扎实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各项工作。要大力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信息化建设管理人才和导弹专业技术人才，为完成军事斗争任务提供坚强人才保证。要扎实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提高部队复杂困难条件下可靠遂行任务的能力。

(3) 作风优良是保证，关系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作风优良是我军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作风优良，就是要保持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做到作风优良，必须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认真贯彻落实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增强法规制度的执行力，做到政治要求严、管理教育严、军事训练严、执行纪律严、落实制度严，保持部队正规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

链接

当今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但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将有新的发展，各种国际力量围绕权力和权益再分配的斗争趋于激烈，恐怖主义活动日益活跃，民族宗教矛盾、边界领土争端等热点复杂多变，小战不断、冲突不止、危机频发仍是一些地区的常态，世界依然面临现实和潜在的局部战争威胁。

中国发展仍将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外部环境总体有利。国家综合国力、核心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作为一个发



展中大国，中国仍然面临多元复杂的安全威胁，遇到的外部阻力和挑战逐步增多，生存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维护国家统一、维护领土完整、维护发展利益的任务艰巨繁重。台湾问题事关国家统一和长远发展，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近年来两岸关系保持和平发展良好势头，但影响台海局势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仍然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

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各方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世界主要国家积极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务政策，加紧推进军事转型，重塑军事力量体系。军事技术和战争形态的革命性变化，对国际政治军事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军事安全带来新的严峻挑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防空识别区是濒海国家为防范可能面临的空中威胁，在领空外划设的空域范围，用于及时识别、监视、管制和处置进入该空域的航空器，留出预警时间，保卫空防安全。这是中国有效行使自卫权的必要措施，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不影响有关空域的飞越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 2013 年 11 月 23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根据 1997 年 3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1995 年 10 月 3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和 2001 年 7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宣布划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中国政府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目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领空安全，维护空中飞行秩序。

中国政府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有充分法律依据,也符合国际通行做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包括一些大国和中国周边部分国家在内的20多个国家先后设立了防空识别区。中方的有关做法符合《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飞行基本规则》等国内法规对维护国家领土领空安全和空中飞行秩序作出了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是根据国家空防需求和维护空中飞行秩序需要确定的。防空识别区最东端距离中国依然最近,作战飞机自该点很快就能抵达中国领空。中方有必要从该点开始对航空器进行识别,判明其意图和属性,为采取相应处置措施留出预警时间,保卫空防安全。

链接

各国的防空识别区

截至目前,共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缅甸、韩国、古巴、芬兰、希腊、印度、冰岛、意大利、利比亚、巴拿马、菲律宾、德国、泰国、土耳其、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划设了防空识别区。

美国自1950年起颁布法规,宣布在其领海以外数百公里的若干点连线之内建立“防空识别区”,“一切飞往美国的外国航空器,在进入防空识别区时,须提出飞行计划并随时不断报告所处的位置”。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北美防空识别区、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夏威夷防空识别区、半岛防空识别区和在“911”袭击后建立的华盛顿特区防空识别区。

日本在1969年底单方面设立的防空识别区,不但包括钓鱼岛,还跨越日本自己主张的东海中间线,将中国东海油气田全部涵盖其中。1972年5月10日,日本防卫厅发布了关于冲绳“防空识别区”的决定,将钓鱼诸岛全部纳入冲绳列岛“防空识别区”。2010年6月,日本单方面决定把位于与那国岛上空的台日“防空识别区”界线加以修改,使日方的“防空识别区”



扩大至更靠近台湾东部海岸一侧，招致台湾方面的强烈不满。



军事思想观念新变革

2014年8月29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推进我军军事创新进行第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军事思想观念四个改变：

1. 改变机械化战争的思维定势，树立信息化战争的思想观念。
2. 改变维护传统安全的思维定势，树立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和战略利益拓展的思想观念。
3. 改变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势，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
4. 改变固守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势，树立全军一盘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念。



世界新军事革命

2014年8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军事发展新趋势和推进我军军事创新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世界新军事革命对我们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要看到世界军事领域发展变化走向，看到世界新军事革命重大影响，形成科学的认识和判断，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有针对性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中,军事领域发展变化广泛而深刻,是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场军事领域发展变化,以信息化为核心,以军事战略、军事技术、作战思想、作战力量、组织体制和军事管理创新为基本内容,以重塑军事体系为主要目标,正在推动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罕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严峻挑战和难得机遇,只有与时俱进、大力推进军事创新,才能尽快缩小差距、实现新的跨越。我军87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革命战争和人民军队建设实践、中华传统兵法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党靠不断创新,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建军治军的原则和制度,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形成了我军的特有优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军事创新这个优良传统,努力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新的军事理论、体制编制、装备体系、战略战术、管理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军事创新四原则:(1)坚持强军目标、积极引领。(2)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3)坚持抓住重点、整体推进。(4)坚持突出特色、自主创新。

链接

世界新军事革命(RMA)是美国官方最早承认和使用的词。其实质是工业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行的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信息化军事体系的整体转型,即机械化基础上的信息化。变革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革新”、一个“转变”。四个“革新”就是:1.革新军事技术,推进武器装备的信息化;2.革新体制编制,重新编组军队的结构;3.革新作战方法,以发挥信息化装备的优势;4.革新军事思想,以新的理念谋划作战与军队建设。一个“转变”就是通过上述四个方面的革新,推动战争形态从机械



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方向演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014年2月27日下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即从2014年起,每一年的9月3日就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立纪念日,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表明了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立场,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依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隆重地举行法定的、国家层面的纪念和悼念活动,目的是要牢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充分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充分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的重要基础,永远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斗争;牢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警醒全世界人民时刻警惕日本为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翻案,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和确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共同奋斗。

链接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策动“九一八事变”,进而侵占中国东北。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炮轰宛平县城、进攻卢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毅然奋起,英勇抵抗。

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历时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了重要基础,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2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即公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了“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定为9月3日。1999年9月18日,国务院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进行修订,延续了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

五大战区

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

2015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召开改革工作会议,部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任务,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通



过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重大举措，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2016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各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正式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战区以原军区机关相关职能、机构为基础，充实军种指挥和保障要素，组建战区机关。

如国防部发言人所言，战区将是“本战略方向的唯一最高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可以根据中央军委赋予的指挥权责，对“所有担负战区作战任务的部队实施统一指挥和控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是东部战区、南部战区、西部战区、北部战区、中部战区五个战区的总称，为正大军区级，由中央军委建制领导。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与原南京军区辖区相同，加上军区内的东海舰队、空军、火箭军、武警，司令部驻南京，陆军机关驻福州。负责领导和指挥江苏、福建、浙江、上海、安徽、江西的所属武装力量。陆军下辖3个集团军，即原南京军区的第1、第12、第31集团军。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包括原广州军区（除去湖北省）和原成都军区的云南、贵州两省及辖区内的南海舰队、空军、火箭军、武警，司令部驻广州，陆军机关驻南宁。负责领导和指挥广东、广西、湖南、云南、贵州、海南的所属武装力量及解放军驻港、澳部队。陆军下辖3个集团军，分别是原广州军区的第41、第42集团军以及原成都军区的第14集团军。

(3)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由原成都军区（剔除云南、贵州两省）和兰州军区（除去陕西省）合并而成，包括辖区内的空军、火箭军、武警，机关驻成都，领导和指挥四川、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重庆的所属武装力量。陆军下辖3个集团军，分别是原成都军区的第13集团军以及原兰州军区的第21、第47集团军。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包括原沈阳军区辖区与原济南军区的山东和原北京军区的内蒙古自治区再加上北海舰队及辖区内的空军、火箭军、武警，司令部驻沈阳，陆军机关驻济南。负责领导和指挥辽宁、山东、黑龙江、吉林、内蒙古的所属武装力量。陆军下辖4个集团军，分别是原沈阳军区第16、第39、第40集团军以及原济南军区的第26集团军。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包括原北京军区，除去原属北京军区的内蒙古，加上原属济南军区的河南、原属兰州军区的陕西和原属广州军区的湖北，司令部驻北京，陆军机关驻石家庄。负责领导和指挥北京、河北、天津、河南、山西、陕西、湖北的所属武装力量。陆军下辖5个集团军，分别是原北京军区第27、第38、第65集团军以及原济南军区第20、第54集团军。

链接

2015年11月24日，中央军委召开改革工作会议，部署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任务，对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进行一体设计，通过调整军委总部体制、实行军委多部门制，组建陆军领导机构、健全军兵种领导管理体制，重新调整划设战区、组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健全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等重大举措，着力构建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和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2016年2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向各战区授予军旗发布训令，正式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区。战区以原军区机关相关职能、机构为基础，充实军种指挥和保障要素，组建战区机关。截至2016年5月，从官方报道中可以确定陆军十八个集团军的归属，具体情况如下：原南京军区第1、12、31集团军全部转隶东部战区陆军；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和原广州军区第41、42集团军转隶南部战区陆军；原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和原兰州军区第21、47集团军转隶西部战区陆军；原沈阳军区第16、39、40集团军

和原济南军区第26集团军转隶北部战区陆军；原济南军区第20、54集团军和原北京军区第27、38、65集团军转隶中部战区陆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前身为第二炮兵，成立于1966年7月1日，由毛泽东主席批准，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始终由中央军委直接掌握，是中国实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主要担负遏制他国对中国使用核武器、遂行核反击和常规导弹精确打击任务。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陆军、海军、空军三个军种和第二炮兵一个独立兵种组成，“二炮”虽然与陆海空三军同为正大军区级，但是相比陆海空三军的军种身份，“二炮”的兵种身份还是有所不同的。

2015年12月31日，中央军委举行仪式，将第二炮兵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部队，并授予军旗，第二炮兵也由原来的战略性独立兵种上升为独立军种。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八一大楼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是中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火箭军全体官兵要把握火箭军的职能定位和使命任务，按照核常兼备、全域慑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建设，增强战略制衡能力，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

链接

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是建军治军的铁律。2015年4月，战略导弹部队机关专门下发《深化兵员清理整治实施方案》，采取核对编制、比对实力、清点人头、清查档案等方式，对“机关超编占用的公勤士兵”“军事实力、后勤供给实力与实际工作岗位不符的士兵”等7类违规使用兵员进行集中整治，让1700余名士兵重返演兵场。这是火箭军部队夯实“强军之基”的一个例证。

为增强纠风肃纪的针对性长效性，战略导弹部队党委机关把作风转变向全方位延伸拓展，先后出台了《加强基层风气建设“十不准”规定》《部队训风演风考风整治实施方案》等刚性措施纠治训练中的积弊沉疴，改革创新、求真务实成为导弹军营的主基调。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2015年12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领导机构、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中国陆、海、空、火箭之后的第五大军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是我军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点，主要是将战略性、基础性、支撑性都很强的各类保障力量进行功能整合后组建而成的。成立战略支援部队，有利于优化军事力量结构、提高综合保障能力。新成立的战略支援部队包括情报、技术侦察、电子对抗、网络攻防、心理战五大领域，特种作战、后勤保障和装备保障更多属于战役层面的内容是否包括在内还有待确认。战略支援部队属于独立军种部队，按照军种主建的原则，

仅负责相关部队的军政管理工作，不具备作战指挥功能。

链接

公开资料显示，美国组建太空作战部队，建成了下辖 10 万部队的网络司令部，打造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战力量。俄罗斯整合空军与航天作战力量建立空天军，组建了网络战指挥机构和部队。英国启动新锐网络战部队“第 77 旅”，通过脸书网站平台专攻“非常规信息战”。日本则通过《宇宙基本法》加快太空军事化进程，积极组建“网络空间防卫队”。

面对这场新军事革命的汹涌浪潮，谁洞察先机，谁就能赢得未来。习主席和中央军委果断决策，组建战略支援部队，打造维护国家安全的新型作战力量，并将其作为我军新质作战能力的重要增长点。

围绕加速培育新质作战能力，部队确立了技术武器化、力量体系化、能力实战化的发展方向，以进入战备为指标，分阶段推进实战化能力建设。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简称“中央作战中心”，指挥中心设在北京。从 2013 年举行的“行动使命—2013”军事演习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中央作战中心审定演习作战方案。2016 年 4 月 2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到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视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军委和战区两级联指中心全体指战员致以诚挚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全军委联指中心是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强化军委战略指挥功能的重要举措。当前，作战指挥战略

性、联合性、时效性、专业性、精确性要求越来越高。要坚持底线思维，强化危机意识，担起历史重任，适应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抓住和用好国防和军队改革这个历史性机遇，努力构建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能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以提高作战指挥能力为根本目的，一切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根本标准，扭住制约联合作战指挥的矛盾和问题寻求突破。要适应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抓紧理顺有关重大关系，健全完善联合作战指挥运行机制。要采取超常措施，多管齐下培养联合作战指挥人才，尽快有一个大的突破。要强化军事需求牵引，加紧开发利用先进军事技术手段，提高指挥手段的先进性、有效性和自主可控水平。要深入研究信息化战争制胜机理，研究现代作战指挥规律，构建具有我军特色、符合现代战争规律的先进作战理论体系。要适应改革要求，加紧形成科学配套的联合作战法规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军委联指中心要把握好职能定位，进一步完善编组、优化程序、明确责任，优化完善运行模式。要加强指挥理论学习、指挥技能培训、指挥处置演练，不断提高实际指挥能力。要抓好战备值班工作，深入研判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有效应对各类突发情况。要以军委联指中心运行实践促进战区联指中心工作，尽快形成联合作战指挥能力。

链接

美军在1920年颁发的第一本联合作战条令《陆军和海军联合行动》（Joint Actions of the Army and Navy）中，首次提出了“联合作战”的概念。之后，美军对联合作战本质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变化之一，就是将联合作战的属概念由“作战行动”放大为“军事行动”，使联合作战的应用范畴大大拓展。1985年美军《作战术语与标号》明确，“联合作战行动是美国武装部队的两个或多个军种实施的以此作战行动”，1993年则修改

为“美国军队两个或两个以上军种的统一军事行动”。这一变化表明，美军的军事力量运用，不论是军事接触、安全合作还是军事威慑行动，不论是危机反应、有限应急行动还是大规模作战行动，都统一纳入了联合作战的范畴。变化之二，就是联合形态由“军种力量联合”逐渐过渡到“联合部队联合”和“地域联合”。2011年版《联合作战纲要》明确，“联合作战是对由联合部队或按照指挥关系进行运用的各军种部队实施的军事行动的统一统称”。这标志着美军常态化联合作战指挥由战区级延伸到部队级，作战要素由传统领域拓展到新型领域，联合作战范畴由纯军事领域延伸到其他领域。

2. 外交

命运共同体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人类文明走向的中国判断。此后3年多，习近平主席从区域层面“命运共同体”到世界层面“命运共同体”；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在各种国际场合数十次谈到“命运共同体”。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论述，“命运共同体”思想包含着差异观和统一观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和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差异性。如果说“共同体”这一概念主要表达的是事物的统一性、整体性的话，那么，这种统一性是以多样性、差异性为前提或基础的，没有多样性、差异性就没有统一性和整体性。当今世界正由于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因而，才有强调“共同体”的必要性。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统一观或整体观。命运共同体既包括多样性、差异性，更体现统一性、整体性。因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差异观或差异性理念，具体包括这样一些内容。第一，尊重原则。这种“尊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

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二是尊重自主选择。因为“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第二，民主协商原则。即“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只能由本国政府和人民去管，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这是处理国际事务的民主原则，国际社会应该共同遵守”。

链接

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支持成立了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组成的“全球治理委员会”，该委员会于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我们天涯成比邻》报告，其对全球治理概念的定义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

全球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由于全球化导致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途径是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二十国集团，协调各国应对危机，使世界经济摆脱了陷入20世纪20—30年代全球大萧条的境地。国际上各种协调磋商机制非常活跃，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前进。

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价值观基础。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核心内容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2013年6月，习近平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双方达成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2014年11月，在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从6个重点方向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2015年9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华盛顿布莱尔国宾馆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时指出，事实充分表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目标是完全正确的，具有强大生命力。

不冲突、不对抗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要前提。尽管有研究显示，历史上既有大国与新兴大国多数是以对抗和战争结束，但现在的世界已今非昔比，中美之间乃至全球各国之间已是日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对抗将是双输，战争没有出路。

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只有相互尊重对方人们选择的制度与道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关切，才能求同存异，进而聚同化异，实现两国的和谐共处。

合作共赢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由之路。中美双方在双边各领域都有着广泛合作需求和巨大合作潜力。同时，作为两个大国，在世界舞台上，从反恐到网络安全，从核不扩散到气候变化，从中东和平到非洲发展，也都离不开中美的共同参与、合作与贡献。



链接

王毅：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五点建议

2013年9月20日，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题为《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演讲时，外交部长王毅对于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五点建议：

第一，不断增进战略互信，使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更加牢固的基石之上。中方始终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要挑战甚至取代美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美方近年来也反复表示不把中国视为威胁，无意遏制中国，乐见中国走向强大，保持稳定。

第二，大力促进务实合作，使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更加深厚的利益纽带之上。中美建交40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已接近5000亿美元，相互投资超过800亿美元，快速发展的经贸关系不仅给两国各自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红利，也成为中美关系经历风雨但始终破浪前进的压舱石。双方已同意启动的双边投资协议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开辟新的前景。

第三，积极加强人文交往，使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之上。鼓励和扩大两国民众之间的相互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感情。积极引导各自民意，让支持中美友好合作成为主流声音。

第四，不断加强在国际地区热点及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使新型大国关系建立在更加紧密的共同责任之上。在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中美已建立了相应的工作组，已展开良好的合作势头。

第五，重点加强亚太事务合作，使亚太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验田”。一是中美在亚太要真正尊重和照顾对方的利益关切。二是共同努力，争取在朝核问题、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的合作上取得实质性成果。

“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2013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时强调，铺就面向东盟的海上丝绸之路，打造带动腹地发展的战略支点。

“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波罗的海）；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

根据“一带一路”走向，陆上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重点经贸产业园区为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海上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中巴、孟中印缅两个经济走廊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关联紧密，要进一步推动合作，取得更大进展。

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一带一路”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

链接

古代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从运输方式上，主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东汉起自中国古都洛阳，西汉起自古都长安（今西安），经河西走廊、中亚国家、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而达地中海，以罗马为终点，全长 6440 公里。这条路被认为是联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路，而丝绸则是最具代表性的货物。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中国输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货物，从丝绸到瓷器与茶叶，形成一股持续吹向全球的东方文明之风。尤其是在宋元时期，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指南针的航海运用，全面提升了商船远航能力，私人海上贸易也得到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同世界 60 多个国家有着直接的“海上丝路”商贸往来，引发了西方世界一窥东方文明的大航海时代的热潮。明代郑和远航的成功，标志着海上丝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

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金融、贸易、生态、安全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2013 年 4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强调，要稳步推进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为世界经济健康

稳定增长提供保障。2014年3月28日，他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演讲时说，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此后他在多种场合反复阐述这个问题。

全球治理理论是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而提出的旨在对全球政治事务进行共同管理的理论。该理论最初由社会党国际前主席、国际发展委员会主席勃兰特于1990年在德国提出。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并由卡尔松和兰法尔任主席，该委员会于1995年发表了名为《天涯成比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全球治理的概念、价值以及全球治理同全球安全、经济全球化、改革联合国和加强全世界法治的关系。

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治理是个人和制度、公共和私营部门管理其共同事务的各种方法的综合。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中，冲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调适并能采取合作行动，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由此可见，全球治理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二是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三是全球治理的方式是参与、谈判和协调，强调程序的基本原则与实质的基本原则同等重要。四是全球治理与全球秩序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全球秩序包含那些世界政治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常规化安排，其中一些安排是基础性的，而另一些则是程序化的。

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家、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全人类的普世价值。二是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

议、程序等。三是全球治理的主体。即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四是全球治理的客体。指已经影响或者将要影响全人类的、很难依靠单个国家得以解决的跨国性问题，主要包括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国际经济、跨国犯罪、基本人权等。五是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对全球治理绩效的评估，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具体包括国际规制的透明度、完善性、适应性、政府能力、权力分配、相互依存和知识基础等。有学者把上述五个核心要素转化成五个问题，即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

链接

2015年，中国外交的主线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以中国理念和实践引领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和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实践方向：要审时度势，努力抓住机遇，妥善应对挑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为我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不仅仅向世界贡献了治理理念，中国还以踏实稳健的步伐推动着全球治理更加健康、公平、有序的发展。这其中包括巩固G20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地位；推动“一带一路”发展，为全球经济提供新方案；以“铁腕”承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建设；加入SDR，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制改革，成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建立合作共赢的多边开发机构；继续加强南南合作，推进中非关系深化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2016年，中国将继续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理念和新型全球发展伙

伴关系”等理念，继续推动全球治理向更加公平、公正、高效的方向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共同繁荣贡献中国力量。

亚投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简称。

2013年10月2日，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全球迎来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暨理事会和董事会成立大会在北京举行。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宗旨在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并且加强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总部设在北京。亚投行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全部确定共有57个，其中域内国家37个、域外国家20个。虽然亚投行接收意向创始成员国已经截止，但今后仍会继续吸收新成员加入。各方在今后的章程谈判和磋商中，将就吸收新成员的程序和规则等作出安排。

作为中国提出创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主要业务范围业务是援助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运用一系列支持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坚持国际性、规范性和高标准,确保专业运营、高效运作、透明廉洁。亚投行将借鉴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环境及社会框架、采购政策、项目管理、债务可持续性评价等方面好的经验和做法,制定严格并切实可行的高标准业务政策。同时,亚投行将避免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曾走过的弯路,寻求更好的标准和做法,以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链接

2016年5月2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行长金立群当地时间在德国法兰克福召开的亚洲开发银行(亚开行,ADB)第49届年会期间与该行行长中尾武彦共同签署了一项旨在增强两家机构合作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其中涉及的合作内容包括一系列合作融资项目。双方未来还将定期举行高级别磋商。

作为首个由中国倡导成立的多边开发机构,亚投行旨在为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支持。该行成立于2015年12月25日,总部设在中国北京,法定注册资本达1000亿美元。中国、印度、俄罗斯目前为亚投行前三大股东。亚投行于今年1月16日正式开业。

亚开行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是成立于1966年的多边开发机构。

根据上述谅解备忘录,双方将合作推出融资项目。双方同意,将在优势互补、创造附加值、加强制度建设、发挥比较优势、推动互惠共赢等基础上,加强彼此在战略和技术层面领域的合作融资等合作。

金立群当天表示,对于能使亚投行与亚开行的伙伴关系更进一步感到高兴。他说,亚投行期待与亚开行深化目前已经很好的合作关系,并在共同满足亚洲地区巨大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方面扩大合作。

中尾武彦对上述合作表示赞赏。他表示，在亚投行成立的过程中，亚开行就已经与亚投行展开了紧密的合作。他认为，双方将在促进本地区可持续发展、减贫、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增强合作。

修昔底德陷阱

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就是“修昔底德陷阱”。

2014年1月，美国《赫芬顿邮报》旗下《世界邮报》创刊号刊登了对习近平主席的专访。针对一些人对中国迅速崛起后必将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担忧，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时再次提道：“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2400多年前，古希腊曾爆发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斯巴达必须回应这种威胁，因此引发了这场战争。后人把这种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逻辑，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从国际关系理论来说，“修昔底德陷阱”表明了一种安全困境，即在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情境下，每个国际行为者都担心被其他行为者侵害、占领或消灭，因此为了安全就要增加权力；但对方也会增加权力以应对威胁，若两个行为者无法调控分歧，那么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今天，因中国迅速崛起而引发的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恐惧，让一些人认为中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有可能掉进这个“修昔底德陷阱”。



链接

冷 战

冷战（Cold War）是指1947年至1991年之间，以美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的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国杜鲁门主义出台，标志着冷战开始。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标志着两极格局的形成。1991年华约解散，之后苏联解体，说明了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失败，标志着冷战结束，同时也标志两极格局结束，前后共44年。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变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超多强”。

当时的美国和苏联同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两国及其盟国展开了数十年的斗争。在这段时期，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双方都尽力避免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进行，即“相互遏制，不动武力”，因此称之为“冷战”。

冷战主要表现为以美国与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夺，是世界长期不得安宁的主要根源。两大军事集团实力相当，谁都不敢轻易动用武力来结束对方与其的世界霸权争夺。两国都储存了大量核弹头，彼此相互保证毁灭。冷战结束后再加上经历了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世界各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战争。

丝路基金

丝路基金是由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重点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

2014年11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规划、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设立丝路基金。这是“丝路基金”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2014年11月9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出邀请：丝路基金是开放的，可以根据地区、行业或者项目类型设立子基金，欢迎亚洲域内外的投资者积极参与。

习近平主席指出，设立丝路基金是要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他进一步阐释了设立丝路基金的初衷：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亚洲各国多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建设资金，关键是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将宝贵资金用在刀刃上。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4年12月29日在北京注册成立，并正式开始运行。



链接

丝路基金投入运作

丝路基金一方面加强战略规划和布局研究,建立完善投资决策程序和业务规范;另一方面,积极拓展业务联系,主动走访和联系有关部门和企业,加强项目评估和遴选,已确定一批重点跟踪项目和若干潜在可“落地”的投资项目。

丝路基金的投资运作策略:

“夯实基础”——强化项目驱动、扎实推进,避免概念驱动和投资冲动。

“增进信任”——在项目合作过程中增进各方了解和互信,促进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

“统筹兼顾”——尊重投资所在国的法律,遵循国际标准,照顾各方“舒适度”,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探索创新”——加强相关领域的研究,探索互利共赢、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模式。

丝路基金2015年4月签下“首单”,投资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项目之一卡洛特水电站。丝路基金是为利用我国资金实力直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而设立的,选择走廊能源项目作为丝路基金的第一个支持项目,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与巴基斯坦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也反映出“一带一路”对走廊建设的推动作用。



澜湄合作

澜湄合作,是指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6国围绕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实施可持续开发和开展互惠务实合作。

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第1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在中国—东盟(10+1)框架下探讨建立澜沧江—湄公河对话合作机制。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于2016年3月23日上午在三亚会议中心正式举行。

从顶层设计来看,推进澜湄合作是为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而这一旨在为促进次区域发展与繁荣、建立互利互惠与合作共赢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已经得到了湄公河流域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从内容规划来看,澜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6国睦邻友好关系,促进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推动东盟共同体建设和区域一体化进程,打造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南南合作新典范。

从具体路径来看,合作机制筹建工作顺利推进,已确定了“3+5”合作框架,即以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为三大合作支柱,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为优先方向,并将通过首次领导人会议继续加以丰富和深化。

链接

2011年震惊世界的湄公河大案发生之后,湄公河黄金水道一度归于沉寂。中老缅泰四国很快启动了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自2011年以来,为700多艘商船保驾护航,有力地维护了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服务了沿河民生。多国联合巡逻执法如今已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执法合作的典范,还湄公河流域以安宁平和,为澜湄国家深入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安全基础。

2016年5月初,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完成了第45次行动,中方执法船艇回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关累港。关累港南与老挝陆路相连,西与缅甸隔江相望,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线一个重要港口,也是云南建设国际大通道的前沿,因而被人们习惯地称为澜沧江上的“中国第一港”。

中国核安全观

中国核安全观，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在国际会议上全面阐述的关于核安全问题的思想、原则的简称。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核安全观”概念的国家。2014年3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荷兰海牙举行的世界“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发表讲话，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发展和安全并重、权利和义务并重、自主和协作并重、治标和治本并重”的核安全观，呼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实现核能持久安全和发展。

根据习近平主席的讲话精神，中国核安全观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发展和安全并重，以确保安全为前提发展核能事业。我们要秉持为发展求安全、以安全促发展理念。任何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核能发展，都难以持续，都不是真正的发展。

第二，权利和义务并重，以尊重各国权益为基础推进国际核安全进程。切实履行核安全国际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在强调各国履行有关国际义务的同时，尊重各国根据本国国情采取最适合的核安全政策和举措的权利。

第三，自主和协作并重，以互利共赢为途径寻求普遍核安全。核安全首要责任应该由各国政府承担，各国政府要强化核安全意识，加强机制建设，提升技术水平。核安全也是全球性课题，要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国际核安全进程，加强交流、互鉴、共享，有关多边机制和倡议要统筹协调、协同努力。

第四，治标和治本并重，以消除根源为目标全面推进核安全努力。完善核安全政策举措，坚持核材料供需平衡，深化打击核恐怖主义国际合作，是消除核安全隐患和核扩散风险的直接和有效途径。只有营造和

平稳的国际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问题，实现核能持久安全和发展。

习近平主席强调，发展核事业 50 多年来，中国保持了良好的核安全记录。中国对全国核设施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查，不断完善国家核安全法规体系，正在制定核安全条例。中国还积极推动核安全国际合作。

习近平主席最后指出，光明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我们在核安全领域多作一份努力，恐怖主义就少一次可乘之机。中国将坚定不移增强自身核安全能力，坚定不移参与构建公平、合作、共赢的国际核安全体系，坚定不移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导的核安全国际合作，坚定不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为实现持久核安全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链接

前三届核安全峰会取得了诸多成果。就涉及全球核安全体系的各个方面，历届峰会先后提出了 19 项非约束力承诺或鼓励措施。其中关键一项是，鼓励在核能研究中使用低浓缩铀，将使用高浓缩铀燃料的研究堆转化为使用低浓缩铀的研究堆。核安全峰会所确定的这一加强国际核安保的重要措施，还有助于减少核扩散风险。

中国不仅提出核安全观，而且将此落实于行动。2014 年，中国和加纳达成协议，由中国帮助加纳将其微型中子源反应堆改造为可使用低浓缩铀燃料的反应堆，并向其提供所需的低浓缩铀，这一协定取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的核准。2015 年，国际社会取得了协商解决伊朗核问题的突破，其中核心一环就是中美两国共同合作，改造伊朗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这些都是近年来我国为促进国际核安全与防止核扩散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中国文明观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有关人类文明发展的演讲，首次在国际场合深入、全面地阐述中国的文明观。

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要秉持文明是多彩、平等和包容的原则。他呼吁世界不要从“文明冲突论”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而是要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事实。唯其如此，“和平理念的种子才能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习主席的这篇演讲，对于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以及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相处，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也要求在各种文明间确立平等、包容、交流、互鉴的新理念。习近平主席的演讲阐发了一种新的文明观，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平和与包容，也展现了当代中国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只有积极倡导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借鉴、交流、学习和创新，世界文明的未来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唯其如此，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世界。

链接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4年3月27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强调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70年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到访并发表演讲。对此，专家认为，这次访问及演讲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划时代现实

意义，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自己的文明观。

“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同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可能不同，但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多彩的世界。”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也是中国首位当选为该组织最高领导的教育部前副部长章新胜说，“就像习主席所说，全世界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亚洲安全观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海峰会上发表题为《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的主旨讲话，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强调中国将同各方一道，推动在亚信基础上探讨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亚洲安全观是一个复合型的多维概念，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为要义，其内涵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发展、文化互鉴、社会进步等多个层面。

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利益。在亚洲，各国大小、贫富、强弱很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但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安全事务的权利，也都负有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平等的、包容的。

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大局。亚洲安全问题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安全领域的综合性，二是维护安全手段的综合性。

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协商，促进各国和地区安全。在复杂多元的安全挑战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唯有通过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安全。

可持续，就是要树立发展和安全并重的理念，以实现持久安全。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不出发展的硕果。”

亚太梦

在出席 2014 年 11 月 9 日上午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题为《谋求持久发展 共筑亚太梦想》的主旨演讲。这是习近平首次正式提出“亚太梦”构想。

习近平主席指出，这个梦想，就是坚持亚太大家庭精神和命运共同体意识，共同致力于亚太繁荣进步；就是继续引领世界发展大势，为人类福祉作出更大贡献；就是让经济更有活力，贸易更加自由，投资更加便利，道路更加通畅，人与人交往更加密切；就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安宁富足的生活，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习近平主席的这一阐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提出了亚太地区的发展方向：共同繁荣、引领大势、互联互通、人民幸福。

他认为，亚太地区应该谋求共同发展，建设利益共享的亚太价值链，培育普惠各方的亚太大市场；亚太地区应该坚持开放发展，以开放包容精神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亚太地区应该推动创新发展，用创新发

掘增长动力,用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亚太地区应该寻求联动发展,形成各经济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格局。

链接

习近平主席说,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出新倡议新设想。中国愿意同各国一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为亚太互联互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早在1967年,当时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刚刚处于高速增长之际,世界著名政治家、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提出了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见解,即“世界重心将转移到太平洋地区”。他的预见正在逐步成为现实。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今天的亚太占世界人口的40%、经济总量的57%、贸易总量的48%,是全球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潜力最大、合作最为活跃的地区,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重要引擎。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的指导地位。党的十八大后,逐渐提出并强化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核心内容是中国要在国际上更好地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并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合作共赢,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在外交实践上,中国积极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广泛开展经贸技术互利合作,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结伴而不结盟，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中国积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已同世界上 67 个国家、5 个地区组织建立了 72 对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坚持不干涉内政而又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中国积极参与解决伊朗核、朝鲜半岛、乌克兰、巴以冲突、南苏丹国内冲突、反恐、埃博拉疫情等一系列重大热点问题，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谈，为维护国际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大国作用。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坚持和平解决争端。中国坚决反对日本背信弃义、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坚决反对日本歪曲历史和破坏战后国际秩序的图谋。处理南海问题，中方赞成并倡导“双轨思路”，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力争摆脱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走向冲突对抗的老路。中美不断推进各领域协调和合作，两国关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美首脑多次会晤取得成功，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注入新动力。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方愿同中方扩大合作，加深利益融合，通过坦诚和建设性对话解决差异和分歧，共同建设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链接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 2016 年 3 月 8 日在北京说，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外交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开拓前行。习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理念和新举措，指明了中国外交前进的方向。我们正在走出一条有着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之路。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8 日举行记者会，王毅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作上述表述的。

他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努力目标是助力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选择是坚持自身的和平发展，同时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基本原则是合作共赢，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主要路径是建立形式多样的伙伴关系，倡导结伴而不结盟，对话而不对抗；价值取向是坚持正确义利观，在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弘扬正义，在国家关系中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王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说：“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

正确义利观

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后世多指物质利益。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便形成义利观。2014年7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发表题为《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重要演讲，在演讲中“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

关于义利观，传统儒家大师都曾有过相关的言论。例如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也曾说：不义之利“不苟得”；大义面前连死都不怕，更不会贪利避祸（《孟子·告子上》）。但需要注意的是，因传统儒家有其固有的阶级局限性，所以其思想也会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

在当代社会中，义利观常表现于商业中的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现象。良好的义利观，通常以重义轻利为基础，为社会普遍群众创造价值，汲取较少的物质财富；而歪曲的义利观，具体表现为拜金主义，甚至忽



视道德、践踏诚信等。在中国传统美德中，正确的义利观占有很高的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民所推崇的做人经商的终极追求。

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中国主张“君子义以为质”，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国际关系中，要妥善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链接

习近平主席“正确义利观”的提出和确立

访问非洲正式提出。习主席外交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在上任后的头一年先后出访非洲三国与拉美三国，提出新的“义利观”，表明中国外交将继续执着于自己的发展中国家属性。习主席在2013年3月访问坦桑尼亚、南非与刚果三国，并于5月底6月初访问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与墨西哥三国。他在坦桑尼亚发表演讲，用“真”“实”“亲”“诚”四个字准确概括了历久弥新的中非关系，强调中非关系的本质特征是“真诚友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他还首次提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强调中国要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

周边外交座谈会得以深化。2013年10月24至25日，习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翔实阐述了新时期周边外交的战略方针，即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具体包括“四个要”：一要坚持睦邻友好，守望相助；讲平等、重感情；常见面，多走动；多做得人心、暖人心的事，

使周边国家对我们更友善、更亲近、更认同、更支持，增强亲和力、感召力、影响力。二要诚心诚意对待周边国家，争取更多朋友和伙伴。三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我国发展，使我国也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

纪念“五项原则”60周年之际提出“六个坚持”的国际关系准则。“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4年6月28日在北京举行，中、印、缅三国领导人出席，习主席发表《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的重要演说，与时俱进提出了“六个坚持”：一是坚持主权平等；二是坚持共同安全；三是坚持共同发展；四是坚持合作共赢；五是坚持包容互鉴；六是坚持公平正义。“六个坚持”既是对“五项原则”的继往开来，也体现了“正确义利观”，尤其是第四与第六条。第四是坚持合作共赢，强调应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摒弃“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坚持同舟共济、权责共担，携手应对全球性问题。第六是坚持公平正义，强调应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首访韩国作出新阐释。习主席于2014年7月在韩国首尔大学发表《共创中韩合作未来 同襄亚洲振兴繁荣》的演讲，强调中国将始终做“维护和平、促进合作、虚心学习”的国家，倡导合作发展理念，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义利观”，提出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

中央外事会议予以明确。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于2014年11月28至29日召开，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其内涵之一即为“正确义利观”，强调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分歧和争端。在工作层面要求落实好“正确义利观”，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

 “习式外交”

这是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风格的形象表述。《联合早报》2015年1月4日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政短短两年多，即对外交开展多项创新。对此，有学者认为“习式外交”的战略日益清晰——中国当前及未来的外交政策，将在保持平稳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王湘穗教授说，过去两年的一连串外交动作显示，“习式外交”已然成型。

“习式外交”的最大特点是主动性，相较于过去被动地按照国际和区域问题或议题开展外交工作，习近平主席如今拥有自己的外交战略和口号，并且主动地提出具体措施来实现这些构想，促使中国的地缘战略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中国外交似乎特别需要一种力量，一种“坐怀不乱”的“定力”。“习式外交”就有这样的定力。说它有定力，是指其具有高度的理论自信自觉和战略自信自觉，能够有效抵制和排除各类干扰诱惑，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第一，日益强烈的大国意识。中国领导人从毛泽东时代起就强调中国是个大国，但当时的中国，经济与科技水平都比较落后，经济总量在全球进不了前十位，综合国力也在多个国家之后。当时的大国外交，指的是针对美国、苏联、欧盟、日本等全球政治与经济大国的外交。而在2008年后，中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当作准超级大国甚至超级大国看待。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意识到，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经济总量很可能在若干年后超过美国，中国已经是坐二望一的大国，这种情况下的大国外

交,其内涵就变成了“作为大国的中国,如何与美国打交道”,特别是“如何与其他综合实力不如中国的大中小国家交往”。基于这一角色定位的转换,滋生出其他若干外交行为与特征。

第二,积极进取。中国的角色与地位在提升,已经是全球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因此许多国家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一带一路”战略的确定、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倡议,充分发挥主场外交的作用等,都是外交积极进取的表现。很自然地,这方面的外交努力要从本地区做起,如建立亚投行与丝路基金,主张升级中国—东盟自贸区。超出本地区的一些合作机制,则瞄准具体领域,如力推成立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倡议建立亚太自贸区。安全领域,强化亚信这一地区安全机制,倡导以合作安全为核心的亚洲安全观。

第三,重视周边、抓支点国家。2013年10月召开规格与规模都罕见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提倡“正确的义利观”,与东盟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这些集中体现了对周边的重视。而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印尼倡议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张兴建中巴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则是抓支点国家之举。

第四,底线思维。意味着该维护的国家利益坚决维护,如坚持要求日本承认钓鱼岛存在争端,以此作为改善两国政治关系的前提条件;要求菲律宾撤回仲裁案,回到政治谈判的轨道上来;在一些西沙与南沙岛礁进行吹沙造地,以强化中国在南海特别是南沙的存在。

第五,强化公众外交。庄园会晤、瀛台夜话是外交方式创新尝试,让中国民众倍感新鲜,意识到外交不仅仅是正襟危坐状态下的严肃交谈,还可以是放松状态下的深入交流,并达到正式交谈所难以起到的效果。此外,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不时用普通百姓的事迹当例子,在讲演中经常引用对方国家的谚语、民谣,问候语使用东道国语言等,都让关心外交事务的普通民众印象深刻。

在 2014 年 11 月底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不仅是指中国与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是说，中国作为大国，外交政策要不同于既往大国。

链接

上任三年多时间，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布五大洲。透过“习式外交”新气象，基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习式外交”以“和谐”为主基调，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打造了国际交往准则。当今中国所处的历史坐标和国际坐标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人口的规模、国土面积等，这种体量让世界感到疑虑，上任三年多来，习近平主席足迹遍及亚、非、欧、北美、南美五大洲的 30 多个国家，以大范围的地理位移勾勒出一幅彰显国际格局的地缘大地图，以新思维的话语表达建构起体现中国特色的外交总战略。

习近平主席足迹所及之处，无不向世界传达了我国构建“和谐相处”国际关系的意愿。通过外交舞台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和平主义的文化传统，提出了包容性增长概念，表示要让中国的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周边乃至世界各国。习近平主席曾经幽默地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行，我们都欢迎。”此后，我国又提出“一带一路”对外经济合作倡议，此倡议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秉持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金融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旨在与世界各国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白宫秋叙

这是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元首对话的形象表述。9月24日，习近平主席抵达华盛顿当晚，就与奥巴马总统举行了不打领带的小范围会晤。这一被习近平主席称为“白宫秋叙”的元首对话，延续了“庄园会晤”和“瀛台夜话”的传统，友好务实、坦诚深入，重在开展深度战略沟通。加上第二天的大小范围会谈等一系列互动，两国元首交流和共同活动时间约9个小时。

2015年9月25日，中方公布的过万字的“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成果清单”显示，中美在政治、经贸、人文、气候变化、科技、执法、防务、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达成49项重要共识。分析人士指出，中美各领域“对表”，将起到增信释疑的重要作用。

成果清单第一项，是中美对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再确认。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处理中美关系及和平发展问题的政治宣言。此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9月俄罗斯圣彼得堡会谈、2014年3月荷兰海牙核安全峰会期间和2014年11月北京中南海瀛台共三次的“习奥会”中，分别对“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赞赏”“同意”和“共同推进”。此轮习奥会中，中美元首为未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一锤定音”。双方一致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对记者说，习近平此次访美的丰硕成果使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框架更明晰，成为中美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的“指南针”和“方向盘”。



链接

2013年6月7日至8日，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没有欢迎仪式，没有21响礼炮，不打领带，两场会晤，一次晚宴，一起散步……习近平同奥巴马面对面会晤和交流，时间加起来超过8个小时。此次会晤不仅是两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元首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和交流，也是中美高层交往的一个创举。庄园会晤中，中美两国元首围绕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题，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取得重要积极成果。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又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奥巴马则评价称，“现在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把美中关系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2014年11月11日，习近平与奥巴马再次解下领带，在北京中南海进行了著名的“瀛台夜话”。习近平在瀛台前迎接奥巴马，两国元首亲切握手，互致问候的场景成为经典一幕。习近平指出，中方提出亚洲安全观，就是希望亚洲各国以包容合作精神构筑共同安全。中美应该继续就亚太事务加强对话和协调，尊重和照顾彼此在本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携手为亚洲安全作出贡献，这是相辅相成的，不是相互排斥的。“我们今晚的交谈非常深入，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中国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了解。我更加理解中国人民为何珍惜国家统一和稳定。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无意遏制或围堵中国，因为这样做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奥巴马表态称。夜色渐沉，两国元首聊兴不减，信步来到迎熏亭茶叙。散步、会见、晚宴、茶叙……两国元首的此次谈话持续了四个多小时，成为佳话。



胜利日外交

是指中国政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而举办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的简称。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2015年8月31日至9月4日，中国政府举行了以大阅兵为代表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并邀请了诸多国家的领导人、政府代表、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等前来参加，相关活动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从外交方面来看，相关活动主要发挥了如下作用：

1. 展示了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展示了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和向心力。这是国家对外交往的基础。一个社会相对稳定、政府有相当效率、民众能够就重大问题达成共识的国家，自然具有更强的“硬实力”和“软实力”。这虽然不是直接的外交行动，但在很大程度上会有利于外交工作的开展。

2. 强调维护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意义，展示了相关国家在此问题上的共识。虽然战争已经结束70年，但战后国际社会的基本秩序仍然是基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也是战争胜利的直接产物。在此问题上，相关国家与中国都明确表示过态度，而这些国家领导人的出席、部队共同参与阅兵等行动，也都实际反映了这种态度。

3. 在此过程中的外交博弈，揭露了个别邻国政府对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使其在国际社会陷入一定被动。个别邻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认识，使其在处理此次活动的相关外交议题时进退维谷、举止失措，不仅失去了卸下历史包袱、轻装前行的机会，还将自己对历史的错误认识暴露在了国际社会的聚光灯下。

链接

关于胜利日阅兵，各国参与者如是说

俄罗斯总统普京说，胜利纪念日对俄中两国确实具有特殊意义。今天，



在欧洲和亚洲，有人企图篡改二战历史，肆意对一些事件，特别是战前和战后的一些事件进行毫无根据的曲解。某些国家通过美化罪犯及其帮凶、为其平反昭雪，挑衅性地要改变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决定。这简直是对纪念千百万牺牲者的一种侮辱。这种历史投机行为的目的昭然若揭，那就是借此搞地缘政治把戏，离间各国和各国人民。俄中两国共同致力于并将坚定不移地捍卫历史真相、维护共同胜利，两国共同庆祝二战胜利 70 周年，就是对这一决心直截了当的宣示。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付出巨大牺牲，这已得到世界广泛认可。国际社会应从过去的战争惨剧中认真吸取教训，并以向前看的态度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对世界而言有着重大意义。我们需要借此机会向所有为战争胜利作贡献的亲历者致以怀念与感谢。我希望，国际社会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领袖们能够牢记历史教训，理解活动背后的含义。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梅津采夫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规模宏大，有数十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与，具有广泛代表性。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有着特殊意义，这是在向无数为缔造战后和平而流血牺牲、建立丰功伟绩的人们致敬。

韩国总统朴槿惠说，今年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半岛光复和分裂 70 周年，是一个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年份，具有深远的意义。现在仍存在各种矛盾和对立的东北亚地区需要建立和平与合作的秩序，为此区域内国家需要共同携手努力，以正确的历史认识为基础，发展面向崭新未来的关系。只有以此为前提，过去历史留下的创伤才能得到治愈与平复。在流淌不息的历史长河中留下的痕迹也会永存。企图否认历史无异于想只手遮天，不自量力。

南非总统祖马表示，中国的胜利为当今 21 世纪世界各国作为朋友和伙伴谋求和平共存打下了基础。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人民在二战中

的生命、财产损失和承受的痛苦都是巨大的。中国人民的勇气和毅力不可被低估。我相信，中国在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中的承诺，和由此体现出来的团结精神是积极的，它也反映了世界人民维护战后和平国际秩序、尤其是保护战后 70 年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共同愿望。

(人民网，2015 年 9 月 4 日)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这是中国专门为发展中国家设立的一种国际援助基金。2015 年 9 月 26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 20 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2015 年后发展议程。

南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地理位置大多位于主要发达国家的南方，因而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被称为“南南合作”），是促进发展的国际多边合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谋求进步的重要渠道，也是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融入和参与世界经济的有效手段。

南南合作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之间，传播人类活动所有领域内的知识或经验，并相互分享的能力，主要内容包括推动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和经济合作，并致力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与环境、中小企业发展、人才资源开发、健康教育等产业领域的交流合作。

链接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

据介绍，2011—2015年，中国中央财政累计安排4亿元人民币开展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通过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产品的赠送、能力建设培训等方式帮助有关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能力建设方面，2011年至2014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结合商务部培训资源，共开展了39期气候变化领域的培训班，培训了1193名主管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官员和技术人员，涵盖亚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欧洲6个洲的119个发展中国家。2014年9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宣布中国将大力推进气候变化南南合作，从2015年开始资金翻番，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国家发改委表示，加快启动南南合作基金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提出具体实施方案，确定南南合作基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争取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启动运营。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这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设立的一个崭新国际机构。2015年9月2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发展峰会，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在讲话中宣布，中国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

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任务是“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它不仅仅是要总结中国的发展经验，使其理论化、系统化，为他人所理解和使用，更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一种共生共赢、共同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知识分享的开放型发展，是在践行“发展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中国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的意义：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的体现；是中国开放型发展理念的体现；是中国国际合作和国内合作的经典范例；有利于中国对外形象的改善和软实力的提升；以创新倒逼改革，有助于建设中国新型高端智库。

“把脉、开方”

这是传统中医中的术语，原意为查病和拿出治疗方案。2015年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作题为《创新增长路径共享发展成果》的发言中，引用了中国古代先贤所说的“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认为国际金融形势出现各种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及发展不平衡问题，“这就像一个人生了病，看起来是感冒发烧，但根子在身体机理出了问题”。不仅为世界经济把了脉，而且开了方。

习近平主席在这次讲话中指出，贸易和投资是当今经济发展的两大主动力。“我们把世界经济比作人的肌体，那么贸易和投资就是血液。如果气滞血瘀，难畅其流，世界经济就无法健康发展。”他呼吁构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易和投资活力。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还给世界经济长远发展开给出了良方：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为了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须推动改革创新。他在讲话中指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有着不同以往的复杂性，所以在爆发7年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仍然未有明显迹象。这说明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正逐步消退，各国需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重视创新，才能找到经济发展新的路径。

链接

2007—2009年环球金融危机，又称世界金融危机、次贷危机、信用危机，是一场在2007年8月9日开始浮现的金融危机。自次级房屋信贷危机爆发后，投资者开始对按揭证券的价值失去信心，引发流动性危机。即使多国中央银行多次向金融市场注入巨额资金，也无法阻止这场金融危机的爆发。直到2008年9月9日，这场金融危机开始失控，并导致多个大型金融机构倒闭或被政府接管。

不信邪也不怕邪

“邪”本意是不正当，不正派。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讲话时提出，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

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中国不觊觎他国权益，不嫉妒他国发展，但决不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将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发展交流合作，促进国家关系发展。

链接

美日炒作南海话题是徒劳

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起的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公布已有一段时间。南海并未因此风浪骤起，倒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当事国轮番吵闹，大有誓不罢休的意思。

起初，美日两国大概以为，只要稍微挑拨就可搅动舆论风暴，就能陷中国于不利境地。但事实上，除了美同盟体系中个别国家随声附和，绝大多数国家都对仲裁结果置之不理，更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一呼百应之势。

失望之余，美日尚不甘心，也很难甘心，开始第二轮造势。不只在国内炒作，国际场合也不放过。近日，美国副总统拜登访问澳大利亚，对媒体表示期待中国“遵守国际规则”。日本则抓住亚欧首脑会议的时机炒作南海问题，日自民党要求政府根据海洋法公约向常设仲裁法院提起仲裁程序，以使中国停止在东海进行油气田开发。

然而，美日新的努力依旧未能挽回颓势。拜登之言乏善可陈，甚至无法引起舆论的兴奋。更何况，作为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国家，动辄将“国际规则”挂在嘴边，恐怕产生的更多是反讽效果。日本在亚欧首脑会议上的小动作，也并没有被专注于合作大局的各国放在心上。所谓的“东海仲裁”早在今年3月就由自民党放出风声，现在日方再次将其拿出来“炒冷饭”并不能提升对华施压的效果。

美日无法得逞，根本原因是南海仲裁案不合理、不合法，仲裁案结果只是“一张废纸”。任何国家都无法在非正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所谓的“正义”。美日一再搅局、添乱，甚至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只会暴露其黔驴技穷的窘境。

近年来，美日软硬兼施搅局南海问题，不可谓不用心。时间没少花，钱没少搭，口舌没少费，但从效果看，并未能动摇中国主权权益，更动摇不了中国维护主权权益的决心。美日两国也很清楚，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立场，不仅受到本国人民支持，还得到国际上70多个国家的政府以及90多个国家的23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明确支持。即使拉上盟友，美日也无力扭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现实局面。更何况，作为非争议方，两国越是卖力表演，越容易暴露其用心，引起国际上反对阴谋和霸权的国家对美日企图的质疑，引发东盟国家对域外势力介入的警惕。

中国已多次向美表明，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希望美在亚太地区发挥积极作用。对于日本，中国更严正警告，应好好反省历史，休要无理取闹。

菲阿基诺三世政府劳民伤财，制造这一场政治闹剧，给国际社会提供了反面教材。美日应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在南海问题上谨言慎行。

当然，对于如何充分榨取这场闹剧的“剩余价值”，美日两国大概早有计划，恐怕也没有短时间内收手的打算。对此，中国也有心理准备。如果一定要来一场耐力比拼，那历史终会证明，在南海问题上，谁是无聊的炒作者，谁是正义的守护者。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7月19日）

拼音索引

A

APEC 蓝 142, 143

B

“八项规定” 147, 148, 149, 155, 158, 163, 169, 175,
196, 212

拔“烂树”、治“病树”、正“歪树” 191, 192

把纪律挺在前面 189, 190

“把脉、开方” 263

白宫秋叙 257

百人红色通缉令 177

不定指标、上不封顶 179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159, 175, 183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023, 024

不信邪也不怕邪 264

C

厕所革命 130, 131

城乡一体化 060, 069, 124

从严治党 007, 011, 012, 040, 101, 153, 154, 164, 171,
174, 185, 189, 190, 195, 196, 197, 198, 200,
210, 211, 212

D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014, 079, 080, 081, 082, 083, 089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011, 150, 155, 156, 162, 175,
188, 206

“刀把子” 046, 047

“稻草人” 153, 164, 185

顶层设计、顶层推动 017

F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026, 027

“放管服” 049, 050

分享经济 099, 103

服务型政党 146

负面清单 031, 032, 062, 063, 064

G

改革促进派 019

改革红利 056, 059

“高压线” 040, 168, 169, 190

工匠精神 106, 107, 108

工业 4.0 083, 098, 099

公车改革 041, 04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087, 093, 094, 100

共建共享 013, 020, 021
“关键少数” 186, 187, 188, 207
光网城市 108
滚石上山、爬坡过坎 087
国际发展知识中心 262, 263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011, 027, 028, 038, 049, 057

H

海外仓 109
海洋强国 029, 030
和谐共生 123, 137, 138
核心价值观 008, 112, 113, 114, 118, 192, 209, 214
互联网+ 051, 075, 082, 083, 084, 089, 118, 120
互联网治理 134, 135
户籍改革 042, 097
获得感 013, 020, 021, 096, 128, 129, 205

J

记得住乡愁 124, 125
简政放权 031, 032, 036, 077, 049, 050, 068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091
京津冀一体化 061
经济新常态 049, 067, 068
精准扶贫 064, 065
军事思想观念新变革 218

L

澜湄合作 242, 243



老工业“二人转” 086
“老虎”“苍蝇”一起打 153
理论自觉 004, 022, 023
“两个翻一番” 052
“两个一百年” 006, 024, 101, 116, 187
“两山论” 139, 140
“两手论” 076
“两学一做” 205, 207, 208, 209
“猎狐行动” 165, 166
绿色发展 010, 095, 096, 100, 137, 138

M

媒体融合 118, 120, 121
美丽中国 010, 013, 060, 137, 138, 139, 140
“猛药去疴、刮骨疗毒” 169
命运共同体 048, 134, 135, 215, 229, 230, 236, 243, 248,
251, 255, 256, 263, 264

N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 261, 262

P

派驻纪检组 200, 201, 202

Q

“七个有之” 176
强军目标 214, 219
全口径预决算 053, 054

“全面二胎” 126, 127
全民医保 131, 132
全球治理 230, 234, 235, 236, 237
全要素生产率 057, 084, 085, 093
权力清单 031, 032, 035, 036, 037

R

“人地钱”挂钩 105
人努力天帮忙 143
容错纠错机制 048, 049

S

“三个公平” 122
“三去一降一补” 096
“三严三实” 161, 162, 163, 175, 206
深改小组 018, 019
命运共同体 140, 141
胜利日外交 258
世界新军事革命 216, 218, 219, 227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057, 066, 077, 078
丝路基金 241, 242, 255
司法体制改革 032, 033, 034
司法责任制 034, 035
“四风” 150, 156, 158, 162, 169, 199, 208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011
“四个意识” 204, 205
“四个自信” 004, 005, 006
“四讲四有” 208, 209, 210

“四铁”干部 202, 203

“四有”干部 172, 203

“四种人” 192

T

塌方式腐败 180, 182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154

“天网”行动 166, 167, 177

“铁帽子王” 185, 186

铁腕治污 144

土地流转 072, 073

团团伙伙 168, 176, 181, 182, 212

W

网上主旋律 118, 119, 120

文化强国 010, 057, 114, 115, 116

文旅经济 078

问责条例 210, 211

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 183

五大发展理念 012, 207

五大战区 221

五大支柱性政策 095

“五个必须” 184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010, 024

X

“习马会” 047

“习式外交” 254, 256

乡土味道 125, 126
相机调控 109, 110, 111
协商民主 044, 045
新的伟大斗争 007, 008
新经济 074, 075
新型城镇化 054, 055, 056, 061, 069, 105
新型文化业态 116, 117
幸福感 125, 128, 129, 132, 133, 134
修昔底德陷阱 205, 239
巡视全覆盖 198, 199
巡视制度 193, 194, 195

Y

亚太梦 248
亚投行 236, 237, 238, 239, 255
亚洲安全观 247, 255, 258
“一带一路” 048, 233, 236, 241, 242, 249, 255, 256
“一元公司” 070, 071
依宪治国 026, 027, 028
营改增 101, 102, 103, 111

Z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149, 150, 155
正确义利观 251, 252, 253
政治规矩 167, 168, 184, 189, 207, 208, 212
政治纪律 149, 151, 152, 153, 167, 184, 189, 196, 207,
208, 212
政治生态 039, 040, 162, 180, 182, 187, 191, 192

治裸官 170
中国道路 002, 014, 015
中国故事 016
中国核安全观 244
中国经济升级版 058, 059, 060
中国梦 002, 003, 004, 015, 017, 023, 101, 116, 133, 187,
204, 220, 246, 251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224, 22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224, 225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20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49, 250, 251
中国文明观 24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216, 217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231, 232, 250, 257, 258
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 226
忠诚、干净、担当 175, 178
众筹 081, 089, 090
重农固本 100
“主体责任” 158, 159, 210, 211, 212
专项巡视 195, 198
自由贸易区 058, 059, 248
“最后一公里” 020, 188, 189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62, 164, 178

后 记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更好地学习贯彻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专家和有关人员编写了此书。

本书所录词语出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央、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公布的重要政策文件。时间从党的十八大始，至建党 95 周年纪念大会止。本书结构分为总篇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国防、外交五大分篇，每篇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对每一词语，指出来源，并作出简要解释，同时链接相关知识和信息，在本书最后还附录了汉语拼音查阅索引。

本书对所选词语的内容解释，均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瞭望》周刊、《光明日报》、人民网等报刊及网站公开发表的报道、讲话、政策性文件；相关链接和部分解释内容包括了上述报刊、网站及其他媒体发表的领导、学者文章。在这里向相关媒体、作者表示衷心感谢！由于引用的材料较多，有的文字未能一一标明出处，也向相关作者表示歉意！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赵凌云研究员，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教授，军事经济学院徐勇教授对本书进行了认真审读，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编写过程中,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生韩风、景秀齐、李梦、卢倩倩、于兰兰做了前期资料收集和准备工作;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学生吕自立参与了部分资料整理、文字编辑和校对工作;湖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温健、鲁修云、朱京阳、刘佳、黄九菊,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劲松副教授等同志为本书编写提供了帮助;湖北省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建怀、总编室主任马骏、责任编辑赵世蕾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从立意到组织编写,历时半年。虽然我们力求做到词语丰富、解释准确、使用方便,但由于时间紧,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有不准确甚至错误地方,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